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
考古

贵
考 古 黔 中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黔中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主编.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4. 12.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221-18594-5

I . K872.731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4XV597 号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考古

考古黔中

KAOGU QIANZHONG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

出版人 朱文迅
策划编辑 谢丹华 汪琨禹
责任编辑 汪琨禹
装帧设计 陈 电
责任印制 黄红梅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2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7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221-18594-5
定 价 68.00元

如发现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胡忠雄 王 宏

成 员 戴建伟 邓 谦 汪延皓 刘丽先 李 波

宋庆松 何谋军 胡 琳 杨 菲 沈 兵

何 丹

总 审 订 史继忠 郑荣晴 文思宛 杨 青 彭文俊

办公室主任 邓 谦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

顾 问 陈祖武 顾 久

主 任 史继忠 郑荣晴

《考古黔中》编委会

主 任 胡 琳
副 主 任 熊 列 白陈新 周 星 邹 玲
成 员 王 勇 陈平勇 蒋矜梅
指导专家 裴树文 吕红亮 史继忠 周必素 张合荣
彭文俊 安成祥

《考古黔中》编辑部

主 编 张兴龙
执行主编 周儒凤
撰 稿 张兴龙 付永旭 胡昌国 彭 万 闵 凯
周儒凤 杨 磊 史 忞 李二超 韦松恒
杨 偲 朱 梅 应 腾
图片提供 张兴龙 付永旭 胡昌国 彭 万 闵 凯
杨 磊 史 忞 李二超 韦松恒 杨 偲
朱 梅 应 腾



总序

胡忠雄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而镶嵌在云贵高原的明珠——贵阳，更是被一代代文人迁客所推崇和追捧。五百年前，一代圣贤王阳明初到筑城，便对贵阳山水发出“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羨九华”的赞叹，后来龙场悟道又对贵阳气候给予“檐前蕉叶绿成林，长夏全无暑气侵”的盛赞。山水之城与避暑天堂完美邂逅，让人在如春凉夏的惬意中尽享如诗时光，爽爽贵阳就这样在夏日的徐徐清风中向我们走来……

徜徉于这座有着山水禀赋和文脉传承的城市，攀黔灵山，感叹“野禽五色仙裙蝶，山黛千盘佛髻螺”的天地造化；游南明河，体悟“水从碧玉环中出，人在青莲瓣里行”的天人和谐；登甲秀楼，领略“烟雨楼台山外寺，画图城郭水中天”的城市韵律；访文昌阁，见证“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的城市文脉，一山一水尽显气韵，一楼一阁各展风流。

爽爽贵阳，贵在爽身。盛夏时节的贵阳，没有骄阳似火，唯有凉意满怀，阵阵清风浸润身体的每个毛孔，犹如置身茂密林荫之下，又似身处空山幽谷之中，尽享天然空调、生态氧吧的舒爽清凉。“硃坐万竹中，凉风生静衣”，是黔中贤士竹林畅游对清风送爽的感慨；“虹霓蒸海气，烟雾洒春岚”，是明朝文人送友赴任对宜人生态的赞誉。大自然对贵阳格外偏爱、不吝馈赠。北纬 26 度、平均海拔 1100 米，最佳的纬度与高度在这里相拥，造就了地球上最美的风景

和最适宜人居住的环境；夏季平均气温 22.3℃、相对湿度 76% 至 79%，最佳的温度与湿度在这里相遇，让人体机能良性运转、肌体活力充分焕发；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 1 万多个、平均风速每秒 3 米以下，最佳的浓度与风度在这里相逢，让人沉浸氧海、吸氧畅游。无与伦比的“六度”，孕育了这方独一无二的康养胜地，成就了贵阳蜚声中外的避暑美誉。

爽爽贵阳，贵在爽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跨越浩瀚的历史长河，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多彩文脉在这里激荡。四万年前，贵州先民在高峰镇招果洞建造了“洞穴家园”，创造了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通体磨光石器之一，被考古学界誉为解开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革命之谜的一把钥匙。两千年前，秦通楚道，汉置牂牁，神秘的夜郎古国融入了汉帝国，成为汉文化天空中一颗灿烂星辰。一千二百年前，自唐代开始，开阳兴起丹砂开采，逐渐成为我国丹砂采冶的重镇，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一抹绚丽的“中国红”。一千年前，从宋代以后，青岩古道成为茶马互市的重要通道，形成商品贸易的大动脉，无数传奇故事、历史沉浮都在马帮的声声驮铃中回响不息。六百年前，水东土司女杰刘淑贞“卷裙走马四千里”，远赴南京觐见朱元璋，化解了西南边陲战乱危机，留下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千古佳话。五百年前，王阳明在修文龙场参学悟道、开宗立派、教化民风，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裂变，塑造了贵阳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核。近百年来，无数黔中英杰“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以身证道、改天换日，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百宜红军烈士陵园，一处处红色地标熠熠生辉，留给贵阳人民厚重的红色基因。六十年前，“悬崖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的“三线”建设者，以青春抒写家国情怀，铸就了砥砺初心、艰苦创业的精神丰碑。古往今来，渊深厚重的历史根脉和人文精神，滋养着贵阳儿女、浸润着黔中大地，造就了“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精神品格，生生不息、历久弥坚。

爽爽贵阳，贵在爽眼。贵阳是一个青山如屏、水鸣如琴、别有洞天的大山地公园、大森林公园，“溪瀑峡石洞城”浑然天成、“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共生。



看扶风山泉清树古，茂林掩名祠，奇山藏书院，体悟“雨滋苔藓侵阶绿，露洗松阴满院清”的幽静雅致。看天河潭飞瀑流湍，水自天上泻，雾从云中生，沉浸“空山闻水声，碧潭衍飞瀑”的壮阔景致。看森林公园林木蓊郁，立黔南首关，俯重峦叠嶂，饱览“一山高耸翠微巅，突兀穿云欲到天”的钟灵毓秀。看十里河滩水明如镜，流潺潺岁月，忧芸芸苍生，尽享“真山真水到处是，几步花圃几农田”的田园风情。看红枫湖一碧万顷，织河道沟汊，集旧沙湾洲，欣赏“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的诗情画意。看高坡云顶碧草连天，草长莺飞绿，奔马驰浩瀚，沉醉“倚空千嶂横起，银阙正当中”的静谧灵动。还有弦歌不辍的孔学堂，碧水苍山的鸭池河，童趣盎然的云漫湖，浪漫温情的花溪公园，古朴幽深的青岩古镇，绚丽绽放的万亩樱花，玉水金盆的底窝八寨，烟雾缭绕的南江大峡谷……延绵百里的环城林带，穿城而过的南明河水，星罗棋布的绿地公园，缓缓铺展出“十里山水半入城”的美丽画卷。城是一幅景，景是一座城。居于闹市高楼也能品山水之味，游走林间田舍也能赏城市之美，寄身市井巷陌也能享湖草之乐。崇尚天人合一的贵阳人，早已将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浸透血脉、融入灵魂。

爽爽贵阳，贵在爽口。贵阳，一块神秘又独立的风味自留地，一座汇聚四方佳肴的美食博物馆，山城的韵味和人情的意味在这里相互交织，酸辣的刺激与奇鲜的柔美在这里激烈碰撞，造就了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人间风味。辣，构成了贵阳美食的底色。糟辣椒、糊辣椒、油辣椒、烧辣椒、糍粑辣椒，辣得酣畅，软糯香滑的辣子鸡、麻辣松脆的香酥鸭、行销全球的“老干妈”，成为无数游子的“乡愁”寄托。酸，勾勒了贵阳美食的特色。酸可与一切相溶，红酸、白酸、鱼酱酸、晒醋酸、杨梅酸，酸得过瘾；酸可与一切相遇，鲜鱼、牛肉、猪蹄、肥肠，热气腾腾的酸汤火锅，既开了胃又暖了心。奇，增添了贵阳美食的亮色。贵阳有数百种小吃，肠旺面筋道弹牙、牛肉粉汤鲜味美、糯米饭咸甜相宜，在每个早晨唤醒沉睡的味蕾；清新的丝娃娃肚容万物、热辣的豆腐果外焦里嫩，在每个小摊等待逐味的老饕；滚烫的糕粑稀饭甜糯香浓、冰凉的玫瑰冰粉沁人

心脾，在每个街角惊艳疲惫的心灵；爽脆的折耳根其貌不扬，却能在每碗蘸水中释放奇特的口味。鲜，体现了贵阳美食的绿色。最优良的环境、最洁净的土壤，造就了绿色生态的山野之味，牛肝菌、羊肚菌、鸡枞菌等“黔菇”，雷竹笋、方竹笋、楠竹笋等“黔笋”，香椿、阳荷、蕨菜等“黔芽”，与甘甜井泉不期而遇，完美诠释了“人间有味是清欢”。辣、酸、奇、鲜，在此起彼伏的吆喝、摩肩接踵的喧嚣、流光溢彩的夜市中，绽放出“千家万户店铺开”的市井烟火。

爽爽贵阳，贵在爽购。曾经“地无三尺平”的贵阳，早已架起了千山万壑上的“高速平原”，随着天堑变通途，“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黔货”走出大山、“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贵品”走向世界……这里有贵酒黔茶。“贵山贵水迎贵客，好山好水出好酒。”酱香白酒醇香浓厚、手工米酒清香甘甜、生态果酒蜜香飘逸，“风来隔壁三家醉，雨过开瓶十里香”，贵酒已凝成时光的幽雅细腻，汇成岁月的回味悠长。“南方有嘉木，黔地出好茶。”唐代陆羽在《茶经》中盛赞黔茶“其味极佳”，滋味香浓的都匀毛尖、不疾不缓的湄潭翠芽、汤色红艳的普安红茶，在沸水升腾中奏响自然的韵律、释放大地的芬芳。这里有贵银苗绣。“传统的也是时尚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千年非遗历久弥新，“纹、珠、饰”美轮美奂，“绣、画、染”出神入化，千锤百炼的银饰，巧夺天工传“绝活”，银丝万缕间闪耀民族艺术之光；大美无言的苗绣，绣出时尚新“国潮”，飞针走线中编织民族无字华章。这里有黔药贵果。“黔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苗岭山脉间，孕育着一座“天然药物宝库”，56个中药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95种黔产道地药材遍布黔中大地，成就了以杜仲、灵芝、天麻为代表的“贵州三宝”黔草名片。“奇山秀水出珍果”，猕猴桃、刺梨果、蜂糖李、红樱桃、火龙果……这些蕴山水之灵秀、领自然之神韵的绿色食品，是“舌尖上的贵州制造”，也是献给世界的健康礼包。

爽爽贵阳，贵在爽游。贵阳无山不青、无峰不险、无林不茂、无水不秀，东西南北皆有美景，老幼中青各得其所。纵情山水之间，没有案牍劳形、车喧马嚣，只有逍遥自得、从容悠然。这里，让莘莘学子神往，革命圣迹、儒学基



地、地质公园，是感悟精神、研学心修、探索奥秘的宝地，可在“行万里路”中“读万卷书”。这里，让年轻一代心动，奇峰峭壁、清溪飞瀑、深涧幽洞，是攀岩探险、漂流露营、山地运动的天堂，可在“忽魂悸以魄动”中饱览鬼斧神工。这里，让不惑一族躺平，民族风情、古镇文脉、乡村民宿，是都市休闲、农耕体验、亲子游玩的乐土，可让“久在樊笼里”的身心“悠然见南山”。这里，让银发老人忘忧，天然药谷、生态氧吧、矿物温泉，是理疗康养、候鸟旅养、修身颐养的福地，可在“游目骋怀青山间，物我两忘绿水中”享受最美夕阳红。每一位旅者都能在这里找到深埋心底的诗和远方。

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让我们通过《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穿越重重关山，冲破氤氲云雾，相遇“爽爽贵阳”，共赴心灵之约、共鉴山水之美、共品人间之味、共享“六爽”之魅！

编写说明

一、《考古黔中》立足贵阳贵安（包含部分原属安顺市平坝区的部分地区）70年来的考古调查、发掘出土文物和相关研究成果，以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着眼考古遗存的发现、发掘、研究、保护、利用的文物工作全链条呈现，透物见人、透物见事，在严谨科学、通俗可读的总体编写方针指导下，对贵阳贵安历史进行考古学观察。通过考古遗存，缀连贵阳贵安4万年以来的人类活动史、社会发展史和民族融合史，通过微观剖析，尝试呈现贵阳、贵安宏大的历史演进图景。

二、本书依据资料充分考虑考古资料的研究权属，编写人员全都是在贵阳贵安长期工作且年富力强的考古一线科研人员，将打儿窝遗址、八角岩遗址、招果洞遗址、牛坡洞遗址、大松山墓地、轻工学院墓地的发掘领队全部纳入编写团队，所用材料基本为一手的考古资料。部分早年发掘的遗址和墓地，采用已发表的考古成果作为资料来源和编写依据。

目录

| | |
|------------|------|
| 引 言 | / 01 |
|------------|------|

第一章 史前之光

| | |
|-----------|------|
| 第一节 招果洞遗址 | / 05 |
| 第二节 打儿窝遗址 | / 29 |
| 第三节 牛坡洞遗址 | / 37 |
| 第四节 八角岩遗址 | / 64 |
| 第五节 肖家洞遗址 | / 72 |

第二章 汉晋遗韵

| | |
|------------|------|
| 第一节 清镇汉墓 | / 80 |
| 第二节 大松山魏晋墓 | / 87 |

第三章 黔中唐风

| | |
|-----------|-------|
| 第一节 熊家坡唐墓 | / 101 |
|-----------|-------|

| | |
|-----------|-------|
| 第二节 大松山唐墓 | / 104 |
| 第三节 凯掌唐墓 | / 116 |

第四章 多元一体

| | |
|-----------------|-------|
| 第一节 清镇宋墓 | / 124 |
| 第二节 干河坝石棺葬 | / 126 |
| 第三节 大松山墓群 | / 136 |
| 第四节 平寨岩洞葬 | / 150 |
| 第五节 花溪洞葬 | / 157 |
| 第六节 贵阳明清墓及其窖藏 | / 164 |
| 第七节 贵阳明代卫所及屯堡遗存 | / 173 |

附记：考古随笔

| | |
|-------------------|-------|
| 寻她千百度·考古调查 | / 191 |
|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 |
| ——招果洞遗址的发现 | / 191 |
| 卧牛吐宝，追溯万年 | |
| ——牛坡洞遗址的发掘 | / 197 |
| 寻觅古人的痕迹 | |
| ——大花水水电站调查 | / 205 |

| | |
|------------------------|-------|
| 翻山越岭来找你 | |
| ——贵安新区考古调查纪实 | / 210 |
| 手铲释天书·考古发掘 | / 214 |
| 大松山考古记 | / 214 |
| 黄土难掩的华美瓷韵 | |
| ——马场镇出土瓷器 | / 218 |
| 文物话春秋·考古研究 | / 227 |
| 在山丘与平坝之间的文明 | / 227 |
| 中华一统 | / 230 |
| “四海如一家” | |
| ——从考古学角度浅析唐代对贵州地区的开发 | / 233 |
| 贵州处处有宋意 | / 236 |
| 政策与公众·公共考古 | / 241 |
| 要动土先考古 | |
| ——基本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双赢的“贵州样板” | / 241 |
| 与古人同行 | |
|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考古之旅 | / 249 |
| 出圈，融圈！看贵州公众考古的贵安新区实践 | / 251 |
| 后记 | / 260 |



引 言

贵阳贵安以其宜人的气候、秀丽的风光和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为世人所知。历史上长期处于边疆民族地区，文献记载少，时代晚，连续性不强，每当谈及历史，就连许多贵阳本地人也最多溯至明清，对于明清以前的历史乏善可陈。贵阳贵安甚至常被称为“荒蛮之地”，虽然这种基于文献记载得出的结论有失公允，但不可否认，此种认知影响深远，根深蒂固。

土地是有记忆的，大历史观下，文献历史之外，通过考古工作构建的文物历史，在贵阳贵安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贵阳贵安考古史可追溯至 1954 年。1954 年至 1966 年，因配合红枫湖水库建设，田野考古工作在羊昌河流域展开，贵州省博物馆在金家大坪发现了一批汉代遗存，并于 1956 年至 1958 年进行过三次发掘，清理汉墓 28 座。1958 年 12 月至 1959 年 4 月，在清镇、平坝交界处的羊昌河两岸发现古墓约 300 座，并重点发掘了其中的 140 座墓葬。1960 年，为配合猫跳河水利工程建设，在清镇琊陇坝清理墓葬 100 多座。1965 年至 1966 年，在平坝马场附近的大松山、熊家坡、万人坟等地清理墓葬 34 座。这些墓葬的年代跨度较长，自汉一直延续至明。1972 年，为配合清镇洗涤厂建设，在干河坝清理宋明时期的“石棺葬”84 座。1992 年，为配合南昆铁路建设，对沿线进行考古调查。1996 年，在贵阳市晒田坝修建安居工程时，发现并清理了 6 座明清墓，并确定为许氏家族墓葬。2000 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贵州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得以全面铺开。2002 年秋，为配合金阳新区建设进行了区域考古调查，发现

史前洞穴遗址 16 处。2003 年，配合贵开二级公路建设调查，在开阳发现打儿窝遗址并进行了试掘；2009 年 3 月至 5 月，对打儿窝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2008 年 6 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在花溪发现史前洞穴遗址 12 处。随着铁路建设的加强，2010 年 5 月至 7 月，在贵阳地区开展了长昆高速铁路贵州段文物考古调查。

贵安新区开发建设以来，贵阳贵安考古工作迎来全新的发展契机。一是有明确学术目标的主动性考古项目亮点纷呈。在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的《贵州中西部洞穴遗址考古工作计划（2013—2014）》框架下，结合贵安新区建设，在贵安新区核心和规划区调查发现文物点共计 207 处，其中，史前洞穴遗址 140 余处。2012 年至 2020 年，对牛坡洞遗址进行了持续 9 年的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入选 2016 年度全国六大、十大考古新发现，2018 年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三等奖。2016 年至 2020 年，对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进行了持续 5 年的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入选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2 年，牛坡洞遗址和招果洞遗址入选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2015 年，对贵安新区门岩洞、扁嘴洞遗址进行了小范围试掘。二是配合新区建设的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收获。2013 年至 2014 年，配合贵安新区建设，对马场镇沙坡、杨家桥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进行钻探和抢救性发掘。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贵州医科大学等高校新校区也落户贵安，用地范围内均有墓葬分布，2022 年至 2023 年进行考古发掘，均取得重大收获：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内发现隋唐时期墓葬 20 多座；贵州医科大学贵安校区内共发现两晋至元明时期墓葬 2500 多座，为配合解决贵州医科大学交通问题而实施的西纵线建设，开展钻探工作时发掘唐至明时期墓葬 289 座，出土器物丰富。大松山墓群入选 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贵阳贵安考古 70 年，是风雨兼程的 70 年，是硕果累累的 70 年，一代代考古人在贵阳贵安这片土地上，青灯黄卷，孜孜以求，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追寻祖先的遗迹，通过一件件重见天日的文物，书写出贵阳贵安那些



湮灭于黄土中的历史。每一个考古发现就是一个故事，讲述着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鲜活生命，他们曾经是这片土地的主宰，当一切成为历史，出土的文物成了他们存在过的唯一证明，链接着过去和现在，重塑了物质与精神。

贵阳贵安历史悠久而深厚，但他又像一位失忆的“老人”，纵然曾经有过无限的荣光，却无法言说，考古人通过 70 年艰辛的考古工作，帮这位“老人”恢复了记忆，并将历经艰辛获得的考古成果集中呈现在本书之中。本书透过文物，描绘出 4 万年以来，在贵阳贵安所代表的黔中大地上，不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场景，是第一本用考古材料通写贵阳贵安历史的书籍，同时具备科学性和可读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后续的城市规划开发、文物活化利用、历史价值传播和城市文化品牌打造都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第一章 史前之光

贵州有着发育良好的喀斯特地貌，广泛分布的洞穴成为古人类栖息的家园。目前已发现的史前洞穴遗址有 500 余处，其中能确认属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或地点约 100 处。

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存主要以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为主，如贵安新区招果洞、牛坡洞遗址等的出土物，除丰富的打制石器、打制骨角器外，还有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遗物，并清理出灰堆、火塘、活动面、墓葬、石器加工场等各种人类活动遗迹，年代距今 4 万年左右。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了数量丰富、磨制精美的骨角器，迥异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揭示了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新，可见古人类生业方式的改变和技术的发展。石器打制技术有着邻近区域间的相似性和早晚继承关系，体现出贵州早期人类文化的独特性及人群间的文化交流。黔中地区洞穴中发现的大量墓葬，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特征及埋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阶段的牙齿、头骨等人类化石的出土，为贵州远古人类起源、早期人类迁徙及体质进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物证。

贵阳贵安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为洞穴遗址的上层部分，叠压于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之上。洞穴代表性遗址有平坝飞虎山洞穴遗址、开阳哨上打儿窝遗址、观山湖区肖家洞遗址、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等。大量骨锥、骨针、骨铲及石斧、石雕刻器的出现，既说明传统渔猎、采集生活



方式的延续，又表明精细化作业的发展。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出土了一件目前在贵州洞穴遗址里发现的唯一一件新石器时代修复的完整陶罐，说明当时的人们除了渔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外，还开始对洞前的土地进行耕种，出现了农耕生产方式。目前发现的黔中地区洞穴遗址典型的旧、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叠压的延续现象，对于解决旧、新时代过渡时期相关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上还发现有商周时期文化层，说明贵州先民对洞穴有着长期的依赖性。

第一节 招果洞遗址

一、在大地上绣花

考古工作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严寒中，烈日下，考古工作者用手铲和刷子将泥土一点一点地剔除，直至遗迹和遗物暴露出来，在测量、记录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清理。旧石器考古工作和其他时段的考古工作相比，对细致程度的要求更高，有人做过形象的比喻，考古发掘就如同在大地上绣花。

2016年4月，招果洞遗址被发现后，联合考古队开始在招果洞进行考古试掘。通过调查工作，确认了招果洞遗址具有极高的科研潜力和学术价值，如何将这样一个信息量巨大、保存完整的洞穴遗址通过考古工作厘清，将古人类活动的信息提取出来、研究清楚，是当时考古队面临的重大难题。按照常规的考古工作思路，要在洞口布设探方，逐层下挖。这种看似规范的做法，对于招果洞这类遗址来说也有不小的弊端，主要表现为发掘速度较慢，不能很快地了



招果洞遗址 DEM^①图



招果洞遗址全景航拍

① 数字高程模型。



解整体堆积情况，无法根据不同时段的堆积预设相应的学术问题，做出针对性的发掘方案。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对于招果洞这样重要的遗址，发掘方案的制订必须谨慎，还是应该对遗址继续深入勘查后，再制订发掘方案。

2016年3月，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招果洞是一处工作潜力巨大的洞穴遗址，为了对后续工作量进行评估，需要进一步摸清招果洞遗址的文化堆积情况。

文化堆积是指在洞内生活过的不同时期的人类所产生的遗物和自然堆积物逐渐堆积形成的地层，其中既包括和人类活动相关的遗存，也包括因自然原因产生的泥土、石块等。

要了解一个遗址的文化堆积，比较常用的方法是进行考古勘探，或者开掘探沟，但这两种方法都被大家很快否决。考古勘探显然不适用这个遗址，因为



招果洞遗址近景

勘探一般使用探铲，也就是俗称的洛阳铲，利用探铲开凿一个探孔，并将探孔内的泥土一点一点地提上来，将这些提上来的泥土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排列，从这些泥土的质地、颜色和所包含的遗物上，就可以快速判断这个遗址的基本堆积情况。这个方法虽然便捷，但也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一旦碰到石块，就无法继续深入。从洞内的情况判断，招果洞堆积中的石块数量很多，不适合勘探。如果开掘探沟，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堆积如果太深，探沟要想探到底，就必须要有足够大的面积，一般来说，试掘精细程度要低于正式的考古发掘，如此大面积的试掘会损失掉很多历史信息，对考古队员们认识遗址的整体面貌产生影响。



招果洞遗址发掘区



一筹莫展时，考古队员们在堆积的中部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晚期坑，整体呈漏斗形，深度不详，坑内的填土要比外部的填补更加松软，土色更深，包含清代的钱币、青花等遗物，初步推测这是一个因洞内水流溶蚀形成的漏斗状塌陷区，在清代被填满。把塌陷坑内清代的堆积清理干净，不就是一个天然的探坑吗？这一方案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后来的考古工作也证明，这一决定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原生堆积的破坏，节省了劳动力，以最快的时间了解到了遗址的整体堆积情况。科学合理的发掘方案确定后，发掘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2016年底，考古队员们就拿到了几乎整个文化堆积的测年数据，为后面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考古发掘工作从2016年3月持续到2020年12月，先后有来自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40多人参与到招果洞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涉及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古DNA等研究方向，在贵州的洞穴考古中，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联合研究的成果范例。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工作和其他时段的考古发掘在方法上存在显著的区别，首先在地层控制上，在同一自然层内，要按照5厘米水平层逐层向下发掘，这对考古工作的精细度要求特别高，每件出土遗物都要测量其精确的三维坐标，这些操作规范极大地限制了考古发掘的速度。为了提升工作效率，发掘工作使用Newplot软件，结合全站仪，记录每个出土文物的三维信息，并使用三维重建技术，记录每个发掘层面的三维模型，这也为后续考古工作提供了详细丰富的数字考古信息。

二、四万年“地书”

经过5年的考古发掘，招果洞遗址的地层剖面看上去已经非常宏伟。按照考古工作规程，考古队员们将招果洞遗址的堆积从上到下进行编号，一直编到了第25层。这层层叠叠的地层，从远处看，像极了历史的“书页”，那些地层



招果洞遗址剖面图

中出土的石器、骨角器、动物化石就好比是“书页”中的“文字”，那是只有考古人才能识读的“文字”，记录了在那个洪荒的年代里，一群又一群人来到这里，又离开这里，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记录了他们一次次带着猎物满载而归，围火而坐，琢石成器，磨骨成锥。随着最后一批洞穴居民的搬离，这里终于沉寂了下来，汇总成了厚达8米、记载了4万多年人类历史的招果“地书”。

这4万多年的人类活动史从早到晚大致可分为4个大的时期，细分为6个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从早到晚，从下到上，共分为25层。这些时期和阶段就如同书的“章节”，每个“章节”都有自己的特点，反映在土层的质地、颜色和出土的遗迹遗物上。区别背后的动因，可能是族群的更替，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加，环境的变化。



（一）初来乍到

第一个时段是第一期早段，对应的是剖面上的第 21 ~ 25 层，通过碳十四测年可知其年代为距今 4.5 万年至距今 3.7 万年。如果到现场看到遗址剖面，你就会看到这个时期的地层犹如黑黄交替的夹心饼干。黑色的层位是人类活动所形成，之所以变黑，是人类的用火行为导致的，在面上延展开来，考古队员们称之为人类的活动面。而黄色的层位则是自然形成的，主要是洞顶和洞口的黄土被水携带进入洞穴沉积形成，缺少人类活动的参与，颜色也显示出很纯正的黄色。或许有人好奇，人类在洞里面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走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当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当时人类还处在狩猎采集阶段，不能自己生产食物，食物来源无非就是狩猎来的动物和采集来的植物，都是直接获取的自然的馈赠，这种直接攫取的生活模式对当地的自然资源具有较强的消耗，当这种消耗的速率大于当地的生态恢复周期，人们的食物来源就会受到影响，必须迁



招果洞遗址第一期早段磨制骨器

徙到下一个居住地，因此才会形成人类活动层和自然堆积层交互叠压的现象。

从这一阶段的出土遗物及遗迹活动面的面积判断，当时的活动规模不大，人口也应该较少，这个时期出土的遗物有古人类打制的石器、哺乳动物的骨骼，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了 2 件磨制的骨锥，这也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磨制技术。

（二）凛冬已至

叠压在第一阶段上的是人类活动的第二阶段，考古队员们将其划分为第一期中段，对应遗址中的 16 ~ 20 层，碳十四年代从距今 3.7 万年至距今 1.7 万年。这一阶段同样是人类活动地层和自然形成的地层交互出现，说明这一时期的古人类仍然过着迁徙的生活。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人类活动面面积明显增大，火塘厚度和面积也明显增加，这是否说明当时洞内生活的人口数量增加了呢？考古队员们推测可能和一次极端气候事件有关。这一时期跨越了一次重要的极端气候事件，古气候学家们称之为末次冰盛期，这次发生在距今 2.6 万年至距今 1.9 万年之间的古气候事件，导致当时气温降低，降水减少，南北极冰盖扩张，更多的水以冰的形式存在，导致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低 130 多米，沿海大陆架出露。由于北极冰盖扩张，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和西伯利亚之间的白令海峡上形成了巨大的冰桥，生活在东北亚地区的黄种人沿着冰桥第一次将人类的足迹印在了美洲大陆，成为后来印第安人的祖先，最新的古 DNA 研究成果也支持了这一推论。同时，这一极端气候事件同时改变了人类适应环境的方式。在一些地区，降水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如在北方的一些遗址中，这个时期的居民开始更为频繁的迁徙生活。生活在华南地区的穴居人类，在迁徙频次上，较早期并未有明显的变化，用火行为却明显地增强了。

（三）广谱渔猎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招果洞遗址也迎来了新的时期，第一期晚段，对应遗址剖面的第 12 ~ 15 层。这一时期的人类活动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已经几乎看不到因纯自然成因形成的黄色地层了，人类的活动贯穿了这一时期，而找不到人类



招果洞遗址第一期中段磨制骨器

活动的间歇层位。这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末次冰盛期结束后的降水增加，生态环境向好，本地动植物资源的承载能力明显提高，为这一时期的古人类提供了充沛的食物来源。另外，考古队员们在这一时期的地层中发现了较多的水生动物的遗存，比如鱼类、蚌壳等，可称之为广谱渔猎经济明显增强，这或许和环境向好、雨水充沛、水生动物资源丰富有关，也或许和人类知识的积累和认知能力的提升有关。总之，这一时期食物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人类制造的石器和骨角器数量也显著增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和早期地层不同，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在人类活动中心区附近很少见到较大的石块，说明从这一时期起，招果洞的居民们已经主动开始对

自己生活的环境进行改造，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

在这一时期，遗址中开始出现大量的鱼类骨骼，这些骨骼大多是零散分布，有青鱼、鲤科等种类。如此多的鱼类骨骼，反映出渔猎经济在当时生业中的重要地位。这些鱼类的食用方式一直是考古队员们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在一期晚段层位中，还发现了一件通体磨光磨制石器，在石器的刃部沾染了较多的赭石粉末，这是目前年代最为确切的超过一万年的磨制石器之一。石器表面的赭石粉末应该和人类的象征性行为有关，表明人类行为的复杂化，同时为探讨磨制石器的起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同时，在这个阶段，考古队员们还在地层中发现了一包完整的鱼骨，保存完好，甚至连一些细小的鱼刺都得以保存。鱼骨的排列显示并未被扰乱，从分布范围和排列判断，应当有容器盛装，但在发掘现场并未发现任何容器的痕迹。在请教相关专家后，考古队员一致认为盛装的容器很可能是有机质容器，可能为动物的肚脏或者树叶等。目前，这包鱼骨已经被整体提取，计划进行进一步检测分析。



招果洞遗址第一期
晚段出土的鱼骨



招果洞遗址出土的
通体磨光磨制石器



（四）倒春寒

这部宏大的地书持续翻页，进入了遗址的第二期，对应遗址的9~11层，碳十四年代为距今1.2万年至距今1万年。这一时期的地层颜色和早期晚期都有明显的区别，其颜色特别深，含碳量特别重，用火强度极高，这可能和人类经历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全球性极端气候事件——“新仙女木事件”密切相关。这次事件是人类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前经历的最后一次极寒，被称为人类历史的“倒春寒”。

距今约1.2万年前，变暖的趋势突然被打断了，只用了短短几十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可能下降了6~8℃，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之前，人类历史正式进入了一次“倒春寒”，一冷就是1000多年。这场突如其来的“倒春寒”在距今约1.1万年突然结束。古气候资料显示，在一些地区只用了10年，年平均气温就回升了10℃左右。

这次来得突然、去得突然的“倒春寒”，被称为“新仙女木事件”，它得名于一种植物——仙女木（*Dryas octopetala*）。仙女木是一种耐寒不耐热的植物，会开出白色的小花，有人称之为“寒冷之花”。目前，仙女木只分布于北极地区，但是在这次被称为“新仙女木事件”的“倒春寒”期间，“寒冷之花”几乎开遍了整个北半球，这也是大降温的证据。

种种证据表明，第二期的地层之所以颜色如此之深，就是因为这一时期古人类高强度的用火行为，而“新仙女木事件”恰恰就是其背后的气候动因。

第二期的重要发现远不止如此。人类进入到这一时期后，随着认知能力的提升，开始出现非常典型的埋葬行为。

贵州洞穴遗址考古开始于1964年，在之后的考古工作中，发掘了很多重要的史前洞穴遗址，也出土了很多人类本身的骨骼化石，包括桐梓人、盘县人、兴义人等，但这些人类化石都是在地层中被发现的，还从未发现过确信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埋葬行为。

在2017—2018年，当招果洞遗址考古发掘至第二期，也就是距今1.2



招果洞遗址 5
号火塘 (HT5)



招果洞遗址 40
号火塘 (HT40)



招果洞遗址
41 号火塘
(HT41)



万年距今 1 万年的层位时，发现了两座墓葬，这是首次在贵州确认超过万年的人类埋葬行为，也是目前已知华南地区最早的墓葬之一，对于探索人类心智发展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1 号墓位于洞口靠近北壁的位置，是一个土坑墓，也就是在地上直接挖坑，葬入死者后，再用土进行掩埋。人骨盆骨以下缺失，应该是朽坏了。上肢弯曲，从土坑的尺寸判断，下肢如果没有朽坏，也应该是弯曲状，考古队员们将这一类墓葬称为屈肢葬，与考古队员们所熟知的直肢葬存在明显区别。为何将人弯曲下葬？有多种说法：一种解释是为了减小墓葬面积；一种认为死亡和睡眠被古人认为有某种联系，用常用的睡姿作为葬姿，是让死者以最舒服的姿势长眠；还有一种认为这种姿势和婴儿在母体中的姿势接近，带有回归母体的寓意。不管如何，贵州距今超过一万年的墓葬中，屈肢葬是主要的流行葬式。可能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比较广泛的交流，已经拥有较为一致的埋葬习俗，形成聚落性质的社会组织。

经过体质人类学鉴定，1 号墓埋葬的是一个 25 岁左右的男性。有意思的是经过仔细对比和测量，考古队员们发现他的左手比右手更为强壮，考古队员们称为左利手，即考古队员们常说的左撇子。因为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右利手，左利手的比例较低，现实生活中一些左撇子也会被刻意地进行矫正，甚至在晚期的一些宗教中，左手被认为是不洁和卑下的，但在史前时期，古人类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的利手争论却从未停息，有学者通过古人类打下来的石片的形态去推断利手问题，有些通过史前的岩画去推断利手问题，甚至到了新石器时代，有学者仍然认为彩陶和岩画的创造者仍然保持着左利手主导的趋势。现在的人群中，明显的右利手占主导地位，从左利手倾向到右利手主导的形成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变化的机制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可能是实用性的原因，也可能是神秘的精神力量，也或许人类的右手更容易触摸到最重要的脏器——心脏。总之，招果洞遗址出土的左利手古人类，为考古队员们研究本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行为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



招果洞遗址
1号墓(M1)

人类的遗骸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载体，除了葬式葬俗包含了古人类行为、审美、精神方面的信息外，还包含了诸如体质特征、食谱、病理等重要信息，这些信息需要借助各种科技考古方法去提取。举一个比较重口味的例子，今天的人们为了保持牙齿的健康和美观，会到医疗机构去洗牙，洗掉的部分就是附着在牙齿上的牙结石。牙结石的形成一般是因为古人类没有清洁牙齿的习惯和条件，



少数遗址只发现有过刷牙的习俗，但这显然不能将牙结石清理干净。因此，牙结石在古代人群中具有普遍性，这些牙结石包含了多种来源的古DNA和蛋白质，以及植物孢粉和淀粉颗粒等植物微体化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类的膳食结构，是研究古代人类食谱的重要信息载体。

考古队员们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在1号墓主人牙齿表面就发现了牙结石沉积，在对牙结石的成分进行显微观察后，发现部分薯蓣科、部分葛根，少数未知种属的淀粉颗粒，说明当时人类对块茎类植物的食用已经比较普遍。葛根在古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植物，不仅富含淀粉，葛藤还可以制作葛布，在江苏草鞋山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层就发现过葛纤维的纺织品。招果洞的发现，将中国食用葛根的历史提早至一万多年前。

两座墓葬中，考古队员们对2号墓的发现印象最为深刻。在狩猎采集阶段，儿童的夭折率很高，不像现在有其他的乳制品作为母乳替代品，那时的婴儿主要依靠母乳喂养，而母亲可能因为很多原因无法供给母乳，如生育导致的死亡，营养不足或疾病导致的母乳不足等情况，一旦失去母乳的供给，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除了母乳的原因，婴儿自身抵抗力不足导致的死亡也时常发生。招果洞2号墓就是一个处于哺乳期婴儿的墓葬。考古队员们在发掘墓葬时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回到一万年前的，那是一个刚来到这个世界不久的鲜活生命。考古队员们在墓葬内发现了一些树籽和一件骨质的鱼钩，联想到和墓葬同时代的地质层中出土的大量鱼类骨骼，考古队员们有理由推测渔猎经济在当时人类的生计中占有重要比重，这件鱼钩可能是他的亲人送给孩子的最后一件礼物，寄托了他们对这个小生命无尽的哀思。

考古队员们联合高校，对两座墓葬的人骨同时进行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C、N稳定同位素分析是目前国内外生物考古界揭示古代（现代）人群食物结构的主流研究方法之一。该方法的原理为人体组织的稳定同位素比值与其消化吸收转化而来的食物成分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有考古学家将其概括为“我即我食”。通过分析，1号墓主人生前的食谱中，肉类占多数，是一个绝对肉食主



招果洞遗址2号墓(M2)

义者，食物来源主要为哺乳动物。而2号墓主人骨骼中N含量比值出奇的高，当时还未对两座墓葬的年龄进行鉴定，这一结果直接困扰了考古队员们。C、N稳定同位素分析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分析方法，又是在非常顶尖的机构进行的实验分析，结果应该是可信的，但为何被考古队员们认为是同一个族群，时间又十分接近的两座墓葬，结果差异却又如此明显？后来随着体质人类学鉴定结果的公布，考古队员们才知道2号墓是一个孩子，可能还处于哺乳期或断奶不久。如此高的N含量比值不太可能通过陆生动物获取，而更可能是通过鱼类等水生动物获取到的。联想到这个孩子还处于哺乳期，或许可以推测，当时的孕妇或产妇可能被族人优待，获得更多的水生动物分配权。现代社会依然有为了使产妇奶水丰足，专门为其烹饪鱼类的习俗。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我国进入农业社会后的古代社会，儿童在2岁左右已经开始摄入辅食，3~4岁已经完成



断奶，断奶后的儿童，其食物中包含更多的植物。

（五）大暖期

遗址进入第三期，对应的地层在第2~8层，年代为新石器时代。结束了“新仙女木事件”的“倒春寒”，人类历史终于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这个时期人类的技术持续进步，一些新技术开始出现，人类开始更加注重居住环境的改造和功能分区。

招果洞遗址这一时期出土的陶器全部为陶片，现未能复原出完整器形，这些陶片按照质地分为夹砂陶、泥质陶，以夹砂陶为主。陶片的颜色有土黄色、灰褐色、灰黑色等几种，其中土黄色陶器数量最多。陶片整体制作水平不高，大部分陶质较脆，略软，多为细碎的残片，尺寸为2~4厘米。陶胎所夹羸和料有石英、方解石、白云石等矿物颗粒及陶渣、炭渣等。陶片纹饰较简单，大部分为绳纹，包括粗绳纹、细绳纹、交错绳纹等，其次为素面，以及少量篦齿纹、附加堆纹、戳印圆圈纹、篮纹等。陶片保存状况差，无可辨器形，仅少数可辨



招果洞遗址
出土的陶片

认为口沿部位。

综合来看，招果洞遗址陶器出现的时间与周边地区差别不大，同时，和其他洞穴遗址的发现类似，陶器的数量比较少，同时比较细碎，整体反映出招果洞居民对陶器的需求不是很强。陶器一般是用于收集和烹煮细碎食材的工具，这一时期遗址内发现了大量野生动物骨骼和少量的植物遗存，植物种子、螺蛳等细碎食材较少，这可能和贵州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关，这一时期的人类仍然延续着狩猎采集的生业传统。食谱中需要集中烹煮的细碎食材的比例较少，这可能是贵州洞穴遗址中陶器较少的背后原因。

（六）最后的史前穴居人

第四期文化遗存主要来自遗址第1层，本期未发现遗迹。这一层是洞穴的表土，里面的包含物年代非常复杂，既有早期地层中的石器、骨器，也有晚期明清时期瓷器、铁器等。早期地层中的遗物怎么会来到表层呢？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洞口的石墙，这道石墙的砌筑时间是清代晚期，可能与当时的社会动荡存在关联。当地的老百姓为了自保，找到适宜居住的洞穴，在洞口砌筑石墙，抵御外来袭击。在挖石墙基脚的时候，早期的遗物被翻到洞穴的表层，与当时的遗物混杂堆积。

三、敲石成器、磨骨成锥

在冶金术出现之前，岩石是古人类能够普遍获取的最坚硬的原料。古人类依靠敲击岩石制作工具，这样的工具就是打制石器。古人类利用敲击破裂产生的刃口，切割和加工劳动对象，其用途一般是切割肢解动物，挖掘植物根茎及开展其他的基本生存活动。后来随着技术进步，打制石器的类型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先进，其功用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石器凭借其特性成为各个旧石器遗址中保存数量最多的遗物，对于研究古人类的技术、生业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招果洞遗址出土的大量的打制石制品，器形相对简单。原料主要为黑色燧



石和石灰岩，以黑色燧石为主。燧石，俗称“火石”，是一种致密、坚硬的硅质沉积岩，主要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常为浅灰或褐黑色等颜色，莫氏硬度一般在 7 左右，破裂会产生贝壳状断口。燧石主要产于石灰岩中，有的呈层状，有的呈结核状，是贵州史前洞穴居民加工石器的主要原料。

加工石器，首先要有一块岩块，作为剥片的母体，利用另外一个石块对剥片的母体进行打击，直至母体断裂，产生片状燧石。这个母体称为石核，打下来的片状的岩石称为石片，其间也会产生一些没有按照既定目的断裂的岩石，有断块、废片等，打制过程中还会崩掉一些细小的石屑，称为碎屑。有的断裂石块的刃部会被进一步加工或使用，这便成了工具。以上这些统称为石制品。招果洞遗址的石制品大致可分为石核、石片和工具。招果洞遗址加工石器的原料，在早期阶段以燧石为主，另有少量的石灰岩。到了晚期阶段，原料种类开始增加，除了燧石和石灰岩外，还有蛋白石、石英岩、细砂岩、水晶等。同样是燧石，晚期燧石的质量要明显高于早期燧石的质量，这可能说明随着人类的心智发育和技术提高，对周边石制品特性的认知逐渐提高，活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除了加工石器的原料种类逐渐增多外，石器的类型也有所增加，除最初的刮削器、普通凹缺器和尖状器组合外，逐渐增加了锯齿刃器、克拉克当型凹缺器等新器型。总之，招果洞遗址从早期到晚期所反映的石器技术逐渐呈现出向复杂化、规范化发展的趋势。

骨角器是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工具类型。贵州是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骨角器的重要分布区，主要发现于史前洞穴遗址中，具有数量多、加工精致的特点，类型包括锥、铲、鱼钩、鱼镖、箭头等，其中以锥和铲占多数，原料多为哺乳动物的肢骨和鹿角。这些骨角器的大量出现说明古人类对骨、角等有机质材料的特定属性有了深入的认识，具有了相对规范的加工流程，一般通过刮削、磨制、抛光等技术手段制作，具有特定的形制和用途。

招果洞遗址第一期早段发现的两件距今约 4.5 万年的磨制骨锥，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磨制骨器，这两件磨制骨器均为骨锥，仅存尖端部分。到了



招果洞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制品



招果洞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



晚期后，磨制骨器演化为通体磨光。除了锥以外，也出现了铲、针等器形。原料也从早期的骨头扩展到鹿角，用鹿角加工的只有铲，还未发现用鹿角加工的其他器形，在其他遗址中发现过用鹿角加工过的角锥。

对于骨角器的用途，考古队员们做了一些初步的显微观察，在大部分骨器的表面发现有大量纤维划痕，形成了肉眼可见的油光面，可能和动物的皮革加工有关。从一些民族志材料中也不难发现，许多现生狩猎人群在对鹿皮等动物皮张进行制革时，往往利用鹿的炮骨制作刮刀，这些刮刀的刃口圆滑，刃端呈圆弧形，用于剔除动物毛皮上的脂肪、筋膜、肌肉，这类工具和遗址出土的骨角铲在形态上具有较多的相似性。

四、远古的盛宴

在招果洞人生存的年代，生存和繁衍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工作，而基本的生活保障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分别针对动物资源和植物资源。了解古人类的食谱是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上文提到了牙结石包含很多人类食谱的信息，但牙结石附着于人类化石本身，并非每次都能发现。实际上，古人类食用动物和植物资源以后，都会有一些残留物，这些残留物在遗址中慢慢堆积，是考古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狩猎动物后，首要工作就是要带回居住地，对于穴居人来说，就是要带回洞穴，对于体型较小的动物并不困难，但古人类有时会狩猎到体型较大的动物，如大型鹿类、牛、象、犀等，将这些大型动物带回洞穴并非易事。

在贵州马鞍山遗址中，研究者根据体重将动物分为4个等级：第Ⅰ等级是活体体重在10～50千克之间的动物，包括猕猴、大灵猫、獾、小野猫、狼、麂和鬣羚；第Ⅱ等级是活体体重在100～200千克之间的动物，包括黑熊、大熊猫、水鹿和猪；第Ⅲ等级是活体体重在300～1000千克之间的动物，包括水牛和獾；第Ⅳ等级是活体体重在1000～3000千克之间的动物，包括中国犀和东方剑齿象。



招果洞遗址出土的磨制骨角器



招果洞遗址出土的骨堆正射影像



体型较大的动物头部和肢端骨骼（肢端包括腕 / 跗骨、掌 / 跖骨、指 / 趾骨）数量占明显优势，这可能是远古人类迫于动物体型太大，只能将可肉食部分带回驻地，而将大部分骨骼抛弃在猎杀动物的现场造成的；肢端骨骼数量较多可能是远古人类将之作为皮容器的把手 (handles) 被带回洞穴的结果，民族学资料中即有这样的记载，猎物被杀死后，猎人常以剥下的兽皮作为运送内脏和碎肉的容器，而肢端则被当作运送猎物时把握的部分保留在兽皮上；头部的结构复杂，很难在短时间内对其营养物质进行较为彻底的开发，因此头部单元数量较多可能是远古人类倾向于将之带回驻地再对营养物质进行开发的结果。

招果洞遗址目前发现的水生动物有螺类（中国圆田螺、中华圆田螺）、蚌类和鱼类（青鱼、中华倒刺鲃）。陆生哺乳动物有鹿类（水鹿、梅花鹿、麂、獐）、牛、猪、虎、狼、熊、兔子、猫（豹猫、灵猫）、獾、豪猪、竹鼠、田鼠、鸟类等 20 多个种属。从数量上来看，鹿类占据整个动物群的主导地位，末次冰盛期结束以后，气候回暖，鱼类骨骼也开始大量出现。

狩猎活动具有较大的偶然性，采集利用植物资源是古人类生活的重要保障。植物资源大多属于有机质，不像动物骨骼易于保存，但总有些植物的种子、果壳因为人类的用火行为而发生炭化，被永久地保存下来。要获取这一类遗存，必须利用水的浮力将泥土内炭化的植物遗存进行分选，这种方法叫作浮选法。利用这种方法，考古队员们在招果洞遗址内发现了较多果壳、猕猴桃属、朴属、蓼科和未知种属的植物种子。

五、历史的尘埃

对古人类生存繁衍的气候背景研究是研究古人类发展历史的重要内容，不同时期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人类的生计和行为都会产生强烈的影响。

在现代气候记录仪器产生之前，只有通过一些历史上的自然记录来恢复温度、降水等气候信息，常用的自然记录载体包括深海堆积、湖泊沉积、风尘堆积、

冰芯、石笋、珊瑚、树木年轮等，中间涉及样品采集、科学实验、函数转化等具体的工作环节。

贵州喀斯特地貌发育，石灰岩洞穴中的石笋就成了重要的古气候信息的载体。招果洞遗址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构造，洞穴外部的岩厦部分宽敞、明亮且干燥，十分适合人类居住，而洞穴内部却较为潮湿，十分适合石笋发育。人类活动和石笋发育在时间上有很大的重合，这些石笋在形成过程中包含了丰富的古地磁、古气候、古环境信息，为考古学研究和古环境、古地磁研究相结合，探讨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演化过程提供了理想的样本。因此，考古队员们与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系周祐民教授团队合作，试图打开石笋中包含的“古气候密码”。

为此，研究团队对招果洞的洞穴发育过程、石笋发育情况进行了大致的分析判断，仔细搜寻并挑选合适的石笋样品，以进行年代学和环境磁学等方面的高精度分析测试。当石笋被切开的时候，其内部竟然是黑色的，而不是常见的褐色，这让大家十分震惊，研究团队立刻想到这些黑色层理肯定与古人活动有重要关联。为了证实这一推论，研究团队对黑色层理进行了详细的显微观察和测年。通过石笋中黑色层理的定年结果，发现这些黑色层理中包含着大量的微小木炭屑，同时证实了这些层理的形成时期与遗址中用火的遗迹高度吻合，可以确定古人在洞口用火时，产生的大量烟尘黏附在洞内正在发育中的石笋表面，随着石笋的发育，这些炭屑被包裹进石笋内部，成了石笋层理的一部分，这就是黑色层理的形成过程。

更加有趣的是，石笋中木炭屑分布所反映的不同时代的用火强度，与气候的冷暖曲线高度吻合，也就是说，在气候寒冷的时期，洞穴内的用火强度也相应增加，这能很好地反映史前洞穴居民对环境的适应策略。



第二节 打儿窝遗址

2003年,全省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刚刚启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后简称考古所)作为全省唯一具备考古资质的单位,开始承担此项工作。同年,贵阳至开阳公路开始修建,作为首批需进行前期考古调查的建设工程,考古所对此次调查工作尤为重视,选派了全所的业务骨干参与其中。不久,打儿窝遗址被调查发现,随即进行了考古发掘。打儿窝遗址是贵阳贵安第一次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史前遗址。

一、开启远古的盲盒

试掘工作从2003年9月中旬开始,在4号探方,发现了7座晚期墓葬,其中大多是婴幼儿墓葬。清理后发现,这些墓葬时代较晚且无随葬品,后来在发掘过程中出现了大面积的红烧土面,且一侧发现钙板一块,红烧土面似乎是延伸到钙板下面。考古所判断这一遗迹很重要就决定暂时保留,没有继续发掘。

另外一个探方也有了新发现,发现了两座成人墓葬,编为3号和5号墓。通过对3号墓出土人骨的测年数据,可知其年代为距今 1635 ± 30 年。3号墓开口于1B层下,而1B层又出土了剪轮钱和青釉瓷片,可以推测其年代大致在魏晋时期。5号墓从地层上早于3号墓,年代应更早。

打儿窝遗址的发掘,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次进行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大家就按照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方法,以土质和土色来作为分层的依据,截至发掘停止时,一共发掘了21层。同时,对出土的动物骨骼和木炭进行了年代测定,取得测年数据的有,第1层出土的少量陶片和1枚东汉晚期以后的剪轮钱。最晚遗物是魏晋时期的2块釉瓷片。第7层出土兽骨经测定,年代为距今 19300 ± 80 年。第10层年代为距今 21673 ± 70 年。第13层年



打儿窝遗址近景

代为距今 23540 ± 250 年。第 15 层年代为距今 25870 ± 110 年。第 17 层年代为距今 26675 ± 230 年。第 19 层年代为距今 27520 ± 140 年。第 19 层下面为黄褐色黏土，仍可见兽骨等物，未见生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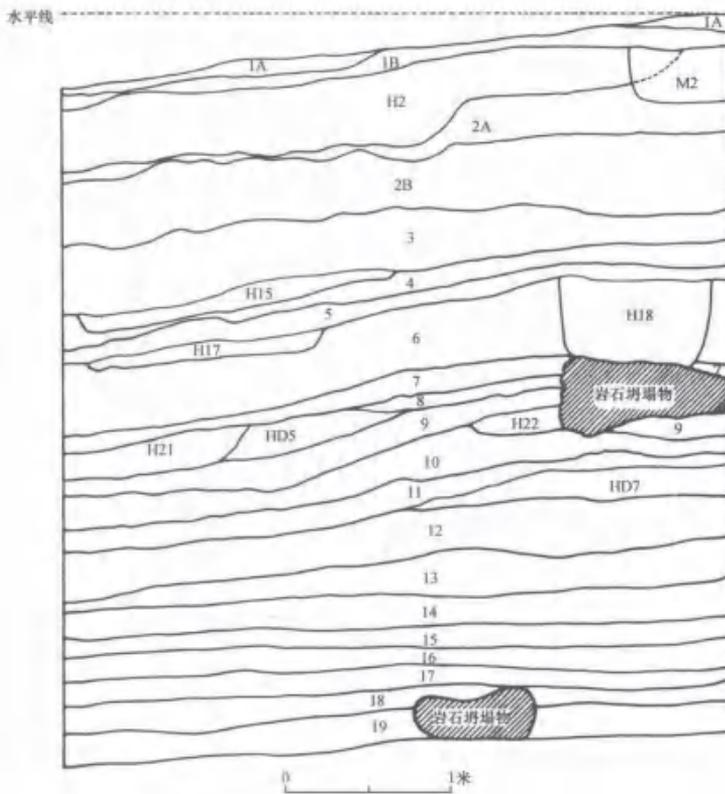
但因为可操作空间狭窄，已经无法继续向下清理，故暂时停止发掘。

打儿窝岩厦遗址的遗迹，只有灰坑和骨堆、灰堆三类，在这些遗迹中间，有着大量的石制品、石器，以及犀牛、鹿的骨骼与牙齿等，灰堆和骨堆内还有烧土颗粒，可见这是远古时期人类聚餐及活动的位置。试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骨制品，其中骨器千余件，骨片和半成品 2000 余件。骨器多使用肢骨为原料，加工方法有打、琢、磨、刮削、切割等方法，类型最多的为尖状器，占比 90%



左右。另有少量的铲形器和骨锥、骨刀，还有极少的利用动物角制作的角器和牙器。石器材料则以燧石为主，其次为水晶，再次为砾石。石器中占比最大的为刮削器，为石器总数量的 63.9%，可以分为单刃、双刃、复刃三类，其次则是尖状器，还有少量的砍砸器和特殊石器。石片有 700 余件，制作方法主要为锤击，包括少量砸击和锐棱砸击石片。石核则主要是锤击石核，有少量砸击和锐棱砸击石核。

打儿窝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以水晶作为原料加工



打儿窝遗址 T6 东壁地层剖面图



打儿窝遗址出土
的骨器



打儿窝遗址出土
的鹿角



打儿窝遗址出土
的犀牛牙齿



的石器比例较大，数量较多，仅次于燧石，这很可能和当地的原料丰富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考古队员还对加工石制品的原料来源进行了调查。经过几天的调查，考古队员在打儿窝遗址附近一处名为大营的地方发现其地表散布着大量的天然水晶晶簇。这些晶簇大小不一，颜色各异，很可能就是生活在打儿窝的古人加工石器的原料来源之一。

此次出土的动物骨骼近千斤，90%出土于晚更新世地层，从中可知当时人类主要的食谱为食草的鹿类，占比80%以上，其次则为牛、犀牛，也发现巨獭、竹鼠、猴、豪猪、野猪、羊，还有熊和虎这类猛兽。水生的动物仅有田螺和蚌两类。

通过这次的试掘可知，打儿窝人类生活于距今27000年至距今15000年



打儿窝遗址出土的石砧



打儿窝遗址出土的石器

之间，他们使用的工具以骨器为主，间以石器为辅。但该遗址的骨器制作粗糙，远不如同时期的穿洞精美。从贵州发现并已经报道的出土骨器来看，除了平坝飞虎山遗址下层出土的骨器之外，都较打儿窝出土骨器更美。而石器的修理加工方法则以反向加工为主，这一点同贵州兴义猫猫洞文化类型出土石器的加工方法相同。该遗址的整个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堆积厚，出土遗物相对丰富，可见在该时期人类长期生活于此，但这个时期的文化面貌较为原始，应该没有延续至旧石器时代晚期，而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出土遗物较为稀少。且对出土陶片进行观察后，考古队员判断其来自外来文化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推测在打儿窝遗址，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因某种原因终结或者迁移，新石器时代则可能有少量打儿窝原人类后裔继续生活于此，也可能是一批新的人类来此定居。



打儿窝遗址出土的水晶刮削器



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打儿窝遗址是一处非常特殊的遗址，其特殊之处首先表现在遗址周边的地形地貌上。考古队员对已经调查确认的史前洞穴遗址周边环境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堆积情况较好。文化堆积丰富的洞穴遗址周边环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洞前一般都有一处十分开阔的坝子，洞穴周边不远处都有河流流经，洞穴本身则宽敞开阔、采光条件好，洞前为缓坡地带，便于古人类进出洞穴。但打儿窝遗址却与上述条件背道而驰。从周边环境看，打儿窝遗址孤零零地待在南江大峡谷的边缘地带，周边没有平坦的坝子，地形落差很大。再看洞穴本身，打儿窝遗址是一处十分狭窄的岩厦，可供栖居的面积十分有限，岩石上部是一个陡崖。同时，岩厦前方坡度较陡，给古人类的进出造成诸多不便。但就是这样一处 在考古人眼里条件十分“简陋”的遗址，却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动物化石，巨厚的文化堆积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人类活动遗存，这些遗存的年代，从距今接近 3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打儿窝遗址发掘后，在了解清楚遗址堆积年代的同时，无数疑问萦绕在考古学家的脑中，这样“简陋”的洞穴条件靠什么留住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古人又是如何捕获如此多动物的呢？

2018 年，艾尔伯特·休斯执导的《阿尔法：狼伴归途》在北美上映。该片讲述了在 2 万年前的末次冰盛期，古人类和狼的故事。主线是部落首领的儿子科达在一次围猎活动中坠落悬崖，后认识了一条狼，并取名阿尔法，人狼之间由对抗关系转为陪伴关系，人狼相伴，最终回到部落，狼也留了下来成了后来狗的祖先。这部电影中，导致科达坠落悬崖的狩猎活动很有意思，一群古人类埋伏在野牛群附近，为了尽量接近野牛群，他们甚至将野牛的粪便涂抹在身上来掩盖人类的气味，当距离足够接近时，古人通过吼叫和投掷标枪将野牛驱赶向悬崖，野牛由于惯性跌落悬崖摔死后，古人去捡拾因摔碰死亡的野牛，并将其带回部落。

实际上，这种狩猎方式并非导演凭空想象，而是确实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这就是北美印第安人狩猎野牛的狩猎方式。发现和确认这种狩猎方式的古遗址被命名为野牛跳崖处，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境内。野牛跳崖处是印第安土著居民的一个围猎场，是北美最大、最古老的狩猎场。考古研究发现，它从距今5700年前开始使用，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它包括圈牛区、屠宰区和加工处理场几个部分。美洲野牛被圈到这里后，即被赶下悬崖摔死，悬崖之下白骨累累，被赶下这道悬崖摔死的野牛不计其数，这道悬崖因此也被称为“死亡之涧”。这里发现的一些土坑是专为贮存、烹煮野牛而挖的，里面埋藏了大量的牛骨，有的深达11米。野牛跳崖处完整保存了世界上最古老的狩猎古迹及悬崖下古老的加工遗址，鉴于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1981年，野牛跳崖处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打儿窝遗址的地形和野牛跳崖处有相似之处，同样在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此处重要的遗址是否也是一处和史前狩猎相关的遗存呢？这需要更细致、更系统地发掘和研究。

打儿窝遗址是贵阳辖区内正式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一处新旧石器交替时期的遗址，也是贵州考古人第一个独立发掘的洞穴遗址。发掘者未受过旧石器考古的系统训练，在发掘方法上同传统旧石器发掘方法不同，因而缺失了不少来自遗址的重要信息，但打儿窝遗址对于复原贵阳地区古人类活动场景、探讨生存策略具有重要意义。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和研究，描绘出一幅近3万年以来人类在贵阳一角的生活图景，大量鹿、牛骨骼、牙齿的出现，说明该类习性温和的动物是当时人类能获得的主要肉食来源，侧面反映了这些人类的武力值并不高。早期地层中没有水生动物化石而在晚期地层开始出现，则说明有可能人类除猎杀动物、挖掘根茎的生活方式以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获取物资的方式来帮助人类走完漫长黑夜，进入文明。



第三节 牛坡洞遗址

一、洞出贵安

考古学家经常把多元一体格局下的中华文明的源头追溯至史前时期，认为不同区域间史前文化的频繁交流互动，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核心区的文化是主脉，而边远地区的文化则为主脉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贵州就属于这样一个边远文化区。那么，贵州这一边远文化区的史前文化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独特之处？又为中国史前文化发展贡献多少呢？近年在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成为解答这一问题的密钥。贵州地区喀斯特地貌发育，存在大量天然溶洞，这些洞穴成为史前先民天然的庇护所。据不完全统计，贵州地区目前有据可查的洞穴遗址有 500 余处，牛坡洞遗址就是这些洞穴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处。牛坡洞遗址所在的贵安新区更是位于贵州的腹心地区，即所谓的黔中地区，也是最能代表贵州本地区核心文化的区域。对该遗址的深入研究必将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非常翔实的资料。

最初，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依据地下出土的人工遗物，特别是工具的变化情况，将人类起源以来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其中，石器时代在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假如人类有百万年的历史，那么其中有 99.5 万年都处在石器时代。石器时代中，出土打制石器的地层一般叠压在出土磨光工具的地层下面。因此，考古学家又将出土以打制石器工具为主的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出土磨光工具的时期称为新石器时代。

前者一般辅以游动的狩猎采集经济，后者多为定居的农耕经济。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重大飞跃，从而开启了人类文明化、现代化生活的快速发展之路。对于现代人来说，了解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以及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历程，将是探寻历史、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地区恰好处在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发现的大量旧石器时代以来的洞穴遗址，均保存有丰富的文化堆积，为考古学研究人类文明史提供了绝佳的材料。

为探索旧至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贵州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演化，构建黔中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9年达成在贵州开展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等专题工作的合作意向。同年夏，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平坝县（今平坝区，后同）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发现牛坡洞遗址，并在现场采集有陶片等少量文化遗物。201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黔中地区开展洞穴遗址考古调查。在平坝县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首先对平坝县的洞穴遗址开展集中调查。其中，在对牛坡洞遗址的复查中，根据遗址残存的剖面、地表采集或洞壁胶结的石器、陶片、兽骨、螺壳等遗物，现场专家一致判断，其为黔中地区发现的保存状况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洞天福地

牛坡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平寨村龟山组东约0.2千米处一座名叫牛坡的石灰岩孤山上。遗址现属于规划中的贵安新区城市核心区，西距平坝城区约25千米，北距马场镇5千米，东北距贵阳市约40千米，马场河从其西部约0.8千米处流过。马场河发源于马场镇南部的新院村附近，自南向北穿境而过，最后汇入乌江水系的重要支流猫跳河。河流定期泛滥形成了肥沃的冲积平原，也就是贵州境内常见的“坝子”，即山间平地。河流两岸是云贵高原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即峰丛地带，其间，广泛分布有大量天然溶洞，多为古人类所利用。据不完全统计，马场河附近已发现20余处洞穴遗址。



牛坡为一东西走向的石灰岩孤山，东西长约0.5千米，南北宽约0.2千米，山顶较平坦，植被稀疏。遗址由A洞、B洞和C洞三个地点组成。其中，A洞由平坝县文物管理所于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B洞和C洞在发掘过程中发现。A、B两洞位于牛坡东麓，A洞位于北侧，洞口朝向东北；B洞位于南侧，洞口朝向东南；C洞位于牛坡西麓，朝向西南。A、B两洞前原为水稻田，后因取土形成一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水塘。A洞洞口部分为宽敞的洞厅，宽约8米，进深3~7米。洞内上部堆积受到破坏，洞口外靠近山脚部分因修路遭到破坏，靠近洞口部分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原生堆积。B洞堆积主要分布在洞厅内及洞口外中部及左侧，B洞口外靠近山脚部分，上部因修路遭到破坏，洞内及洞外靠近洞口部分原生堆积保存较好。C洞完整地保留了原生堆积。

三、洞里乾坤

地下埋藏的遗物及包含的信息就像一本厚厚的地书一样，按照从下到上、



牛坡洞遗址远景图

由早及晚的规律，一层层地叠压在一起。考古学家要做的工作，就是像翻书一样，从晚到早、由上而下，一页一页地将地书揭露出来，并对每一页书里包含的内容进行阐释，采集古人遗留下的关键信息，复原古人生活场景，探寻历史规律。由于地下保留的信息多是一些片段，是有限的、不完整的，需要考古学家采用科学的方法、技术和理论去复原发掘出来的信息，并追寻隐藏在其背后的不为人知的故事，最后形成一部精彩的人类发展史。

2012年至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牛坡洞遗址持续进行了9个年度的考古发掘。为了科学研究遗址的文化内涵，认识古人在占据洞穴期间遗留下来的丰富文化信息，联合考古队采用象限法对遗址布方发掘。为了控制各区域发掘进度，首先建立统一的参考系统，即在考古发掘前，确定一个永久基点，再建立基线，最后布设探方。基线方向一般为正方向，探方的方向亦为正方向，即正北向。探方一般包括 5×5 平方米、 10×10 平方米两种规格。每个探方也有自己的基点，位于方内的西南角，探方内的北部和东部各留1米的隔梁。但是针对特殊目的，或者特殊遗址时，可以灵活布设探方。牛坡洞遗址中A、B、C三洞的探方单独编号。根据洞穴遗址的实际情况，在洞口内外交界处埋设一永久性零点标志，并以此为基点，A洞沿着洞口内外交界线以 330° 确立一条基线，B洞和C洞分别以 40° 、 300° 为基线，以基线为界将洞穴分为内外两区。洞内为1区，以象限法编号，所有探方编号均以1开头；洞口外为2区，也以象限法编号，所有探方编号均以2开头。所布探方面积均为 2×2 米。

通过发掘人员持续的调查和发掘，认清了牛坡洞遗址三个地点的地层堆积状况和文化面貌。A、B、C三洞遗址面积分别约为500、420和120平方米，其中大部分文化堆积分布在洞口外。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掘面积约150平方米，以A洞文化堆积最为丰厚，洞口处堆积厚约6.7米，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即春秋战国时期。

发掘过程中，为了尽可能收集所有文化遗物和自然遗物，全部文化堆积均



用孔径为 0.5 厘米的网筛过筛，对重要探方的地层和遗迹的土样全部进行水洗和浮选。典型探方均提取植硅石、孢粉、古环境、碳十四测年等样品。植硅石又称“植物硅酸体”，是一种在植物体内形成的非晶质二氧化硅颗粒。这些颗粒在植物细胞内或细胞外沉淀下来，主要来源于高等植物根系从地下水中吸收的可溶性二氧化硅。植硅体的体积通常非常小，一般在 2 至 2000 微米之间，但数量极其庞大，在 1 克的禾本科植物叶子中就有 10 万至 100 万个植硅体，是广泛存在于植物细胞中的显微结构，其大小和形状与植物种类及部位有关，具有鉴定意义。遗址地层中出土的植硅体可以让研究者认识及了解到与地层相同时期的植被环境。孢粉是孢子植物的孢子和种子植物的花粉。不同的植物产生不同的孢子和花粉。孢子花粉的外壁质密而硬，可保存为化石。外壁又可分为内层和外层，具饰纹。孢子花粉质轻量多，散布极远，各沉积地层中均可保存，对于恢复古地理古气候极有价值。提取测年样品主要是了解各地层的年代，测年的原理主要是宇宙射线与大气中的氮-14 (^{14}N) 反应过程不断产生碳-14，维持着大气中碳-14 含量的平衡。活着的生物体通过呼吸和光合作用不断地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CO_2) 进行交换，而碳-14 是二氧化碳中的一部分。生物体死亡后，即停止了与大气中的碳交换，其体内的碳-14 开始按照半衰期(5730 年)衰变，最终消失。因此，通过测量样品中剩余的碳-14 含量，可以推断出样品(如古生物化石、木炭、木头、种子、毛发、骨头等)的大致年代。

除了提取样品外，针对重要遗迹除常规测量、绘图、摄像外，全部制作三维模型。在遗址中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墓葬，全部套箱整体提取至室内进一步开展研究。

四、洞幽察微

遗址中的地层堆积就像是地书一样，是考古队员们获取知识、了解古人活动的最重要依据。人类在洞穴中频繁活动期间，不断地产生各种类型的堆积，既有人类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也有自然原因产生的，两者交互影响，便在遗址

中产生厚厚的地层。所谓人类活动的堆积，即古人在日常活动中产生的或携带进入洞穴内的各类型遗物构成的堆积。现在看来，这些内容可能包括工具，以及与制作工具相关的原料、石片、石屑、断块等文化遗物和食用后的植物果壳、兽骨等自然遗物，也包括古人为了生活便利，在洞穴内平整地表、铺设活动面等行为产生的堆积。另外，还包括古人长期在洞穴内用火形成的草木灰、木炭、红烧土等的大量相关堆积。自然原因产生的堆积包括石灰岩山体崩落的岩块、风化形成的自然堆积、流水形成的自然沉积等，甚至也包括穴居动物带来的各种遗物等。

受环境、气候等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频繁程度、文化演化、生业形态变迁等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人类活动一般会产生相对不同的堆积，即地层。这些地层就像书一样，一页一页地叠摞在一起，构成遗址超过万年的文化发展史。考古学家划分地层的首要依据就是土质、土色，其次是地层中包含物和人类活动产生的痕迹。广义上讲，某个特定时期产生的地层的土质、土色和包含物会相对一致，即一个地层，实际上也是一个时期。地层形成的时间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有时候会在上千年的时间内只形成了薄薄的一层，有时候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一层厚厚的堆积。现在看到的地层堆积，实际上只是保留到现在的原生文化堆积的一部分，其最初形成的原貌已不可考，既可能是完整堆积，也可能被破坏得仅剩原来地层的极少一部分。主要原因是洞穴中的人类活动持续进行，前人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地层，很有可能会被后来人有意或无意地破坏，最后看到的地层堆积实际是保存下来的残片。考古学家就是根据地下保存下来的破碎的证据尝试还原遗址中的人类活动，并寻找其中的规律。

根据多年的发掘，可以看到遗址中 A 洞的文化堆积最为丰厚，达到 6.7 米，也最具代表性。根据探方中土质、土色以及包含物的变化情况，自上而下，将探方内堆积划分 29 个文化层，代表人为划分的至少有 29 个长短不一形成地层堆积的时期。

通过发掘，除了认识到遗址丰富的文化堆积，对洞穴的最初情况也有了初



步了解。就遗址现在的外观来看，牛坡洞遗址，特别是主要居住区——A洞，洞口朝向东北，洞阔与深均8米有余，洞高也只2米左右，在洞穴云集的贵州地区委实一般。无怪乎，很多同行参观遗址的时候经常说，“在贵州，比这个洞的自然条件优越的洞太多了”。经过发掘，可以了解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A洞与现在相比，洞口更宽、更高。根据现有情况推测，最开始A洞形成的时候，应该比现洞口高8米左右，在10米以上，进深也要多出约4米，或可以达到12米左右。洞口高，便于采光。具有一定的深度，在冬季可以避风保暖，夏季可以遮风挡雨。各种条件显示出当时洞穴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正是由于条件好，古人选择长期在此生息繁衍，导致洞穴内自然的、人为的堆积不断生长，最后一直到洞内空间不足，逼仄的环境迫使古人离开洞穴，更寻他处。

不同地层的土质主要代表地层形成过程中自然环境的影响，土色主要是体现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的影响，比如人类活动频繁，可能会使得地层土色颜色加深。地层形成过程中，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加工工具形成的废料等，是判断地层相对年代、文化面貌的主要依据。牛坡洞遗址A洞的第1层为表土层，出土有陶片、瓷片、玻璃和打制石器。其中的瓷片、玻璃碎片为近代遗物，使得考古队员们可以确定这一层堆积是近年形成的。第2~7层均出土有陶片，陶片最早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那么出土陶片的地层，必然不会早于新石器时代。其中，第2层、3层的陶片明显与下面地层出土的陶片风格迥异，通过比较周边地区遗址的发现情况，可以认为这两层的年代可能在青铜时代，在其下面出土陶片的地层，应该可以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这些陶片体现出比较高的技术水平，预示着已经发展到比较发达的阶段。从第9层开始一直到29层，厚厚的堆积，主要出土有打制石器和动物骨骼，暗示已进入旧石器时代的地层。

根据遗址堆积状况，可以明显看到探方中不同地层的堆积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有些地层颜色变化明显，有的地层中角砾的数量差异明显。角砾数量多，可能反映在遗址地层形成过程中，自然因素占了主要地位，也许是受到比较严



BT20503 西壁



重的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些地层都是现在考古人员根据堆积中表现出来的特点进行划分的。遗址中厚厚的地层，反映了遗址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超过万年的时间中形成的堆积。经过发掘，可以明显看出遗址在超过万年的时间中形成了将近 7 米的地层堆积，并被考古队员们自上而下划分出 29 个文化层。

通过厚厚的地层堆积，可以看到遗址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旧新过渡时期、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近现代的文化堆积，而考古学家关注的主要是前面几个时期。

五、洞鉴古今

理论上，遗址中堆积在最下层的地层及文化遗物，代表遗址最初被利用的年代，而遗址最上层的年代，可能就是遗址最终被废弃时的年代。因此，遗址中划分出的清晰的地层，就能够提供出一个完整的相对年代关系，即遗址下一层及其中的包含物早于其上一层的年代，开口于某层下的遗迹，年代一定早于该地层。获取正确的相对年代关系只是遗址发掘的最基本操作，对于了解和认识遗址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将是考古队员们认识和研究遗址文化内涵的重要依据之一。其中，推测遗址的大致年代范围，仅是其中最初级的认识。牛坡洞遗址最下层出现大量打制石器，不见陶器、磨制石器等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文化因素。同时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石化现象比较少见，亦未见到绝灭种动物遗存，据此初步推断，遗址最早可能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最上层出土的陶器，明显带有晚近色彩，且伴有青铜小件器物出土，基本可以确定为春秋战国时期遗物。除了认识遗址的大致年代范围，将地层堆积建立的相对年代关系与出土文化遗物相结合，还可以将遗址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即考古学上的文化分期。简单来说，不同时期的人（或者不同的人群）在同一个遗址上活动，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堆积。文化堆积中既包括食余垃圾，也包括使用的工具及制作工具的相关副

产品。此外，还包括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各种痕迹，如灰坑、灶、墓葬、活动面等。早晚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可能会因为技术进步、生业模式变迁、文化交流融合等因素，使得不同时期遗留下不同的遗存，考古学上可以将之称为文化分期。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的变化情况，考古队员们将遗址 29 个地层划分为前后 5 个时期。每个时期各有自己大致的年代范围。

获知遗址不同地层的相对年代关系和大致的年代范围后，如果想要了解遗址和各时期的绝对年代，就需要考古队员们进一步借助自然科学技术来测定遗址年代。目前，测年方法主要包括树木年轮测年法、放射性碳测年法、铀系测年法、钾-氩测年法、释光测年法（热释光、光释光等）、地磁测年法，此外还有多种测年技术。考古学界使用得最广泛的首推放射性碳测年法，也称碳十四断代法，是由美国科学家利比（Willard Frank Libby）发明。主要是利用自然界的碳十四同位素放射性定年代，该方法主要应用于 5 万年以来的年代样品，其测年结果比较准确。其所用的样品主要是有机质等含碳的物质，包括燃烧后的木炭、兽骨等。利比也因此获得 1960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为了获得牛坡洞遗址的准确年代，考古队员们在遗址不同地层中提取数十份序列测年样品，主要是木炭和兽骨，分别送至不同的实验室测年。放射性碳测年法的技术是科学的，但是受到如采样环境、污染等各种因素影响，测年结果难免出现较大的误差，不能反映遗址的真实年代。有鉴于此，序列测年样品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序列样品是在层位关系明确的地层中提取样品进行测年，由于样品的相对年代关系已经明确，如果测年结果与相对年代不符，则说明测年样品可能出现问题，可以依据相对年代关系，将误差较大的数据排除，这样就可以获得比较合理的一组年代数据。牛坡洞遗址的测年结果显示遗址的绝对年代最早可能在距今 1.5 万年左右，最晚在春秋战国时期。

六、洞鉴废兴

通过地层堆积和测年技术，可以确认遗址的年代范围等基本情况。在此基



基础上,就需要利用各地层出土的文化遗存进一步研究遗址的文化内涵。截至目前,牛坡洞遗址出土了大量各类型文化遗物,除了少数地层单位不明确的,绝大部分都出自地层中,年代信息背景比较清晰。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不同地层出土文化遗物的变化情况,可以将遗址划分为五个时期。文化分期是考古研究中常用的术语,其基本原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技术等的发展进步,不同时期的社会必然有不同时期的特点,反过来看,就是不同时期的特点也代表了这个时期的文化。由于史前时期缺乏文献记载,只能依靠出土资料进行了解,所以史前遗址的文化特点一般也是通过遗址出土资料,即文化遗存表现出来。这些出土资料,在非专业人士眼中只是一些瓶瓶罐罐,需要专业人员通过相关理论方法进行解读。牛坡洞遗址的每个时期都各具特点,体现出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演化过程。

结合遗址的分期,可以做深入研究。下面分别对遗址的五期文化进行论述。

(一) 文化初现

所谓文化遗存,主要是包括遗迹和遗物。遗迹主要是古人生活过程中建筑的设施,比如,居住的房屋、储物的窖穴、烧火的灶、埋葬逝者的墓葬等等。遗物又可分为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前者主要是经过人加工的物品,或者与生活相关的直接使用的物品,比如工具、用具等。自然遗物可以包括食余的动物骨骼、植物果核等。

本期文化遗存主要发现于A洞最下面,目前发掘面积较小,不足25平方米。发现的遗迹主要是墓葬和用火遗迹。本期至少发现3座墓葬,均埋藏在洞内最深处,均为屈肢葬,为仰身屈肢或是蹲踞葬。屈肢葬是本地区洞穴遗址中的特点。墓葬的出现,显示出这一时期古人已经具备挖墓坑埋葬逝者的意识。用火遗迹在本期发现数量较多,其中一处命名为AZ18的用火遗迹,是古人最早进入牛坡洞洞穴之后,在洞内燃起的第一把火留下的痕迹。由于当时人类改造自然的水平还较低,不具备建造类似现在的灶一样的设施,只是在平地生火并烘烤食

物。可以看到，AZ18 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弧壁下收，底略平，坑口距地表深 3.68 ~ 4.42 米，坑长径约为 1.58 米，深 0.02 ~ 0.09 米。坑内堆积为灰白色土，结构松，土质硬，底部局部区域有一红烧土面，包含物有少量烧骨、燧石片及炭屑烧土粒等。明显可以看出，该用火遗迹相对较大，相信除了烘烤食物外，其很可能也有照明、取暖等用途。除了 AZ18 外，本期在有限的发掘面积中还发现多处用火遗迹。

将逝去的亲人埋葬在居住的洞穴之中，可能预示着已经产生灵魂不灭的意识，让逝者继续与亲人生活在一起，并庇佑后者继续生活。遗址中大量用火遗迹的出现，说明古人在洞穴内活动的频繁程度。洞穴内用火的主要目的是照明、除湿、取暖和烘焙食物等。

本期发现的文化遗物主要是各类型的打制石制品，以体型较大的打制石制品最为典型，主要包括砍砸器、石核等，原料为硅质含量较高的石灰岩。细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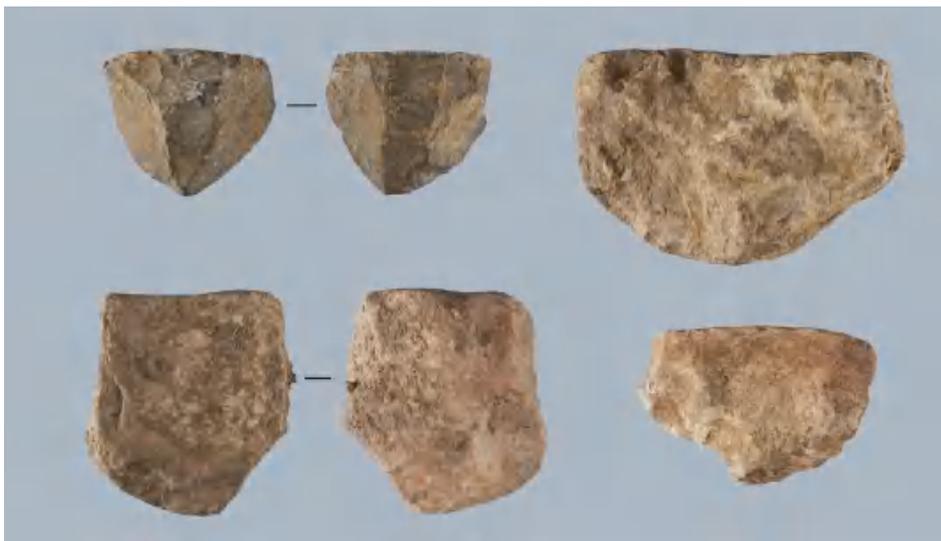
○
用火遗迹 (AZ18)



燧石打制石制品数量占主体地位，成形石器比例较低，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等。此外还有各种加工石制品产生的副产品，如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石屑等。

本期石器以砍砸器和石核为代表。砍砸器一般都会有专门的厚重的刃缘，具备砍砸等功能，属于重型工具，一般用河砾石打制而成。但是遗址中出土的砍砸器比较特殊，通常是用灰白色硅质含量比较高的石灰岩角砾制作而成，这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是非常特殊的存在。这种原料在遗址所在的牛坡上有比较广泛的存在，直接获取这些原料非常便捷。砍砸器的刃缘上有比较明显的片疤，即砍砸使用时形成的崩疤。砍砸器被认为是与采集经济密切相关的一种工具。石核属于原料的一种，一般从其上剥离石片，用以加工成石器，也存在专门制作的石核石器。

本期除了上述大型石制品外，数量最多的是小型的燧石工具，也有人称为



牛坡洞遗址第一期使用的工具

细小石制品，多数工具长度在5厘米以下，主要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等。刮削器主要是用于刮削等用途。部分尖状器等小型工具主要作为复合工具使用，可以装柄制成弓箭，用于狩猎。部分小型工具还可以镶嵌在骨头中，用于制作成石刀。

自然遗物主要是动植物遗存。研究动植物遗存，可以了解古人主要吃了什么、怎么吃等信息。绝大部分动物骨骼都带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可以通过鉴定这些特征识别出不同种类的动物，从而获悉古人狩猎的是什么动物。本期发现的动物遗骸十分丰富，有豹猫、豺、大熊猫、狗獾、黑熊、水鹿、水獭、原麝、猪獾等，以鹿科动物为主，同时还发现了大量小型啮齿类动物和鱼类遗骸。地层中发现的动物遗骸，实际上就是古人将狩猎到的动物带回洞内，吃完肉后遗留下的废弃物。从种类来看，古人狩猎的对象既有食肉类的动物，如豺、豹猫等，也有食草动物，如水鹿等。鱼类动物的遗骸，则显示古人还存在捕捞水生鱼类的行为。从发现的数量来看，洞内动物的遗骸数量非常多，显示出当时的食肉量巨大，也显示出食肉行为持续了很长时间。绝大部分骨头破碎严重，多为碎片状，证明古人对动物利用得非常充分，存在敲骨吸髓的行为。

本期还发现了大量炭化朴树籽。据《中国药用植物图鉴》等书记载，朴树全树供药用，其树皮和根皮能祛风透疹、消食化滞，其果实清热利咽，其叶具有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所以牛坡洞内发现的朴树籽是否具有上述用途也未可知。

（二）文化再兴

第二期遗存在遗址中分布广泛，既在A洞内有分布，又在B洞内有分布。主要包括AT20401和AT20402的第16~19层，AT20404的第8~13层，AT10401的12~20层，AT20407的第3层，BT20303、BT20403、BT20503的第8~12层，BT20504、BT20505的第11~13层，以及BT20802、BT20902中叠压在第7层下的遗迹和第8层及以下的堆积。



本期的遗迹主要是墓葬，共发现 6 座，BM1 ~ BM4 分布在 BT20802、BT20902 两探方内，BM6 各占 BT21001、BT21002 的一部分，AM1 位于 AT10401 内。

AM1 的发掘过程比较曲折，也颇具戏剧性。虽然该墓编号为“1”，实际上只代表 A 洞内发现的第一座墓葬，整个遗址中最先发现的墓葬位于 B 洞。理论上讲，这座墓葬本有可能成为牛坡洞遗址发掘清理的第一座墓葬，然而其发现的时间整整推迟了 4 年，直到 2015 年才被发现。牛坡洞遗址的发掘始于 2012 年，AM1 所在的探方，即 AT10401 是发掘伊始第一个选择发掘的探方，位于 A 洞内的左侧。发掘项目负责人认为洞穴中的墓葬一般会埋藏在洞口处左侧，所以 A 洞最先的发掘也就选址于此处。该探方的发掘一点也不顺利，开口于地表有一个灶，是用红砖搭建的，其中发现有较多现存遗物，甚至有啤酒瓶。根据参与发掘的民工回忆，早年有外地人在洞内短期生活，这个灶就是当时遗留下的迹象。再向下发掘，发现大量空洞，应该是啮齿动物钻的洞。纵横交错的空洞占据整个探方的绝大部分，很显然这些空洞已经将地下埋藏的堆积都搅乱了，这使得发掘人员信心全无。继续向下发掘，终于挖过空洞区，进入到保存比较完好的原生地层，深度达到 1.4 米左右。因探方为 2×2 米的规格，且又在方内西部、北部各留有 0.5 米的隔梁，故实际工作面积只有 2.25 平方米。随着向下发掘，探方越来越深，遂在方内西北角保留台阶，用于上下探方。如此一来，方内适合发掘的面积更少，逐渐不太适合发掘，加上距地表 1.4 米左右的地层中出有较多角砾，疑似是专门铺设的活动面，属于重要遗迹，遂决定暂停发掘，转到发掘洞内其他位置，拟待发掘到相同位置时共同判断遗迹的性质。这一停就是 3 年，这期间为了保护探方，一度还进行保护性回填。2013 年，为了配合发掘相邻的探方 AT20401，才重新挖开该探方回填的土，并利用该探方的台阶为进出 AT20401 的通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15 年，其时 AT20401 已经发掘到很深的位置，通过剖面了解到 AT10401 下面应该还有更深的堆积，需要继续向下清理。所以 2015 年时，首先向下发掘了

AT10401 除台阶外的其他部分。待台阶的存在已经成为进一步发掘的障碍时，才下定决心清理掉台阶。当时，仅仅用十字镐轻轻敲了一下，已在眼前多年的 AM1 随即登场。从当时墓葬的地层位置，结合此前的测年结果、出土文化遗物特征，明确判断这是一座保存比较完好的早期墓葬，应该是贵州洞穴中发现的第一座保存状况最好、年代最早的墓葬，无疑属于一次重大发现。

AM1 是一座蹲踞葬。叠压在 AT10401 第 13 层下，长方形墓坑内填灰白色砂土，夹杂少量灰褐色黏土。头朝上，面向东南，整个身躯蜷曲于墓坑内。头骨下半部挤压变形严重，头部下压在椎骨上，右上肢缺失，左手压在双腿上部，双下肢弯曲，股骨与胫腓骨几乎平行。墓主人为女性，年龄在 35 岁左右，身高约 143 厘米。墓主人的性别、年龄被鉴定出来之后，发掘人员亲切地称之为“贵州夏娃”。寓意其为当时贵州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女性墓葬。

第二期的文化遗物，除少量砾石打制石器、石锤和砾石外，以各种细小打制石制品为大宗，主要是与加工细小打制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碎屑等，以及少量成形石器。另外，还有少量典型细石器制品。石料以燧石为主，还有硅质灰岩、砂岩、粉砂岩、水晶、石英岩等。

与第一期相比，第二期的工具开始出现比较大的变化。首先，灰白色的硅质含量比较高的重型砍砸器已经消失了，开始出现使用河砾石制作的重型工具。其次，大量细小燧石工具成为主流。

重型工具包括石锤、砍砸器。编号为 AT20407 ③: 001 的石器，长 10.13 厘米，宽 7.23 厘米，厚 4.78 厘米，重 615.4 克，有人称其为石锤，也有人称其为凹石，取器表有凹窝之意。岩性为灰色砂岩，呈圆角长方体，横截面近似长方形，利用砾石加工而成，一面略弧凸，另一面平。正反两面的中部各有一个圆形凹窝，其中有大量打击形成的坑疤。石锤有可能是加工石器的工具，也有可能是用于加工坚果。

本期的砍砸器有了较大变化，开始专门使用砾石加工而成。以编号为 AT20407 ③: 002 砍砸器为例，长 8.85 厘米，宽 8.9 厘米，厚 2.56 厘



米，重 337.4 克，为棕色灰岩。扁平圆盘形，利用砾石加工而成，器表残留大面积光滑的棕色石皮，直刃，交互加工成锋利的刃缘，两侧边及背部均有打击形成的大块片疤，一面略平，另一面弧凸，中部有打击形成的坑疤。砍砸器（AT10401 ②0：001）长 7.49 厘米，宽 6.98 厘米，厚 3.64 厘米，重 191.1 克。属于红色砂岩，平面近似三角形，以砾石为毛坯，刃部单面修整而成，修疤连续叠压分布，刃部以外均为自然石皮，磨圆度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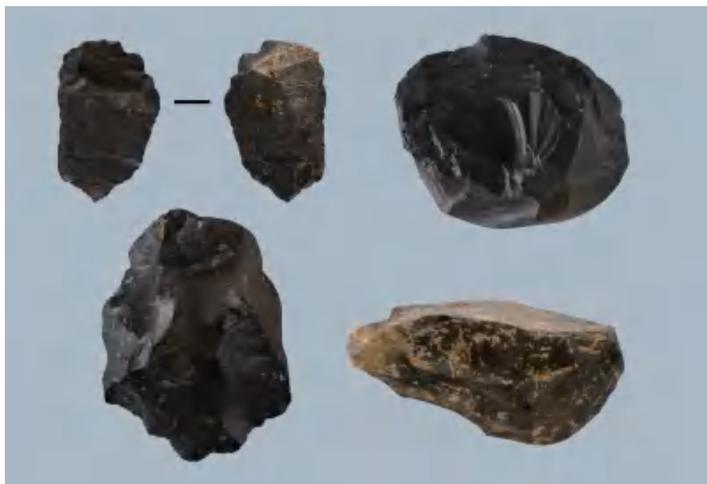
此外，细小燧石制品的类型与第一期相似，包括刮削器、尖状器，此外还出现一批细石器制品。细石器包括细石核、细石叶等。细石核多为楔形，表现出较为成熟、稳定的细石叶剥取工艺，但石核预处理及台面修整并不十分精细，且细石器相关制品比例极低。

除了石器外，本期还发现有不少骨器，均为磨制骨器，种类有骨锥、骨铲等。大多数骨器利用哺乳动物的肢骨制成，少数用肋骨制成。骨铲一般为长方形，存在一个较宽的刃。目前，骨铲的功能还不太清楚，有一种说法是用于揉兽皮。当时可能存在广泛利用兽皮的情况，为了处理兽皮，需要将其上附着的脂肪清理掉。使用石器清理的话，硬度太大，容易划破兽皮，骨器是不错的选择。当然，也有人认为骨铲可以用于挖取野生块茎类植物。骨锥数量亦有不少，功能也不十分确定，有人认为其属于钻孔工具，或者用于缝补衣物，揉皮的可能性也存在。此外，也有人认为可能是狩猎工具，即早期骨镞的一种。

动植物遗存种类数量均比较多。其中，动物遗存数量比较多，可鉴定的动物种属有水鹿、梅花鹿、熊、猪、水牛、小鹿、赤鹿、虎等。从动物遗存来看，狩猎范围与此前一个时期的差别不大，可能还是以周边地区常见的动物为主。炭化植物遗存数量也比较多，以朴树籽为主，其次是葡萄和猕猴桃等。这里的葡萄主要是葡萄属植物，与现在的葡萄是两种植物。

（三）文化三期

此期遗存也主要分布在 A 洞和 B 洞，A 洞主要包括 AT20401 和 AT20402



○
牛坡洞遗址第二期出土的燧石工具



○
牛坡洞遗址第二期出土的骨器



的第8~15层, AT20404的第5~7层, AT10401的第2~11层, AT10101、AT10102的第2~9层, B洞主要包括BT20303、BT20403、BT20503的第4~7层, BT20504、BT20505的第8~10层, BT20802和BT20902的第4~7层。相对而言, 第三期的遗存在遗址中堆积有限。

本期遗迹内容比较丰富, 主要有活动面、墓葬和用火遗迹。目前, 可以确定两处活动面, 分别位于AT10402和AT10102两个探方的第9层。其中, AT10402的活动面主要是由大量小型角砾铺就, 其中有少量燧石打制石制品和兽骨等。AT10102的活动面除了铺角砾外, 其上还分布有较多文化遗物, 如小



牛坡洞遗址活动面

型磨制石斧、石锤、砺石及打制石制品等。活动面主要是古人在洞内活动过程中，对地表的一种处理措施。随着水土流失或者人类活动，可能会出现地表不平整等情况，为了创造优越的居住环境，古人有意识地对地表进行处理，使得表面更加平整美观，类似于现在铺设地板一样。

本期墓葬发现比较少，仅在B洞发现一座。墓葬（BM5）为仰身屈肢葬。位于B洞前左侧，开口于BT20801第11层下，上半身仰身，头向330°，面向上略偏向右侧，左右肱骨分别位于身体两侧，双手回折至肩部，左手位于肩内侧，右手位于肩外侧；髌骨反扣，下身屈肢于身体左侧，股骨与胫腓骨平行，脚部位于臀下。墓主为男性，年龄在50岁左右，身高约164.5厘米。可以明显看到墓主人下肢屈折严重，可能不是自然形成。据专家鉴定，很可能是在埋藏时有意识地将其下肢捆绑起来。



○
牛坡洞遗址用火遗迹



用火遗迹一共发现 12 处，均位于 A 洞内。其中 AZ7 开口于 AT10101 第 6 层下，从暴露出的形状看，近似半圆形，部分叠压在 AT10101 的北壁下。土质硬，结构紧密，灰白色土夹杂红褐色，直径约 46 厘米。

本期的石制品又进一步出现变化，出现磨制和打制两种石器。磨制石器为新出现器物，多为石斧，可分为两类：一类器形较大，通体磨制精致；另一类器形较小，多刃部磨光。打制石制品仍以各种细小打制石器为大宗，成形打制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等，石锤和砺石数量较少，另有少量细石核、细石叶等。

磨制石器的出现，是一种较大的文化嬗变。磨制石器的出现一度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标志，足可见其出现的重要意义。牛坡洞遗址第三期开始出现磨制石器，可以认为遗址发展出现重要变化，逐渐从旧石器过渡到新石器，同时两种类型石器的出现各有不同意义。第一种体形较大的、通体磨光的磨制石器，一般被认为和农业社会有关，似乎是农业社会文化因素进入本地的一种信号。另外一种体形较小的、磨刃的石器，是岭南地区比较常见的磨制石器，似乎和狩猎采集社会关系密切，足见本地区与岭南地区存在密切文化交流。

打制的细小燧石石器本期仍有大量存在，主要是刮削器、尖状器等。从数量上来看，打制石器仍占据绝对地位，说明利用打制石器，仍然是本期的主流。侧面说明，主要是生产、生活方式未见明显变化。

此外，本期的细石器制品，包括细石核、细石叶等仍有存在，表明其作为一种石器技术，仍然在本期流传。细石器及相关制品的数量在遗址中所占比例比较低，细石核多为楔形，开始出现有柱状、锥状石核。细石器加工技术已经较为成熟。

动物遗存数量很多，可鉴定种属包括水鹿、梅花鹿、熊、猪、水牛、小鹿、赤麂等，也有少量水生的螺蛳。因此，从生业方式来看，在第三期时，牛坡洞遗址仍处在狩猎采集阶段。



牛坡洞遗址出土的大型磨制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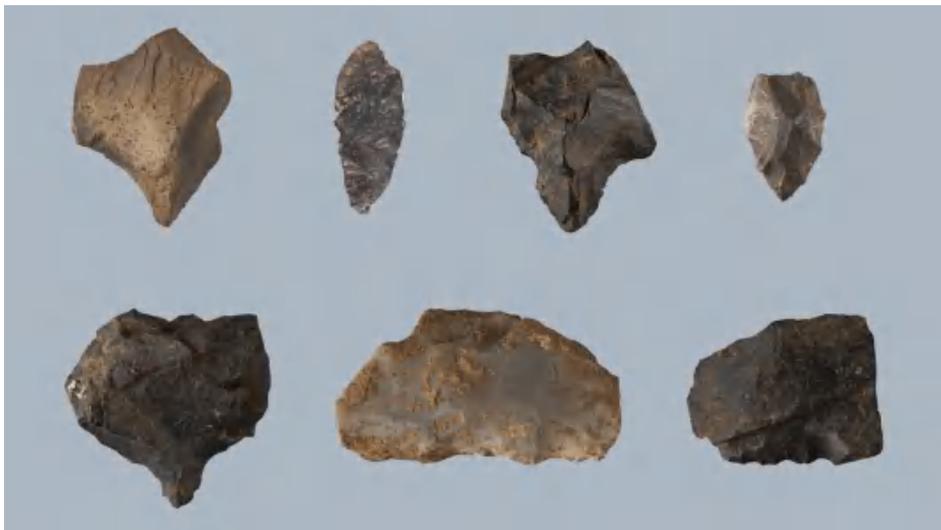
牛坡洞遗址出土的小型磨制石器



（四）文明初现

此期遗存在遗址中的地层堆积相对更薄，显示出人类活动的频繁程度有所减弱。目前所见，主要包括 AT20401 和 AT20402 的第 4 ~ 7 层，AT20404 的第 3 层、4 层，BT20303、BT20403、BT20503 的第 3 层，BT10501 的第 4 层、5 层，BT20501 和 BT20502 的第 3A、3B 层等。

本期遗迹主要有灰坑、用火遗迹等。灰坑是考古发掘中常见的遗迹现象。因坑中填满灰色土，故称灰坑。灰坑可能是窖穴、水井或建筑取土后形成的凹坑，因后期回填土包含生产、生活垃圾或其他有机物，导致与原有土不一致。灰坑中的土一般较文化层的土松软、色深，包含物更为丰富。根据坑的形状、特征和遗物可以判定灰坑的性质和时代，这是研究古代人经济生活的重要资料。在考古学界，有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即认为所有凹陷的坑状遗迹都可以被称为“灰坑”，但是灰坑具体的性质、功能需要深入研究。牛坡洞遗址的灰坑只在本期



牛坡洞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

出现，似乎可以认为出现了新的活动方式。用火遗迹一直是牛坡洞遗址中出现频繁的一种遗迹，一般为平地堆烧产生的迹象。本期发现的用火遗迹（BZ1）位于BT10501，直径约30厘米。开口在第4层下，平面近似瓢形，灰白色土，结构疏松，土质较硬。

文化遗物中的打制石制品数量自本期开始急剧下降，陶器作为新的器类开始出现。本期陶器目前仅1件侈口罐可以复原，其余均为残片。据统计，遗址中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部分夹少量细砂，泥质陶较少。陶色以灰陶居多，红黄陶次之，灰黑陶和红褐陶最少。陶器均为手制，烧制火候较高。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少量戳印纹、圆圈纹、凹弦纹、水波纹和刻画的波折纹、弧线纹等。可辨器形有侈口罐、高领罐、卷沿罐和敛口钵等，为常见平底器，类型简单。

（五）文明汇流

本期的地层堆积包括AT20401、AT20402的第2层、3层，AT20404的第2层，BT20501和BT20502的第2层等。本期遗物数量比较少，主要是陶器，均为残片，多饰方格纹，烧制火候较高，另有少量打制石制品出现和两件青铜箭镞。这显示本期古人仅短期占据洞穴，并留下极少量遗物，穴居可能成为一种短期和辅助性的居住方式。



牛坡洞遗址出土的侈口罐



牛坡洞遗址出的土陶片

七、洞悉底蕴

牛坡洞遗址是迄今所知贵州地区特别是黔中地区保存状况最好、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洞穴遗址之一。对该遗址的持续发掘和研究，也是目前整个黔中地区洞穴考古规模空前的一次。对其文化内涵的深入认识，可为理解黔中地区，甚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洞穴遗址提供重要的资料。

（一）洞中肯綮

牛坡洞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出土了大量大型砾石砍砸器、石核等，原料是以硅质含量很高的石灰岩为主，但是细小燧石打制石制品数量最多。根据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可以推测出本期以狩猎经济为主，其次捕捞水生鱼类也占有一定比重，除此之外，还采集野生植物果实。根据出土遗物推测，应属于

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可能距今 1.5 万年左右。

第二期以砾石打制石器、石锤和磨制骨器为主要工具，但数量比较少。细小打制石制品数量庞大，主要是与加工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石屑等，成形的细小石器种类及数量较少。本期新出现了典型细石器制品，但数量比较少。磨制骨器在本期出现的数量较多。野生动物遗骸数量较多，同时破碎严重，可能是敲骨吸髓的证据。经碳十四年代测定，本期绝对年代在距今 10200 年至距今 8700 年间。

磨制石器，主要是石斧，在第三期开始出现。可分为两类：一类体形较大，通体磨制精美；另一类体形较小，多刃部磨光。从选料和磨制技术来看，与飞虎山上层文化出土的磨制石器相比，略显原始。除此之外，其他石器仍以各种细小打制石制品为大宗，燧石仍为主要原料，另外还有硅质灰岩、水晶等。砾石打制石器、石锤和砾石数量也很少。磨制石器的出现似乎说明自本期开始日常生产生活出现一定程度的破坏，由于野生动植物遗骸未见明显变化，主要工具仍以打制石制品为主，推测本期的生业经济可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仍处在狩猎采集经济模式下。遗址中少量螺壳的出现，或可以说明古人纳入食物中的野生动物种类范围有所扩大，似乎可以认为出现广谱化的趋势。本期绝对年代在距今 8000 年至距今 5500 年间。

第四期文化遗存与第三期有明显差异，发现了制作工艺水平较高的陶器，且打制石制品的数量急剧下降，因此推测两者间应存在较大缺环，年代在距今 5000 年至距今 3000 年间。

第五期文化遗存与第四期相比，明显的区别是开始出现制作技术水平相当高的方格纹陶器以及出现了两件青铜箭镞，年代可能已经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二）洞彻事理

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为进一步推动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提供



了重要资料。遗址中发现的完整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特征提供了重要线索。也是首次在贵州区域内以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细石器制品，这些石核表现出较为成熟、稳定的细石叶剥取工艺，但预处理及台面修整并不十分精细，同时细石器制品比例极低。据此推测当时细石叶工艺并不十分发达。细石叶工艺是史前人类应对环境变化，为获取资源将石器打制技术演化到极致的结果，是较大的生存压力下的产物，因此在我国分布范围较小，主要分布于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四川、西藏、云南等地。牛坡洞遗址的发现，将为探索中国西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出现与分布，讨论贵州史前人类的生存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方向。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特别是复原出的完整陶器，为认识本地区文化面貌，以及与周边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一直以来，贵州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洞穴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相对薄弱。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于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探讨整个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贵州史前史、云贵高原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体质、古代环境及其变迁和人与环境的互动，都有重要意义。

第四节 八角岩遗址

一、寻访八角岩

(一) 三顾新寨

2007年12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员在修文县进行文物调查时,在县城南部约2千米处的龙场镇新寨村看到一处孤立的矮小山丘,山体石灰岩裸露,山顶上杂草和小灌木丛生。远处望去,该山立于田坝之间,十分显眼。小桥河在东北从山脚流过,整体的环境十分优越。经过询问,当地人称呼此处为八儿山。该山山体整体不大,形似馒头状,是独立于坝子上的一座孤山。调查人员在山体南、北、西部的耕地之中采集到了很多石制品,并且有少量的陶片和动物骨骼。山体南部有一洞穴,高8.5米,宽4.7米,深3.6米。洞内干燥,洞口向南,采光极好,十分适宜古人类居住。西部有一处岩厦,在此同样采集到早期遗物。调查人员认为此处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遗址,并将其命名为“八儿山石器时代遗址”。至2011年,考古队员再次对该遗址进行复查,又采集到一批打制石制品,故将遗址更名为“八角岩旧石器时代遗址”。两次调查,明确了该遗址是一处以旧石器时代堆积为主体的古人类遗址。

两次调查之后,八角岩遗址被修文县人民政府公布为修文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长期以来并未开展过考古发掘工作,遗址的堆积情况一直不清楚,直到2019年,修文山湖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定在遗址西侧进行房地产开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受该公司的委托，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专业队伍，会同修文县文物管理所于该年6月对修文“山湖海·上城”工程建设用地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文物调查、勘探工作并实施考古发掘。在八角岩遗址保护范围、建控地带内等区域采集到文物标本33件，其中刮削器就有8件，此外还有一些石片、石核、断块、碎屑等。2019年10月14日，贵阳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贵阳市第八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洞外崖壁的发现

在山体西南部、南部洞口的西部存在较浅的岩厦，调查人员在该处发现了数处岩画，均用红色颜料绘制，因年代久远，部分已经被后期溶解的岩体覆盖。目前仅能看见两处，考古队员们分别将其编号为岩画1和岩画2。岩画1离地约1.2米，宽约0.2米，高约0.25米，形似一人头，保存较差；岩画2离地



八角岩遗址远景

约2米，宽约0.1米，高约0.2米，形似一小人，保存较差。

摩崖位于八角岩西面崖壁上，书体为楷书，主要内容为“道光通宝”，上刻（右到左）“念兹在兹”，北面落款（上到下）为“赵登高题”，是一个以风水为背景的题记，是修文地区地域文化的重要物证，具有一定的民俗文化意义。

岩画、摩崖虽然不在工程建设施工范围内，但两者距离十分近，施工所产生的粉粒、扬尘、工程杂物等会对部分文物本体及其所处的自然风貌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和影响，因而此次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们也对其进行了资料采集。

二、叩问黄土

根据前期的调查、勘探结果，2019年8月，考古队入驻现场，对施工涉及的建设控制地带进行重点发掘。发掘工作包括洞外坡地和南洞洞厅两个区域。

（一）洞外坡地的发掘

“山湖海·上城”项目用地在遗址建控地带施工面积为8070平方米，属于遗址旷野部分。洞外坡地一般不是古人类的主要活动场所，尽管能采集到不少的打制石制品，但整体堆积较差，没有特殊情况，没有必要对项目涉及的整块区域进行整体揭露。因距岩厦较近的区域堆积保存相对较好，故考古队选择靠近山体的区域进行发掘，发掘面积为200平方米。这片区域堆积深度很浅，发掘至生土不及半米。仅仅是在清理耕土层之后，发现长条形灰土遗迹，推测是一条近现代的沟。第二层堆积也是灰褐色黏土，在该层出土了较多的石制品。同样伴随出土的还有一些瓷片，考古队员们将该层定为扰土层，年代仍十分晚。该层清理后发现了一个灰坑，其开口直径约1.2米，坑内为黑灰土，比较松软，夹杂着一些石块，无其他包含物。经过20余天的时间，洞外坡地的发掘工作结束了。考古队员们在耕土层及扰土层中收集了一批石制品，当然还有一些瓷片等，并未发现相关活动遗迹。



（二）南洞试掘

洞外空间并非古人的主要活动场所，仅仅发掘这一区域难以对该遗址形成全面、科学的认识，所以在发掘旷野的同时，为了明确遗址堆积情况、年代、性质，考古队对南洞洞厅内试掘了4平方米。这4平方米的发掘，揭开了这一洞穴埋藏的远古故事。

第一次负责发掘旧石器时期的洞穴遗址，考古队员们心中满怀期待，同时也倍感压力，毕竟洞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十分精细，对遗物、遗迹的把握都需要谨慎。

为了更多地了解洞穴遗址，也避免因为不够了解而导致发掘中出现过大的失误，因此在发掘过程中安排了一名工人一起清理。按照常规发掘惯例，考古



八角岩遗址南侧洞穴内试掘情况

队员们将4平方米的发掘区分为田字形，即一个探方一平方米，这样的发掘方式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发掘区内地层、遗迹、遗物的相关情况。同时，将发掘清理出的土用袋子收集之后交给工人，由工人在发掘区外进行过筛。

三、远古回音

（一）以石为器

八角岩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有400余件。这些石制品的原料主要是燧石，此外还有一些硅质灰岩和水晶。考古队员在发掘过程中感觉到水晶的比例较其他遗址更高。该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的打制方法以锤击为主，石器形态较小。这些石制品的特征都是黔中地区常见的，属于以燧石为主的小型石片石器工业，这与贵安新区招果洞、开阳打儿窝等遗址相似。众多石制品中，发现一件磨制箭镞，出自第二层，年代已至商周时期，其原料为灰色燧石，尤为精美。燧石俗称火石，其质密坚硬，敲碎后非常容易形成锋利的边缘，尤受古人类青睐。但燧石一般多为打制而成，受其质地属性的影响，比较难磨制。这件磨制的箭镞是古人类对于燧石的偏好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盘县大洞、黔西观音洞等遗址中，古人类主要以开发岩层中和河漫滩的岩块与砾石为主，这种开发策略决定了石制品原料随着遗址所在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黔西观音洞遗址以硅质灰岩为主要原料，而到了盘县大洞则以燧石、玄武岩和石灰岩为主。燧石来自遗址附近岩层的燧石条带，而玄武岩则主要来自附近河漫滩的砾石，石灰岩则直接可以从围岩中获取。整体而言，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古人类对石料的选择较为多样，对石料要求较低，易于剥片和修理的燧石并未占据主流，暗示着当时人类对石料属性的开发利用尚未形成明显偏好。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在石器原料岩性选择上形成了明显的偏好倾向，大多数遗址中质地均匀的燧石占据了绝对主流。毕节老鸦洞遗址优质燧石占60%以上，尤其在第8层，100%为燧石原料。



（二）史前的烟火

火的应用是人类史上的一项主要举措，这一技术使得人类在面对其他物种时占据优势。

火烧迹象并非一定是人类控制、使用火的证据，其中涉及对于其性质的判断，这往往要求研究者通过埋藏学、科学检测、试验等手段进行区分。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地考古发现了 100 万年以前的疑似用火证据，但存在一定争议。而确凿的最早用火证据是在以色列一处遗址所发现，距今 79 万年。自中更新世末期以来，人类用火现象更加普遍。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火塘遗存常有发现。国内目前发现旧石器时代用火遗迹（迹象）的遗址有 70 余处，其中早、中更新世火塘遗迹在北京周口店、陕西龙牙洞、辽宁金牛山等均有发现，是国内最早的、明确的发现。而西侯度、公王岭、元谋人等发现的用火迹象多存在争议。到旧石器时代早期，发现有 9 处，其中织机洞遗址 100 平方米之内就发现了 17 处火塘。旧石器时代晚期火塘的发现十分普遍，发现的遗址达到 50 多处。

火塘在洞穴中不仅是为了取暖、煮食，也是照明、睡卧、聚会的重要场所。八角岩遗址南洞的发掘中发现两个火塘，分别编号为 HT2、HT3。直径在 30 ~ 60 厘米。红烧土厚约 5 厘米，均无包含物。两个火塘有先后使用顺序。从现场发现来看，两个火塘是挖了一个很浅的坑作为火塘使用，较为简单，这在招果洞遗址亦有相当多的发现。有研究将此类火塘称之为“低投入火塘”，以此区别于需要石块、木块垒砌的“高投入火塘”，并认为低投入火塘更多为流动性高的人群使用，这与考古队员们推测旧石器时代黔中地区早期人类是流动往返于各个洞穴之间的猜想相符。

（三）年代的乌龙

第三层发掘结束后，发掘区东北部有一层较薄的钙板。这是碳酸钙所形成的层状堆积物，其形成需要较长时间。但这里的钙板尚未胶结到很硬的程度，与毕节老鸦洞等其他遗址所见钙板相比还是疏松得多，但它的出现预示着往下

的年代应该也到了旧石器时代。第3至第6层的发掘，并未出现过陶片，考古队员们据此便完全肯定这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

发掘结束后，将发掘过程中所提取的碳样寄到北京大学进行碳十四测年。测年结果出来需要一段时间，直到次年某一天，北京大学回复了八角岩遗址的测年结果，从第2层往下，进行测年的碳样年代均在距今1.4万年左右。而当时在寄样时表格中填写的年代是商周。后来发掘者回忆，之所以在表格中填写商周时期，是因为出土了商周时期的陶片，得到北京大学的测年结果后，发掘者又对出土遗物和层位进行了复核，在距今约1.4万年的层位，的确未发现陶片。

当时为何会有这一乌龙？还要回到发掘区内的一个灰坑。当时考古队员们给它编号为H1。这个坑处于发掘区南部居中位置，灰坑开口处地表为一坑洼，所以发掘之初认为是近现代活动所致。但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们发现坑内并未包含有近现代的遗物，且炭屑、烧土颗粒极少，有较多大石块，以及部分陶片。从陶片来看，这个坑的年代应该处于商周时期。但这个窄小的坑很深，考古队是按照由晚及早的顺序向下发掘，但由于操作空间受限，且有大石块阻挡，当时并未直接清理到底。而这个坑直接打破到生土，底部也有一些石块。底部出土陶片实为该坑底所出，这才闹了一个乌龙。



八角岩遗址出土的陶片



八角岩遗址出土的刮削器



燧石磨制的箭镞

第五节 肖家洞遗址

肖家洞遗址位于白云区大山洞附近。该遗址的发现源于贵阳环城高速西南环线的考古调查。2006年2月，为配合贵阳环城高速公路建设，考古队员在贵阳市乌当区金华镇（今属观山湖区）狗场附近发现了一些遗址和墓葬。6月，考古队员开始对贵阳环城高速西南环线涉及文物点进行考古发掘。



9月，考古队员们在白云区的大山洞附近发现了肖家洞遗址。遗址洞口不大，洞厅内部开阔。据当地村民回忆，原来洞内几乎被泥土填满。20世纪50年代时，当地村民在洞内挖出大量包含骨头的泥土，造成现在的洞内阔大，后来因肖姓村民在洞内堆放杂物，遂被称为“肖家洞”。在洞口，考古队员们在当年挖出的泥土中，捡到了丰富的动物骨骼、石制品、陶片、磨制骨铲等，初步断定这是一处堆积很好的史前洞穴遗址。为了不遗漏文化遗产，考古队员们也将这些泥土整体装回驻地进行细致的拣选。为避免遗漏，拣选完成后还需要对全部采集土样进行水洗。考古队员们先期从土样中拣选出了磨制骨铲、锥20余件，打制石器、石片数百件，磨制石器2件，动物骨骼千余件。看到这么丰富的包含物，考古队员们担心使用网眼太大的筛子会漏掉许多较小的遗物，大家集思广益后，在驻地宾馆的门口空地上搭了一个架子，使用筛眼很细的金属筛，每天使用大量的水对拣选过的泥土进行清洗，水洗出大量的遗物，又从中发现大量的细碎石片、啮齿类动物骨骼、鱼骨头等，并将这批遗物打包运回了贵阳。

2006年10月上旬，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后简称省考古所）的领导和史前考古专家们看到肖家洞遗址拣选出的遗物后，虽然感觉这些磨制骨器的石化程度不够，肖家洞遗址的时代没有大家先前认为的那么早，但从采集的包含物可知这个遗址的文化内涵相当丰富，有发掘的必要，但考虑大规模发掘史前遗址的经费开支太大，省考古所也难以承受，毕竟这是独立于基建考古之外的项目，于是便安排考古队员对肖家洞遗址进行一次小规模试掘，发掘目的一是弄清楚遗址文化层的内涵后再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发掘经费，二是搞清楚该堆积的地层是否为后期的挤压堆积。时隔10天，原调查队员转变为肖家洞考古试掘小队，再次来到了肖家洞。在试掘地点的选择上，因为洞内废弃水池的东侧有一处约60厘米的胶结层，其内大致有6个层位，通过这块胶结物观察，有大量的石制品、动物骨骼在内，可见此处遗物非常丰富，便在这里布了一个1×2米的探方，发掘面积为2平方米。

肖家洞洞穴所在山体为石灰岩山体，试掘区域位于洞穴靠南壁处，水滴常



肖家洞遗址出土的双头骨锥



肖家洞遗址出土的磨制骨锥



年滴在该区域，钙化比较严重，每发掘一层，其下就是一层钙化层，需要使用凿子将钙化层凿开，然后再进行清理。发掘过程中，我省的旧石器专家建议发掘区再向南侧扩方 1 米。扩方后发现钙板层继续向这一方向延伸，且钙板层不规则，越往南越厚，厚度达到 50 厘米。试掘小队实在无力凿开这一层位，只能放弃向南扩方的打算，继续向原探方下进行发掘。到达比较深的层位时，可操作空间就极为狭窄，无法继续向下开凿，故仅发掘 2.55 米深，其下地层依然为一层钙化层，层内依然可见动物骨骼和燧石制品胶结于内，但实在无法继续向下发掘，探方内仅存的空间也无法继续操作，所以只能将发掘终止于此层之上。发掘时，为避免大量的细碎石片或者小动物牙齿、骨骼混在土壤内，发掘队伍将土样进行仔细过筛，然后将出土遗物归入相应地层进行收集。大块的胶结物被凿开后，没有办法把它们分开，只能收集起来，留待考古学发展出新的技术后解决。

山中无日月，寒暑不知年。考古队员们在发掘遗址时也是如此。试掘地点位于洞内，洞口狭小采光差，发掘过程基本“不见天日”。考古队员们每天吃完饭后就进入探方，或是在探方底部如同老石匠一样叮叮当地开凿钙化层，或是将地层中的包含物发掘出来，或是在筛选土样时发现一些新的出土物。没有新发现的激情，陪伴考古队员们的只有那一盏白炽灯，那灯光下幽幽的燧石制品、白中泛黄的动物骨骼，每天的机械重复，每天固定的程序。直到工地结束，使用编织袋装满土壤后将探方回填，一个半月后，这次肖家洞遗址的试掘工作结束。

这次对肖家洞遗址的试掘，使考古队员们对遗址地层和堆积情况更加了解，其文化层可分为 15 个自然层位，除第 1 层至第 3 层为晚期人类堆积外，第 4 层、第 5 层的年代大致在宋代，以下层位的年代均为史前。史前层位中的遗物堆积保存情况较好，地层内多夹杂大小不等的角砾，部分地层形成较大块状胶结。各层均出土文化遗物。用火遗迹有烧骨、炭屑、烧石等。出土大量石制品、骨制品、动物遗骸和极少陶片。在 11 层之下就没有发现磨制骨器或者磨制石器，



肖家洞遗址出土的刮削器



肖家洞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



推测该层之下应该进入旧石器时代。贵州省博物馆的老师来工地上指导发掘工作时，对发现的动物骨骼进行辨认，又从里面新发现了象、獾等哺乳动物的化石。加上采集拣选出的遗物，整个肖家洞遗址出土石制品数千件，以打制为主，原料以燧石居多，类型有石核、石片、石器等。制作方法以锤击法为主。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以刮削器为多，以正向加工为主。磨制骨器较多，类型有锥、铲，以铲为主。陶片均为夹砂陶，多为绳纹、素面。动物遗骸石化程度不一，以碎骨为主，种类有蚌、贝、螺、鱼、龟、鸟，以及大量哺乳类动物遗骸，如鼠、竹鼠、豪猪、蝙蝠、熊、獾、象、猪、鹿、牛等 10 多种。陶片均出土于 6 层以上。初步推测，肖家洞遗址的年代处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

肖家洞遗址发现的这批骨角器共 86 件，除 28 件残破骨器无法具体划分形制外，其中有骨铲、骨锥、骨针、角铲简单的几类，仅正面靠近刃部加以磨制，但磨制痕迹不明显。通体磨光的仅有两端磨制骨铲和两端磨制骨锥各 1 件。因此，肖家洞出土的磨制骨角器以仅加工刃部的为多，类似于平坝飞虎山出土的骨角器，而同普定穿洞大部分磨制骨器均为精细加工有所差异。本次试掘出土的骨角器的器形同以往贵州发现的骨角器类型相似，也多为铲、锥两种。但也有一定新的变化，如扁平型骨锥（06GJX 采 4）的发现。它的器形较为特殊，为贵州以往所未见，另如扁尖头骨锥Ⅱ式（06GJX 试⑧：12）、特殊角铲（06GJX 试 11：1）等，均有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特殊之处。同时，本次试掘出土的骨角器具体形制也较多，具有更多的种类，从骨器刃部和器身的相对位置判断，或许存在左利手使用者。以刃部形态分类，骨铲类型有平直头、圆头、两端磨制骨铲，骨锥类型有锐尖、扁尖、钝尖、斜尖等多种类型。从这批磨制骨器的现存情况看，其制作材料应多为动物肢骨部分。其骨料的制作方法较为多样，既有将骨料打制成形后进行磨制的；也有仅于刃部进行轻微磨制的；有通过火焰略微烧灼需磨制区域之后再进行磨制工序的；也有通过石片或其他锐利工具对骨料进行刮削或切削加工成形，以便进一步加工的，考古队员们采集的一件骨料即是采用

此加工方法,因此其在骨料制作上同平坝飞虎山、普定穿洞遗址等没有太大差异。

总的来看,肖家洞遗址试掘面积小,出土器物相对较少,虽然采集了大量脱层的器物标本,但对研究贡献不大。肖家洞遗址的发掘,是黔中地区进行的第二次史前遗址发掘。同打儿窝遗址不同的是,这次发掘在岩洞较深处,钙化层较多且较厚;相同的是,因为发掘空间的原因,每次的发掘都没有到底,没有能清楚地认识到遗址的性质。从资料来看,它又一次确定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走向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的脚步。



第二章 汉晋遗韵

黔中地区的汉晋遗存主要密集分布于贵安新区马场镇附近的万人坟、熊家坡、大松山、杨家桥等地。此外，在平坝夏云尹关、西秀宁谷、镇宁田脚脚、清镇芦荻哨及赤水河沿岸等地有零星分布。遗存以墓葬为主，出土器物包括瓷器、陶器、青铜器、铁器、金银器，以及琥珀、玛瑙、水晶等。

目前，贵州发现的两晋南朝时期遗存主要集中分布在贵安新区马场及其周边区域，特别是马场镇周围的几处丘陵地带，出土的系列精美文物，与国内同时期器物在质地、器形上有着共性特征，说明这一时期仍然以汉文化为主流。该时期遗存鲜见于贵州其他地区而在黔中地区密集分布，是贵州该时期遗存的一个最突出现象。黔中地区是贵州汉式遗存分布的一个重点区域，两晋南朝时期遗存与汉代遗存分布区域几乎重叠，说明汉文化在此地的可持续发展。黔中地区两晋南朝时期遗存较汉代遗存在分布范围上大幅萎缩，却在马场镇一带有丰富而集中的发现，是该地区许是行政、交通、经济中心功能继续的有力证明。而贵州其他汉式遗存分布区域未有或仅有两晋南北朝时期遗存的零星发现，说明其行政或经济功能的衰退，反映了中央对该地区直接管理力量的削减。贵州汉晋时期遗存分布的演变规律，生动见证了中央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管理轨迹。

第一节 清镇汉墓

清镇市与平坝区的交界地带是贵州汉墓分布的重要区域，也是贵州汉墓开展工作最早的地区，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在清镇琊陇坝、苗坟坡、芦荻哨、土门寨、余家龙潭，平坝夏云镇金家大坪、尹关、老鸡场，白云镇平庄、平林，天龙镇江河村、小村等地发现了上百座汉墓，并正式发掘了80余座汉墓。

1954年，羊昌河灌溉工程施工时，在平坝金银乡蒲山村与老岛村间发现了许多不明显的“土堆”及疑似汉墓的器物坑，展开深入调查后确认以往调查的“大土堆”均是墓葬。1956年至1958年，在平坝、清镇一带累计发现28座汉墓。1959年，在清镇、平坝交界处调查发现汉至宋代墓葬300座，并发掘了140座，其中汉墓约占26%。1966年，在平坝天龙江河寨和大小寨等地清理了6座汉墓。1999年和2014年，又先后和平坝夏云清理汉墓5座。

琊陇坝墓群分布于贵阳清镇市红枫湖镇。琊陇坝墓群有圆丘形封土堆20余座，部分保存完好。其中1号墓封土最大，底径15.7米，高3.27米。1957年至1959年发掘21座，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方形券顶与“凸”字形券顶砖室墓、长方形券顶石室墓3种。出土各类器物近200件，五铢、大泉五十钱数百枚。其中，陶器有罐、壶、钵、甑、碗、纺轮以及房屋、鸡、马、狗等模型；铜器有钺、矛、洗、壶、瓶、釜、盘、豆、灯、簋、斗、耳杯、镜、带钩、戒指等；铁器有刀、剑、削、铲、锥、三脚架等；漆器有盘、耳杯两种，其中2件漆耳杯刻有文字“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1件漆耳杯刻有文字“元始三年蜀郡西工造”。另有银手镯、银戒指、琥珀饰、琉璃饰等装饰品。墓葬年代为西汉晚



期至东汉初期。20 世纪修建红枫湖水库后，墓葬被淹没于水库底，具体情况现已无法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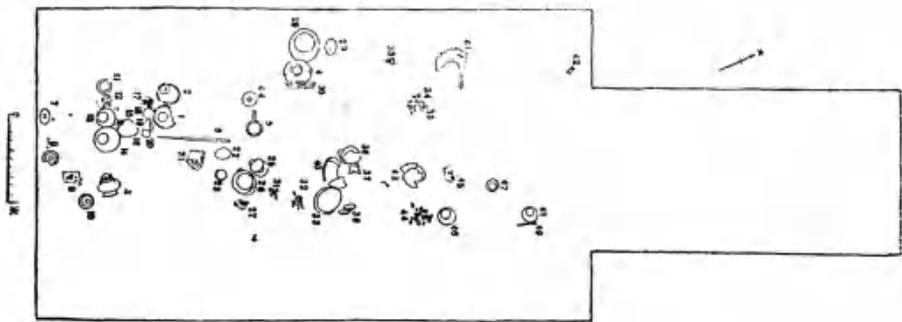
芦荻哨汉墓位于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原有汉代墓葬 5 座，20 世纪修建红枫湖水库后，墓葬被淹没于水库中，具体情况现已无法调查。1959 年贵州省博物馆发掘了其中 1 座，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 3.1 米，宽 1.4 米，残深 0.5 米。早年被盗。出土陶壶、铁刀各 1 件，铁抓钉 2 枚。

土门寨汉墓位于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原有汉代墓葬 5 座，20 世纪修建红枫湖水库后，墓葬被淹没于水库中。1959 年贵州省博物馆发掘了其中 2 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长 3.3 米，宽 2.1 米，残深 0.37 米。出土陶罐、铜盃、铜带钩、铁三脚架、石砚、银戒指、琉璃饰等 13 件。

余家龙滩墓群位于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原有汉代墓葬 5 座，20 世纪修建红枫湖水库后，墓葬被淹没于水底，具体情况现已无法调查。贵州省博物馆曾于 1959 年发掘其中 4 座，1 座为汉墓，3 座为六朝墓，有土坑墓与石室墓两种类型。83 号墓封土呈圆丘形，底径 10.6 米，存高 1.35 米。墓系“凸”字形券顶石室墓，墓室长 3.82 米，宽 1.2 米，残高 1.2 米。早年均被盗。出土陶罐、青瓷壶、铜豆、铜灯、铁三脚架、金珠、银戒指、琥珀饰等 10 余件。

汉墓主要分布于羊昌河两岸，墓葬形制主要分为土坑墓、砖室墓和石室墓，土坑墓居多，占墓葬总数的 80% 以上。

土坑墓以无墓道的长方形墓为主，也有少数方形墓；另有带斜坡墓道的，根据墓道位置的不同，可分为墓道位于墓室前方正中的“凸”字形墓和墓道位于墓室前方一侧的刀形墓，以前者数量为多。如清镇 M13 为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凸”字形墓，墓室长 7 米、宽 3.95 米，墓道长 4 米、宽 2 米，该墓虽被扰乱，仍出土随葬品 50 余件，有陶罐、量、钵、锅、洗、铜壶、扁壶、鏃斗、斧、壁形鍍金铜片、铁剑、铁环首刀、漆耳杯、漆盘、货泉、货布、大泉五十、五铢钱等。其中，还包括元始三年（3）蜀郡制的漆耳杯等重要文物。土坑墓部分墓道、墓室四周或两壁有夯筑或用棍棒拍打坚实的痕迹，在封土、墓室填土、墓



清镇 M13 平面图

底及随葬品周围常发现零星或成堆的木炭，推测是用于防潮。排水方面，部分墓葬墓底铺以鹅卵石，或将墓底修整成中间略凸起、四周下凹的浅沟状，以便排水。如清镇 M2 随葬品周围有成堆的细碎木炭，清镇 M13 墓室南端随葬品底部及周围有 10 厘米厚的黄色灰层，这些现象应也和防潮有关。土坑墓葬具大都腐朽，葬式不详，一些墓室中发现的大量木片痕迹和涂朱漆片，应为棺木痕迹，清 M15 基本所有随葬品都被腐朽木片痕迹包围，可能为木槨。

砖室墓以无甬道的长方形单室墓和带甬道的“凸”字形单室墓为多。清镇 M4 平面呈方形，仅墓底和后壁用砖砌筑，形制特殊，可能为匆忙下葬所致。多室墓仅在清镇发现 1 座，即清镇 M1。该墓系一座狭长带甬道，前、中、后室前后纵列的三室墓，整座墓全长 10.7 米，甬道与前室底部较低，中室略高，后室又较中室高，室与室之间均用砖横砌间隔，甬道封门砖前还用 4 块砖砌成踏步，并于中室发现 5 个铁钩，发掘者推测为悬棺用。

石室墓如清镇 M11，为同坟异穴合葬墓，位于同一封土堆下，可能为夫妻合葬墓。南北两墓间相距约 1.9 米，没有甬道相连，均倾圮。

清镇汉墓中出土了许多极具特色的器物。清镇 M15 出土铜瓶 1 件，长颈、



扁腹、圈足，器表以龙凤纹为主体，间饰波浪纹、弦纹、锯齿纹等，制作优美，刻纹线条流畅。清镇 M15 出土的龟座灯底部为一龟作爬行状，龟甲上坐一男子，其头顶灯柱，柱顶作分枝状，灯柱分枝及灯盏虽已不存，但设计精妙，制作优美。清镇 M18 出土的铜剑和铜钺较有特点，铜剑为一字格曲刃剑，此类剑多集中分布于黔西南、滇东南、桂西北等地的土著青铜文化，该剑的特征更接近黔西南一带“铜鼓山类遗存”所出铜剑；铜钺略呈琵琶形，圆弧刃，亦具有上述地区青铜文化的特征。清镇 M11 出土的铜树干值得关注，上铸有两尊佛像，佛像结跏趺坐，头顶上有高发髻，着通肩衣，双手置于身前并握住衣角，两尊佛像的发现证明，最晚在东汉晚期，佛教造像和佛教艺术已传入贵州。清镇汉墓出土铜印 3 枚，其中 2 件形制较小，瓦钮，印文分别为“樊千万”和“赵千万”的阳文篆书；另一件亦作瓦钮，但印为空心，可能为子母印的母印，印文为阴文篆书“谢买”。清镇汉墓中还出土了大量漆器，器物种类主要为耳杯、盘、盒、奩、案等。其中 3 件耳杯、3 件漆盘有铭文。清镇 M15 出土的漆耳杯，器身绘有凤纹、涡纹、弦纹几何纹等图案，弦纹之间的黑地上针刻隶体铭文：“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羽画木黄耳椀，容一升十六龠。素工昌、髹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羽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清镇 M56 出土的漆盘，唇口为铜胎囊金，盘身花纹图案以黑朱两色间绘。口沿背面针刻隶书铭文共 61 字：“元始四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彤画纁黄扣饭槃，容一升。髹工刚、上工良，铜扣黄涂工伟、画工谊、彤工平、清工郎造。护工卒史恽、长亲、丞冯、掾忠、守令史万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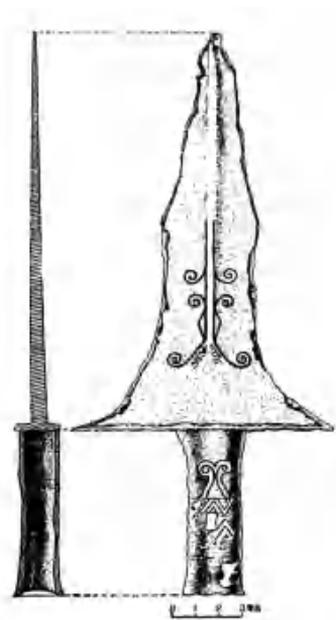
在清镇、平坝一带发现及发掘的汉墓数量均为最多，时代从西汉晚期延续到东汉。该区大部分汉墓发掘较早，相关简报叙述简略，以致难以获得完整的发掘资料。发掘的墓葬中，土坑墓占比最多，又多为无墓道的长方形墓，带墓道的较少，且均为墓道开于前端中部的“凸”字形墓，有的墓底用鹅卵石铺地。砖室墓数量不多，多为单室墓，双室墓及多室墓分别有 1 座。该地区墓葬流行在墓底、填土及封土中添加木炭以达防潮效果。出土器物方面，各种硬陶、高



清镇 M15 出土的铜瓶



清镇 M15 出土的龟座灯



清镇 M18 出土的铜剑



清镇汉墓出土的铜印



清镇 M15 出土的漆耳杯



清镇 M56 出土的漆盘

温釉陶在清镇、平坝一带出土最多，如方格纹陶瓮、罐、双系罐、四系罐等。另外，钵、壶、碗、豆等陶器上施釉的现象也多发现于该地。模型明器数量不多，出土于少量墓中，只见屋、井等建筑明器，鸡、狗等家禽家畜俑，以及铜马、摇钱树等。漆器出土较多，特别是铭文漆器仅见于清镇、平坝一带的汉墓。该地出土的一字格曲刃铜剑、铜钺及烧制粗糙的夹砂单耳罐等土著器物值得注意，目前清镇、平坝尚未发现秦汉时期的土著遗存。汉墓里出土此类器物的原因，可能为墓主偶然所得，也有可能墓主就是汉化了了的土著民族，具体原因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另外，像刻纹铜长颈瓶、铜壶、鏃壶、乌龟跽人座灯、漆器等多出自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反映出墓主人生前地位较高。

清镇汉墓中出土随葬品丰富，其中不乏蜀郡、广汉郡制造的铭文漆耳杯、漆盘，以及提梁铜壶等珍贵器物，显示该地区不仅聚居了较多汉人，且还有部分社会地位较高，极可能为官吏、豪族一类，可能是一处郡县级别的行政中心。

汉代是一个经济大发展、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自西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始，贵州逐渐纳入汉王朝版图，根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向贵州地区的夜郎、且兰等国开拓道路，设置郡县并施加军事压力，以方便其实现征服南越、滇国和远通身毒的目的。在贵阳贵安这片土地上，考古发掘的一座座墓葬，出土的一件件文物，逐渐揭开了汉代贵阳贵安神秘的面纱：青铜时代唱响了最后的欢歌，青铜器制作精良、造型优美，散发着独有的魅力；铁器时代逐渐拉开帷幕，铁器在生产、生活等领域得到推广；制瓷业发展日新月异，施釉陶器精彩纷呈；装饰品来自疆域内外，小巧玲珑。贵阳贵安新区迈开了本地少数民族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民族融合的步伐，并一步步形成了贵阳贵安今日的风貌。



第二节 大松山魏晋墓

贵州考古事业自 1953 年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处建立以来逐步展开，黔中地区是贵州省考古事业开展最早的区域之一。大松山墓群及周边熊家坡、万人坟、杨家桥墓群所在的黔中地区是贵州省魏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发现最为集中的区域。

一、艰辛的历程

1954 年，羊昌河水利工程启动，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处清理发掘组对清镇、平坝羊昌河流域开展考古调查，发现一批汉代遗存，发现许多“土堆”，其中两处“土堆”暴露出两坑文物，并做了清理。1956 年，发掘组对这两坑文物做了简单介绍，推断时间为汉代晚期，据残存石板的排列推测为墓葬。1956 年 3 月，贵州省博物馆清理发掘组在平坝金银乡展开调查，又发现金家大坪的两个“大土堆”，但早期就被严重破坏，5 月对此进行了清理，确认为汉至六朝墓葬，同时证实了 1954 年的发现确为两座墓葬。1958 年 6 月，贵州省博物馆再次对金家大坪的墓葬进行了清理。经过 1954 年至 1958 年间三次对金家大坪墓葬的调查发现和清理，发现这批墓葬有着基本一致的文化面貌和内涵，属汉至六朝墓葬，但都被破坏严重。1954 年发现并清理的两座墓葬残存墓壁石板，出土的方格纹陶罐、铜豆、铜洗等具有代表性，也出土有铜釜和铁三脚架等器物。1956 年和 1958 年分别清理的两座墓葬为汉至六朝的砖室墓，出有铜釜、铁釜、陶罐等器物，部分墓砖上反书“宜子孙”。

1957 年 2—3 月，贵州省博物馆在平坝县（今平坝区，后同）尹关清理了

4座南北朝时期墓葬，包括2座长方形券顶石室墓和2座土坑墓。墓葬位于尹关西侧之滇黔公路两旁，M7、M9为长方形券顶石室墓，墓室内石块加工较平整，但外部凹凸不平，石块横砌封门。M8、M10为土坑墓。以M9出土葬品较为丰富。出土器物主要为生活用器和饰品两大类。按质地可分为青瓷器、铜器、陶器、铁器、石器（砚）、漆器、金、银、玛瑙、琥珀、水晶、玉、琉璃等。器物包括陶罐（有系）、瓷罐（表里均施浅绿色开片薄釉）、铜釜、鏃斗、水注、三足铜洗、铜托杯、石砚、金钗、金饰、金花片、银钗、银手镯、戒指等。另有玛瑙、琥珀、琉璃等质地的串珠多件。发掘者将墓葬时代定为南北朝时期墓葬。

1957年3月，贵州省博物馆在平坝县平庄乡、夏云乡等地清理了墓葬11座（砖室墓3座、石室墓3座、土坑墓5座），应是东汉和六朝两个时代的墓，无更多信息披露，可参考信息较少。

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配合猫跳河一级电站建设工程，贵州省博物馆在清镇市与平坝县相连地带的尹关、琊陇坝、芦荻哨、下山口、余家龙滩、牧马场等地发现了约300座古墓，多分布于羊昌河的两岸，重点发掘了140座，其中三国至南朝墓约占13%。墓葬分石室墓和土坑墓两种，石室墓有铲形和长方形两种，有的墓中设有石台和壁龛，结构较汉墓复杂。出土物包括陶器、青瓷器、青铜器、铁器、料珠、玛瑙和金银发钗等。陶器有陶罐、陶釜和纺轮等；青瓷器有砚、三系罐等；青铜器有铜洗、铜水注、铜盘、铜灯和钱币等；铁器有铁刀、铁剑、铁三脚架、铁剪等；玛瑙、琉璃数量较多，有椭圆形、圆形和动物形等；金银发钗钗首多呈“W”形，系由一中间宽、两端尖之扁条弯曲而成。

1965年底至1966年初，省博物馆历史组在平坝马场清理东晋南朝墓16座，其中含东晋时期2座土坑墓和南朝时期14座石室墓。这批墓葬分布于马场万人坟、熊家坡和大松山3个地点，与本次清理发现的大松山墓群相邻。石室墓共计14座，包括长方形券顶石室墓8座和“凸”字形券顶石室墓6座。墓室都用大小不等且一面加工平整的石块砌成，内壁平直，外壁参差不齐。墓顶用小石块竖砌成券，墓底一般经夯打。长方形券顶墓封土较小，墓室狭长，



无墓道，应是单人葬。“凸”字形券顶墓封土较大，分墓室、墓道两部分，多为双人葬。墓室与墓道一般用石块隔开，作封门用。墓道亦即券顶，较墓室稍小稍低。原有棺木，现仅存铁棺钉，葬式为单人、双人直肢葬，时代定为南朝。另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2座。墓内出土各类随葬品700余件，主要包括生活用器和饰品两大类。按质地可分为青瓷器、铜器、陶器、铁器、石器(砚)、漆器、金、铜鎏金、银、铜、玛瑙、琥珀、水晶、玉、琉璃等。青瓷器共有31件，包括壶(鸡首壶、唾壶)、罐、碗、杯、盘、器盖、水注等。铜器有34件，有釜、洗、壶、豆、镜、托杯、鍤壶、鍤斗。陶器有22件，大多为陶罐。另有铁器16件，石砚1件。漆器现场无法提取。随葬器物中饰品数量最多，种类繁复，共计600余件，主要有发钗、发簪、手镯、条脱、戒指、串珠等；其中金饰148件，银饰116件，铜饰146件，还有玛瑙、琥珀、水晶、玉等213件。

2014年3至5月，为配合吕马(吕庄至马场)公路建设，文物部门组织人力对公路建设用地进行了考古调查，零星清理了3座南朝时期石室墓，并在



马场万人坟平 M48 出土的瓷鸡首壶



马场熊家坡平 M48 出土的瓷罐



马场万人坟平 M48 出土的堆塑莲瓣纹瓷罐



马场万人坟平 M36 出土的蛙形水注



马场万人坟平 M42 出土的铜釜



马场万人坟平 M34 出土的铜釜斗



马场万人坟平 M36 出土的铜托杯



马场万人坟平 M37 出土的铜镜



马场万人坟平 M37 出土的金发钗



马场万人坟平 M337 出土的金簪



马场人坟平 M37 出土的金花片



马场熊家坡平 M42 出土的银条脱



马场万人坟平 M46 出土的串珠项饰



马场万人坟平 M37 出土的串珠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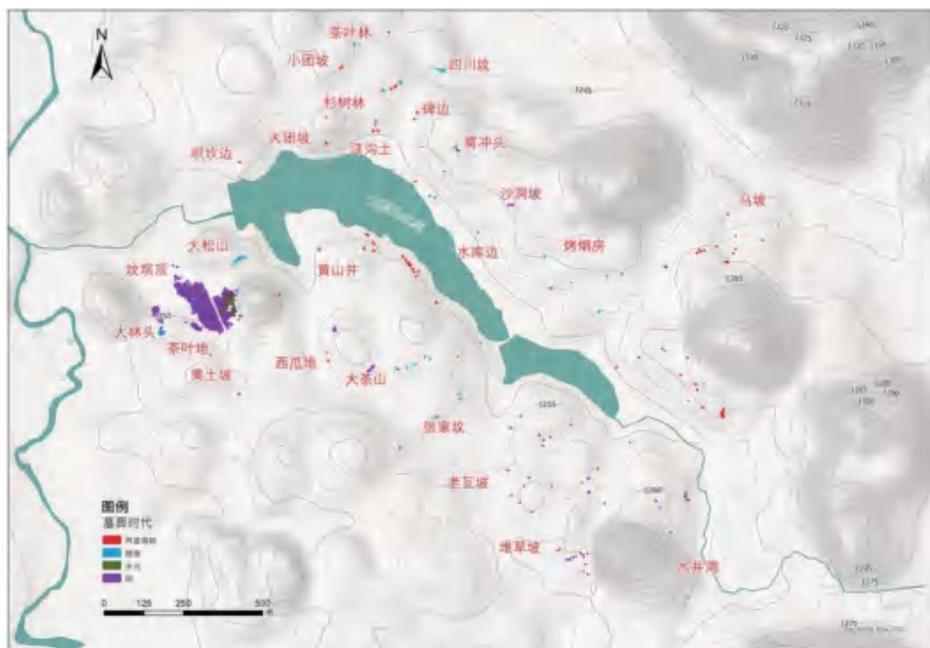
马场镇杨家桥新发现一大型墓地，钻探发现石室墓 70 余座，除少量为宋明时期的墓葬外，多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墓葬多成排分布，显系经过规划。试掘了其中的 3 座墓葬，3 座墓葬在形制和构建方式上有所不同，以杨家桥遗址 M1 保存最好，为狭长方形石室墓，由排水沟、墓门和室组成。排水沟位于墓门外右侧，先挖一条土沟，沟壁和顶用石板砌筑，沟长 4.2 米，宽 0.3 米。墓室用薄石板平砌，石板内壁加工平整，外壁参差不齐，墓口平放一排排石块，形成象征性券顶。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墓内出土有陶器、漆器、铁器、铜器、玛瑙珠、料珠、圆形金片等各类文物数十件。

黔中地区魏晋时期的考古发现与资料的刊布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首先是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是黔中地区考古工作的初始时期，也是黔中地区魏晋时期墓葬发现最多的时期；21 世纪初，黔中地区魏晋时期墓葬考古工作极少，直到 2022 年底至 2023 年初大松山墓群的发掘，才重新将黔中地区的魏晋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纳入学界和公众的视线。

二、寻道大松山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安康大道交兴安大道西南侧，属于喀斯特地貌发育区，海拔约 1200 米，属乌江水系，区域内整体地势较为平坦，以缓坡丘陵为主。墓群内原地表有几座山体，有大松山水库和大规模茶园、部分水泥道路和 1 处砂石厂，总体地势平坦，多为缓坡。2022 年 1 月至 5 月，为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建设项目，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拟建区域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及勘察，发现大量古墓葬等遗迹现象，并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汇报，获颁发掘证照。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1 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为发掘牵头单位，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组成考古发掘联合体对大松山墓群开启了全面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各发掘区共清理墓葬 2192 座，出土各类文物 4000 余件（套），该墓群为贵



大松山墓群平面分布图

州考古史上发掘规模最大的墓群，历史内涵丰富，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其发现为研究该地两晋至明时期文化面貌、社会经济、丧葬习俗及族群演变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并极大限度推动了黔中地区历史时期文化序列的建立。本次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亦是发掘墓葬数量最多、出土遗物最丰富的一处墓群。

发掘的墓葬依据其分布区域、形制结构和出土器物，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为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共发现确认 155 座，其中两晋时期 40 座，南朝时期 52 座，隋唐时期 63 座。该时期墓葬主要散布于大松山水库周围的斜坡地带，依山势排列，三五成群，墓向不一，包括黄山井、坝坎边、堆草坡、马坡等墓地。墓葬形制多为石室墓，土坑墓仅有零星发现。石室墓墓室系用形状不一的石块

或石片砌筑而成，石材内侧修凿工整，外侧未经加工，多为自然岩面。墓室构筑规整，顶部为券顶，流行修筑排水沟，部分墓葬有墓道。

相对而言，两晋时期墓室宽大，墓室所用石料大且规整，砌筑最为整齐，有汉代石室墓遗风；南朝时期演变成狭长形墓室，所用石料与前期相比变得薄小，券顶石材多为较小的薄石片，部分墓室前端开始出现封门；隋唐时期墓室砌筑不似前期规整，略显随意，所用石材大小差异明显，并流行在墓室前端砌筑封门，封门凸出墓外，砌筑随意。

该时段墓葬被盗扰严重，葬具、人骨基本无存，出土器物包括金、银、铜、铁、陶、瓷、漆木器、钱币等类别。金银器有金花片、金挂饰、银发钗；铜器包括铜釜、铜釜、铜盆、铜发钗、铜戒指、铜链等；铁器有铁釜斗、铁剪、铁钁、铁三脚架、铁四脚架、铁构件；陶器包括陶釜、陶罐、四系陶罐；瓷器有瓷钵、四系瓷罐、六系瓷罐、瓷盘口壶、瓷坛；漆木器主要有漆盒、漆盘；钱币发现有南陈的太货六铢；此外，还有各类用于装饰的串珠。

两晋南朝时期墓葬形制以黄山井墓地为代表进行介绍，两晋时期墓葬包括 M1、M2、M10、M11；南朝时期墓葬包括 M3、M4、M5、M6 等。黄山井墓地 M1 全长 5.06 米，由排水沟、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向 42°。排水沟位于墓室的北部，呈南北向，底部略呈坡状，南高北低。封门位于墓室北部，用石块逐层横砌，自墓底向上逐层堆砌，朝墓室内部一侧相对规整。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封门南部，内部南北长 3.04 米，东西宽 1.78 ~ 1.8 米，残高 0.15 ~ 0.97 米，四壁竖直，底部略呈坡状，南高北低，整体采用多块形制不规则且表面多白色粉末的石灰岩石块砌筑而成，内侧壁面相对规整，墓壁与土圹间的壁面相对随意，修筑墓壁的石块有的直接紧贴士圹，有的则在土圹与石砌墓壁中间留下较大的缝隙，因此土圹与石砌墓壁间填充有黄褐色黏土。人骨葬具无存。随葬品共有 13 件。墓室内不规则分布有棺钉 9 件，墓室南部偏西出土瓷片 1 件。墓室填土浮选出土指环 1 件、水晶 1 件、串珠 1 件。

黄山井墓地 M2 全长 8.19 米，由排水沟、墓道、封门、墓室四部分组成，



黄山井墓地航拍图

墓向 9° 。排水沟位于墓室的东北部，叠压在面上，被封门石叠压，打破墓道延伸到墓室外东北部。墓道位于墓室的北部，平面呈四边形，土坑直壁，北高南低呈斜坡状，墓道北部高出墓道底部0.24米处放置有1件铁鏃斗。封门位于墓室北部，用较大石块逐层横砌，共8层，自墓底向上逐层堆砌，朝墓室内部一侧相对规整。墓室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内部南北长3.02米，东西宽1.15~1.36米，残高1.03~1.42米，四壁竖直，底部平缓，整体采用多块形制不规则且表面多白色粉末的较大较厚石灰岩石块砌筑而成，内侧壁面相对规整，墓壁与土坑间的壁面相对随意，修筑墓壁的石块有的直接紧贴土坑，有的在土坑与石砌墓壁中间留下较大的缝隙，因此土坑与石砌墓壁间填充有黄褐色黏土。人骨葬具无存。随葬品共有19件。墓室内不规则分有棺钉6件、串珠10件。墓室中部出土石纺轮1件。墓室北部偏西出土瓷片1件。墓道中部靠近封门处出土铁鏃斗1件。

黄山井墓地M4全长3.68米，由排水沟、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向 343° 。排水沟位于墓室的东北角，呈东西向，向东延伸，底部略呈坡状，西高



——○
黄山井 M2



——○
黄山井 M2 出土的铁鐮斗



东低。封门位于墓室北部，用石块横砌。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内部南北长3.16米，东西宽0.94~1.04米，残高0.1~0.6米，四壁竖直，底部略呈坡状，南高北低，整体采用多块形制不规则多白色粉末的石灰岩石块砌筑而成，内侧壁面相对规整，墓壁与土圹间的壁面相对随意，修筑墓壁的石块有的直接紧贴士圹，有的则在土圹与石砌墓壁中间留下较大的缝隙，因此土圹与石砌墓壁间填充有黄褐色黏土。残存部分人骨遗存，保存较差，葬具无遗存。随葬品共5件。墓室东北角出土1件瓷罐。墓室北部偏西出土1件陶钵。墓室中部出土1件棺钉。墓室北部出土1件串珠。墓室填土浮选出土1件串珠。



——○
黄山井 M4



○
黄山井 M4 出的
土瓷罐

黄山井墓地 M6 全长 5.3 米，由排水沟、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向 53°。排水沟位于墓室的北部，呈南北向，向北延伸，底部略呈坡状，南高北低。封门位于墓室北部，用石块横砌，残存 6 层，修筑封门时采用的石块大小不甚统一，自墓底向上逐层堆砌，朝墓室内部一侧相对规整。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内部南北长 2.96 米，东西宽 0.6 ~ 0.66 米，残高 0.36 ~ 0.8 米，四壁竖直，底部略呈坡状，南高北低，整体采用多块形制不规则且表面多白色粉末的石灰岩石块和青石块砌筑而成，内侧壁面相对规整，墓壁与土圹间的壁面相对随意，修筑墓壁的石块有的直接紧贴土圹，有的则在土圹与石砌墓壁中间留下较大的缝隙，因此土圹与石砌墓壁间填充有黄褐色黏土。人骨葬具无存。随葬品共 8 件。墓室中部出土 3 件棺钉。墓室填土浮选出土 1 件串珠、1 件铜指环残片、2 件鍍金器残片。

三、“晋弱夷强”，本地文化复兴

大松山墓群所在的贵州贵安新区马场镇及周边是贵州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分布最密集的区域，这也证实了马场一带是贵州东晋南朝时期墓葬的最重要分



布区，为研究贵州东晋南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埋葬习俗、经济状况、文化面貌及民族融合等将提供新的资料。但限于材料刊布情况，相关研究并不多。叶成勇先生在《黔中地区魏晋南朝考古遗存探究》一文中提出，清镇、平坝一带的六朝墓的形制和随葬品情况反映了汉移民与外界保持着不断的联系，在追求本土化进程中促进了牂牁大姓的形成。作者认为黔中地区魏晋南朝时期的汉式墓葬属于当时的牂牁大姓及其部署的遗留物。魏晋南朝时期牂牁郡主要在向东、北、南转移中得到了较快发展，隋唐时期的牂牁大姓正是在这样的漫长演变发展中形成的。这与在安顺、清镇、平坝、开阳等地的考古发现很吻合。张合荣先生在《从考古遗存看汉晋南朝时期的牂牁郡郡治》一文中指出，两晋南朝时期的遗存与汉代遗存分布范围基本重叠，但遗存的数量和实际分布范围有所减小，从汉到南朝时期的文化表现出一种由兴盛到衰落的现象，南朝时期的遗存主要集中在贵阳西南侧的平坝与清镇相连区域，汉文化遗存并不多见的马场镇成为南朝时期遗存最集中的地区，在马场镇偏东侧东西向小土山上，由北向南分布着万人坟、熊家坡、谢家坡、刘家寨、大松山等墓地。这些墓地具有相当鲜明的分布特点，即主要分布在东西走向的小土山南坡，相当数量的墓葬地表还保存有封土。从这一带汉至南朝到隋唐时期考古遗存的变化，一方面似可看到牂牁郡文化政治中心有逐渐东移的现象，另一方面亦可看到两晋南朝以后，中原王朝对贵州等边远地区的控制和管理不断减弱的实际。

大松山墓群中发现的两晋至隋唐墓葬，在贵州地区既往考古中少有发现，体现出极强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填补了两晋至隋唐时期考古及西南民族考古的诸多空白。在马场一带丰富的魏晋南朝隋唐时期的考古遗存，特别是南朝时期遗存，是云贵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丰富、文化因素最复杂的南朝时期墓葬，反映了该时期“汉夷边界”东移到了黔中地区一带。可以说，本次大松山墓群的发现，生动地反映了中央对西南边疆从郡县制、羁縻·土司制到建省的管理轨迹，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巩固进程的研究提供了考古实证。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混乱的时代，频繁改朝换代。这一时期中央王朝式微，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减弱，“晋弱夷强”，本地文化复兴。贵安新区的墓葬中开始出现较为浓郁的地方风格，墓葬多以石室墓为主，不见当时中原地区盛行的墓志铭和买地券；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饰品，包括金、银、玛瑙、琥珀等各种材质。中原文化的影响依然强烈，较为明显地表现在器物组合上，出土了较多鸡首壶、水注等典型器物。出土的茶具和酒具，亦反映了那个时代崇文尚玄、嗜茶乐饮的时代风格。



第三章 黔中唐风

唐代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座高峰，但贵州是否存在唐代遗存，唐代遗存的文化面貌如何，一直是贵州学术界争论的热点，贵阳贵安的考古工作为这场争论最终画上了一个句号。

目前发现的唐代遗存以墓葬为主，集中分布于贵安新区平坝马场镇附近熊家坡、大松山一带，凯掌也有零星分布，是目前贵州唐代墓葬的仅有发现。出土器物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漆器等，有铜铎、铜釜、铜镜、金戒指、银条脱等器形，有着国内同时期同类器物的共性特征，体现了该地区汉文化的延续或文化的交流。从汉代中期开始的汉文化遗存在贵州的广泛分布，到两晋南朝时期的减弱，到唐时期的衰退，均体现出中央对西南边疆地区直接管理的减弱趋势。而黔中地区密集分布的隋唐时期汉式遗存，除了该地处于交通枢纽位置或有着贸易集散功能外，是否也反映了该地因在西南地区的枢纽位置或者凭借其作为边疆地区重点管理的必要性，仍然可能是中央直接管理区域。

第一节 熊家坡唐墓

迄今为止，马场是贵州发现唐代遗存的唯一地点。1965年底至1966年初，

贵州省博物馆在平坝县（今平坝区，后同）马场附近发掘了古墓 34 座，时代为东汉至明代。其中唐墓 3 座，位于马场东约 0.5 千米处的熊家坡，包括 2 座石室墓（M40、M43）和 1 座砖室墓（M56）。

一、拨云见日

3 座唐墓的地表都没有明显封土，墓葬因遭受盗扰，破坏严重。石室墓的四壁用未加工的石块砌成。平面呈长方形，墓室残高不到 2 米，顶部已被毁，结构不明。砖室墓 M56 全长 4.1 米，宽 2.3 米。为穹庐顶，有墓室和墓道，墓道封门外带翼墙，平面呈“圭”字形。东、西、北三壁以单砖错缝平砌，底部用砖砌成二横二纵。墓砖素面无纹饰，均长 30 厘米，宽 16 厘米，厚 6 厘米。墓室北段为棺木，根据棺钉位置判断，该墓为双人合葬墓。墓道在墓室南侧，墓顶南高北低。平面结构较为独特，在贵州省鲜有发现。

3 座墓葬共出土器物 20 余件，包括陶器、青瓷器、铜镜、金银饰物等。这 3 座墓以 M56 出土器物最多，种类最丰富，计有陶罐 2 件，陶釜 1 件（出土时置于铁四脚架上），四系双耳青瓷坛 1 件，圆形素面铜镜 1 面（置于漆盒内），金、银戒指 6 只，银发钗 2 件，料珠 11 颗（计 1 件），另有漆盒、漆碗等。M40 出土陶釜、三足陶盘、双口陶坛、四系双耳青瓷坛、带耳勺铜夹、海马葡萄纹铜镜各 1 件。M43 出土八弧花鸟铜镜 1 面。



熊家坡平 M56 出土的瓷双口小罐



熊家坡平 M56 出土的陶罐



熊家坡平 M43 出土的铜镜



熊家坡平 M56 出土的铜镜



熊家坡平 M56 出土的金戒指



熊家坡平 M47 出土的银条脱

铜镜共发现 3 件，3 座墓各发现 1 件。M40 发现仅残余一角的海马葡萄镜，上面有清晰的海马和葡萄图案。M43 发现八弧花鸟镜，镜的边沿由八道弧形组成，镜的外晕部位饰有 8 只蝴蝶，内晕部位交错装饰 4 只雀和 4 枝花，镜的中心是圆形镜钮，直径 10.8 厘米。M56 发现圆形素面镜，直径 10.2 厘米。海马葡萄镜和八弧花鸟镜的形状和纹饰是唐代所特有的，这 2 面铜镜成为考古队

员们确定墓葬时代的主要依据，并依此将这 3 座墓葬的时代确定为唐代。

二、汉夷交融

3 座墓的随葬品既有明显的汉文化特点，又具有汉夷交融后形成的区域性特点，是魏晋南朝以来汉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之间交往、交流所产生的深度融合。其次，可以看出文化来源的延续性和融合性。四系双耳青瓷坛、陶釜、金银戒指、银发钗、料珠、漆盒、漆碗等，在马场一带魏晋南朝墓葬中常有发现，这些器物应为本地生产和使用，说明包括具有浓厚汉文化因素的砖室墓在内，与当地前期的文化有明显的承袭关系，这些人群之间的生产生活与居住地域存在延续性和稳定性。海马葡萄镜和八弧花鸟镜等应是由中原直接输入的器物，反映了本地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第二节 大松山唐墓

大松山墓群主要位于贵安新区马场镇大松山水库周边。2021 年底，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址定址于此，整个校区面积有 3300 余亩，而贵安新区马场镇属于贵州文物资源的富集区域，其镇子周边更是如此。考古队员预感会有重大发现。果不其然，2022 年 1 至 4 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队伍联合洛阳九龙公司勘探队伍对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进行勘探，共发现两晋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墓葬 620 余座。

作为贵州考古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大墓群，且通过《贵州平坝马场两晋南朝墓发掘简报》和《贵州平坝县马场唐宋墓》2 篇文章可知，马场这些墓葬年代从



两晋南朝开始直至宋明，均保存较好，墓内出土了大量的金、银、铜、铁、玛瑙、琥珀、玻璃、漆木等不同材质的各类文物，且体型巨大，档次和品质都极高。另外，贵阳地区虽不像新疆甘肃一样，墓内会保存有大量的有机质文物，但是贵阳也有几次因棺木密闭性好，出土了保存较好尸体的例子。在距离马场不远的安顺宁谷，在20世纪90年代的考古发掘中，龙泉寺汉代遗址因为地下水位高，出土了汉代的房屋构件、带文字木牍等重要有机质文物等。因为以上的原因，在考古发掘前必须考虑出现有机质文物时的保护措施。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虽然负责全省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但实际人员并不多，无法完成在既定时间内的发掘工作，有很大的人员缺口。一般考古工地开年即开始考古发掘，大量外聘技工年初即奔赴各地的考古工地，无法召集人员。针对这些问题，省考古所拟定了几条对策：一是在网上招聘有考古经验的学生，在9月之前的暑期突击发掘一大批墓葬，减轻考古发掘的工作压力。二是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3家单位组成考古联合体，共同应对这批墓葬。另外，对于有可能出现的保存好的人类遗骸、出土文物复杂的墓葬等，则同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学院和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合作，紧急问题紧急处理。再同施工方联系，在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址工地中建设一批板房，解决发掘人员的食宿问题，设立实验室，特殊情况下把墓葬转移至室内进行清理，同时兼顾管理和文物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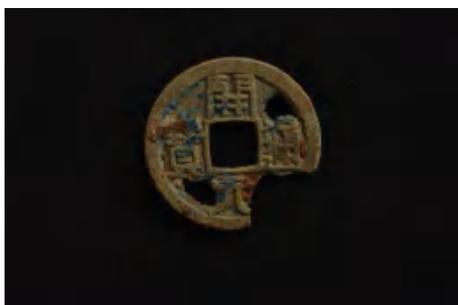
但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7月初，为加快贵州医科大学建设，省里要求考古发掘队伍先期入场进行考古发掘。2022年7月13日始，考古所和北大、川大、中大的发掘队伍陆续入场对大松山墓群进行考古发掘。贵州医科大学被划分为四大板块，每家单位负责一块，各司其职起来。

在考古工作中通过墓葬的埋藏来判断墓葬的年代，并没有大家设想的那样轻松，古人绝对不会严格按照时代来分这里是两晋，那几座是南朝，这边是隋唐，那边是宋元时期的墓群，每一个墓地的情况都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区域内不同时代的墓葬混淆在一起，把它们区分开来，也是考古工作者必须完成的任务。

整个大松山墓群横亘于 3000 多亩地域内，划分出不同的数十个小的地点，如大团坡、小团坡、马坡、碑边、茶叶林、烤烟房、杉树林、水库边、四川坟、老瓦坡、张家坟、坟坝顶、窝冲头、大林头、洋沟土、沙洞坡、大松山、黄山井、大茶山、西瓜地等。而其中涉及唐代墓葬的，就目前整理的资料来看，大致有洋沟土、马坡、小团坡、大松山、大茶山、坟坝顶、大林头几处地点。



马坡 M7 出土的带乳丁陶罐



马坡 M32 出土的开元通宝铜钱

发掘伊始，虽然都知道早年出土了 3 座唐代墓葬的马场是贵州唯一发现唐墓的地点，但毕竟当年发掘的时间距今太远了，也仅仅知道其中 2 座是石室墓，1 座是砖室墓，但没有具体的石室墓墓葬图，墓葬形制同这一次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目前发现的石室墓是否有很大的差异，暂时不明。所以，考古发掘者们对唐代墓葬的认知是极模糊的。好在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考古发掘队伍在凯掌清理了一批石室墓葬，其墓型狭长，两端略弧，墓前封门多达五六层，但其被盗严重，从中出土有肩部带有乳丁的陶器，极为特殊，或许这就是这次发掘中寻找的唐代墓葬，但也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而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校址发掘出土的墓葬中，有一种墓型狭长、墓前有长长排水沟的墓葬，它几乎分布于除坟坝顶墓区之外的所有墓区。前期发掘时大家都认为它们就是南朝时期的墓葬，



大茶山 M14 出土的大货六铢（南朝陈）

川大发掘的小团坡 M1、洋沟土 M4 都是如此。但在北大发掘的马坡墓葬中，虽然墓葬被挤压变形严重，没有能出土漂亮的青铜器，但是陶器肩部特有的乳丁还是在彰显着它们身份的不同。墓内随之出土的开元通宝（唐代始铸行的钱币），则明显地将其从南朝划分了出来。另在大茶山 M14 中，出土的南朝陈铸行的太货六铢（铸行于公元 579 年，公元 589 年隋灭陈，南朝结束）则清楚地告诉发掘者们，这一类墓葬的年代应该在南朝之后，但能否区分出隋和唐则不太清楚。因此，发掘队员们把这一类多层封门的墓葬的年代暂时定在了唐代。

在初期的墓葬清理过程中，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期认为存在大量随葬器物的设想基本落空了。但 7 月份开始发掘和清理的小团坡 M1 无疑给考古队员们打了一针强心剂。它是川大发掘区最先清理的几座墓葬之一，位于小团坡，是一座石室墓，墓葬全长 3.72 米，墓向 95° ，因为墓室土圻东端被破坏，整个墓葬的宽度仅 0.81 米，深度也只有 0.81 米。墓室券顶石材多为较薄的石片，形状、规格均大小不一，其形状有长方形、椭圆形、圆形等，因为周边泥土的挤压，券顶大部分已塌陷于填土中，仅北部少量保存，墓底也为生土，未见铺设，由北向南倾斜，坡度为 6° 。墓中出土棺钉数枚，葬具应为木棺。随葬品共 6 件，



小团坡 M1 出土的串珠



小团坡 M1 出土的交股铁剪刀

其中戒指 3 枚、串珠 1 串（36 颗）、铁剪刀 1 把、铁构件 1 件。从随葬串珠看，大部分是骨质的，也有玛瑙和玻璃，给人一种时光久远的感觉。铁剪刀也是锈迹斑斑的，且不是大家现在所见到的剪刀形制，而是交股剪，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发掘队员们大致推测其为唐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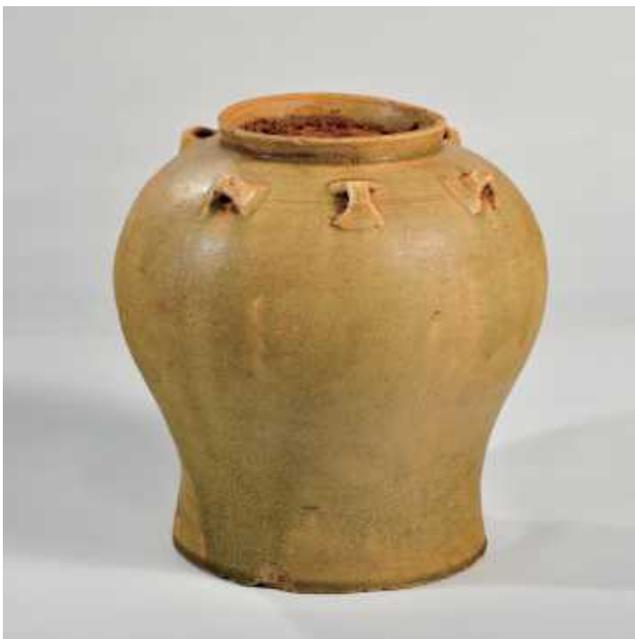
如果说小团坡 M1 是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址考古发掘中第一座出土遗物较多的墓葬，洋沟土 M4 的清理则让发掘队员们看到了这一批隋唐墓葬的秀美。洋沟土 M4 全长 3.75 米，墓葬由排水沟、封门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向 174°。封门保存完整，建构方式与墓壁一致。封门前有排水沟。其构筑方式为：在封门外挖一长条形土坑通到断崖处，坑口较宽，向下窄收，出水口开在封门中部底下，用 3 块石片搭成三角形，再沿坑底铺垫一段石片。墓室券顶保存基本完整，券顶石材多为较薄的石片，形状、规格大小不一，其形状有三角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如同不规则的石板插在了墓室上一样，非常有意思。在墓室中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铜铃 1 件，置于死者头侧，贴近棺板，推测系头部装饰物；铜链 1 件，为扁圆柱形穿孔铜珠串成，系一装饰品，推测原应佩戴



在死者脚部；还有漆盘 1 件、陶四系罐 1 件、瓷六系罐 1 件，均置于墓室北部东侧，漆盘仅剩痕迹，已无法提取；还有铜盆 1 件、四角铁架 1 件，置于墓室北部西侧，铜盆置于铁架上。通过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发掘队员推测这个墓葬幸运地逃过了盗墓者的觊觎。但它的封门方式并非多层，且出土的瓷六系罐同 1965 年出土的六系罐类似。关于这座墓葬的年代，早先是判断为南朝的，直到 2022 年 10 月 12 日，武汉大学的老师带领监理组来大松山墓群发掘工地进行监理，检查工地发掘、资料记录、工地安全等情况并提出监理意见。随行的专家看了在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发掘出土的文物后，很肯定地认为，从洋沟土 M4 中出土的双耳四系罐应该是隋至初唐的瓷器，其器形腹部之下较南朝的同款器物更为修长一点。之后经过详细对比研究，这一类墓型狭长、接近南朝墓葬的墓，虽然墓前封门层数单一，但应该就是大家寻找的唐墓。



洋沟土 M4 部分器物的出土情况



洋沟土 M4 出土的六系罐（隋—唐）

9月，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并没有停止，只是省考古所要求发掘工地必须加强管理，规定每人必须戴上口罩进行发掘工作。与此同时在大松山墓群围墙外清理了很大一片区域，也仅仅在大松山墓群保护墙外一二级阶地上发现了10余座石室墓。这些墓葬形制瘦长，使用薄石片砌筑，大家一致认为它们应该都是唐代墓葬，可惜的是它们早年都被盗墓贼破坏了，基本没有任何随葬器物发现。但发掘人员心里却有一点疑惑，距离坟坝顶墓群仅有一沟之隔的地方发现有这么多的唐代墓葬，为什么坟坝顶墓区那里没有？

工地的进度随着发现越来越多而愈加繁忙了起来，临近年底，正是贵阳天气变化最剧烈的时候，中大工地已基本结束，发掘人员逐步撤离。北大的发掘团队也预计于12月26日完成所有考古野外工作转入室内的时候，给省考古所发掘团队发了一张微信图片，他们在大林头墓区清理M32时出土了一件带脚和耳的铁器，粗粗一看还以为是一件铁鏊斗，只是柄掉了。稍后北大发掘团队又



发来了一些资料，认为这件器物应该是唐代的铁鍩，器形同长安、洛阳几个地方出土的铁鍩相似。省考古所队员的兴趣瞬间大增，走到大林头墓区，一打眼就看到 M32 及周边的 M35、M31、M29，它们都有所不同，这批墓葬的墓型修长，远较明墓的长宽比更大，有的墓葬墓内底部和侧面均有极平整的页岩铺设，出土随葬器物也和唐代墓葬类似，有陶器、铁发钗、料珠、漆器、铁器等。虽然它们墓前没有多层封门，但器物和墓型都和唐墓差不多。同洋沟土 M4 和小团坡 M1 一样，显然这批墓葬年代也可能在唐代，算是考古发掘临近结束时的意外之喜了。

本以为马场唐墓的清理随着 2022 年大松山墓群发掘的完成将告一段落，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继续清理和发现新的唐代墓葬，以便有彻底揭开马场唐墓那神秘面纱的可能。2023 年 2 月，贵安新区为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工程将建设 S210 马场至平寨道路工程，将原本穿过新校区西侧的县道 X001 改道，



○
大林头 M32 出土的铁鍩



大林头出土的唐代土坑墓

新建道路的位置紧邻大林头墓区，一路向南蜿蜒而去。在钻探中新发现的墓葬位于大林头和谢家寨，考古队接下来的抢救性发掘也就集中在这两个区域。而唐代墓葬也基本集中在大林头的小山两侧。刮开表土，最先暴露的有唐墓也有明墓。而清理完明墓后，将其墓葬周围尚未达到生土标准的花土层再向下刮，又露出一批墓型修长的墓葬。比较有意思的是，除了2022年北大发掘队伍清理的大林头M29以薄石板砌边外，省考古所2023年在大林头发掘的所有唐代墓葬都是土坑墓，没有一座石室墓。这同大松山墓群发掘的大多是石室墓、少量是土坑墓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出土随葬遗物也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少见青瓷器，多铁器、陶器、漆器，尤其是漆器，它的种类和数量远超之前。

大松山和大林头的唐代墓葬，多被晚期墓葬叠压，甚至墓葬上方直接叠压晚期墓葬，如大林头M185，其上为M171，时代为明清。在清理完M171后，按照工作要求清理底部刮面时才发现M185，该墓长宽比例符合唐代墓葬特征，



就是整体略短小，在墓内北壁出土箕形陶砚 1 件，时代应为唐代。就目前发掘情况可知，新发现的这批唐墓有石室墓、土坑墓两类，石室墓多被盗掘，土坑墓保存则相对完整，随葬器物有铜发钗，铁鍤、铁剪、铁发钗、铁三角、铁四角，陶罐、陶釜，漆碗、漆盘、漆盒、漆罐、漆勺，料珠，钱币，等等。有意思的是，目前虽然没有出土一具完整的骨骼，但通过墓室内出土随葬器物位置，可以确认的是，唐代墓葬头向也迥异于后世。最先发现的是小团坡 M1，在清理其出土的一串玻璃挂饰时，发现其位于墓门一侧，墓中出土了牙齿 6 颗，均出土于封门一侧，据此推测，墓主头朝向封门。感觉人应该是头向墓门一侧安葬的。水库边 M1 墓内仅出土棺钉 7 枚和牙齿数枚，牙齿均位于近封门处，推测墓葬主头朝封门。烤烟房 M1 则发现墓主的 4 件发钗均位于封门处，可见其头朝向封门。



大林头 M171（明清）和 M185（唐）



大林头 M185 出土的箕形陶碗

由于贵州属于酸性土壤，有机质的物体在其中很难保存，故大松山和大林头的唐代墓葬中能够看到的人类遗骸极为有限，也只能依靠随葬器物来加以判断了。

如前所说，大松山的围墙外面发现了一大批的唐代墓葬，根据墓葬分布规律，大松山墓群的坟坝顶墓区也应该有一些唐代墓葬存在，毕竟那里也发现了几座南朝墓葬和大量的宋元明清时期的墓葬，这可能和考古发掘的工作不够细致有关。发掘完大林头墓群后，因为坟坝顶墓区要进行回填保护，发掘队员们便在保护工程开始前又仔仔细细地进行了刮面，不放过一处一点，居然又发现了一批墓葬，其中就有不少的唐代墓葬。

坟坝顶 M2084 就是被遗漏的唐代墓葬之一，它被明代的坟坝顶 M325 打破并叠压，东侧则被坟坝顶 M1934 破坏，幸运的是这一唐代土坑墓中还出土了几件漆器和一件保存不错的盃形陶釜，里面还有玻璃珠和棺木残片，给考古发掘提供了碳十四测年的材料。距它不远的坟坝顶 M2161 则和它有着相似的命运，它直接被明代的坟坝顶 M326 横向打破，但在木坑中积了许多的碳，发掘者们也不确定到底是棺木碳化了还是周边堆的木炭防腐，但人类的遗骸已经是荡然无存的了，只有随葬的漆器和陶釜还长存于世。



坟坝顶 M2084 发掘至墓底全景



坟坝顶 M2161 发掘至墓底全景

大松山唐墓自 20 世纪 60 年代被发现，到今天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时至今日，虽然几次考古发掘中已经清理了数十座唐代墓葬，但对于它的认识依然是有限的。唐代的贵州在史籍中的记录极少，认识它或许只能依靠考古发掘工作来充实，可考古本就是用人类过往的破碎一角来窥探全貌，也许考古工作者们永远都无法揭开它的面纱，相比于广袤的贵州大地，它们为什么仅仅在马场那小小的一隅存在，还是这个地方在唐代有着它的神秘地位，至少今天的粗陋工作，尚无法去发现它，解释它。

第三节 凯掌唐墓

凯掌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凯掌村，墓群所处区域为喀斯特地貌发育区，属乌江水系，区域内整体地势较为平坦，以缓坡丘陵为主。

2022 年 4 月至 6 月，受贵州贵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科技新城新校区建设用地开展了考古调查勘探工作。7 月至 11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项目建设范围内的凯掌墓群进行了发掘，并取得了重要收获。

田野发掘工作遵循由晚及早、自上而下逐层揭露清理的原则，辅以平剖面相结合和解剖式发掘的方法以判断地层和控制发掘深度。依据土质、土色、包含物及参考其他相关现象区分地层堆积，完整把握遗迹单位的边界形态。对墓葬进行发掘时首先确定墓口开口层位与平面范围，其后按葬具、骨架、随葬品、墓底和解剖墓的结构的顺序进行清理，最后要对墓葬发掘记录进行整理与编写，重要遗迹使用二分法或四分法的方式进行坑内堆积清理。清理过程中把握和记



录坑内堆积层次的变化，观察坑内堆积与坑外堆积的区分，仔细地找边与找底。在各类遗迹发掘完毕后，进行编号、文字记录、绘图、测绘、照相（航拍）、摄像、三维建模，编写探方记录、小件登记表和各种遗迹记录。田野作业中，每个遗迹指定专人负责，工作人员相互间时常进行堆积单位和遗迹现象的研判。

考古队员们对发掘过程进行详细记录，具体而言包括工地日记、探方发掘日记、发掘记录及记录表、遗迹编号记录、遗迹登记表；遗迹平、剖面图，细部结构图；影像、绘图；遗物及样品采集记录；各类其他形式的相关记录。逐日更新探方发掘日记、工地总日记、探方出土小件登记表、出土器物 and 现场工作照片、数码照片登记表等。一天的工作结束，或一项清理工作结束后，立即完成相关记录。单个遗迹清理结束后，及时完成遗迹平剖面图、遗迹出土小件登记表；发掘结束时，立即填写遗迹发掘登记表、遗迹发掘记录，确保资料的完整与准确。

注重出土文物的保护工作，在考古人员驻地设置临时文物库房，由专人负责保管库房钥匙，进出库房必须登记。同时安装 24 小时监控设备，全天候监控库房状态。凯掌墓群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种类有陶、瓷、银、铜、铁等不同质地。由于在墓葬中保存情况不同，出土情况各异。对于出土陶瓷器安排专人进行修复，脆弱的铁器则套箱回到室内进行清理保护。



M1—M15 航拍图

经过清理，共发现南朝至隋唐墓葬 43 座，明清时期灰坑 12 个、沟 1 条。出土陶、瓷、铜、铁质的文物 280 余件。由于后期破坏，凯掌墓群地层堆积十分简单，遗迹大多开口于现代耕土层下。

凯掌墓群发现的 43 座墓葬均为石室墓，主要集中分布于茶叶地和干塘坡区域。根据墓葬形制结构，结合出土器物特征分析，推断凯掌墓群墓葬年代可分为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据平面形制可分为长方形、“凸”字形、刀把形三类，以长方形为主。墓室采用大小不等、一面加工平整的石块砌筑而成，内壁较为规整，外壁参差不齐。墓室顶部多有券顶，由于后期破坏，仅部分墓葬残存。部分墓葬发现有排水沟。由于墓葬被盗较严重，出土遗物较少，以陶器最为丰富，典型器物包括四系罐、夹砂陶釜，另有少量的铜手镯、铜指环。南朝墓葬主要采用薄青石块砌筑，出土有泥质和夹细砂的四系罐。隋唐时期墓葬主要用表面有粉末的石灰岩砌筑，出土陶罐均为夹粗砂陶质，封门垒砌不太规整。

隋唐墓 38 座，均为单室墓。包含 11 座平面呈“凸”字形的带墓道墓葬和 25 座平面呈长方形的不带墓道墓葬，另有 2 座平面呈刀把形墓葬。墓室主要采用石灰岩石块砌筑而成，封门砌筑不太规整，整体略向墓室外凸出。出土器物较少，可见烧制火候较低的夹砂罐、釜等。此外，墓葬中出土较多铁质棺钉。

“凸”字形的带墓道墓葬包括 M19、M15、M40 等。M19 全长 7.7 米，墓圻长 3.1 米、宽 1.24 米、深 0.59 米。该墓被发现时北部部分券顶被破坏，墓室顶部结构尚存，券顶由大小不一的青石块和石灰岩石块南北向竖砌而成，券顶北部少部分被破坏，现存券顶最高处为 0.6 米。排水沟叠压于墓道中部之下，至墓道尽头处向西南方向转折延伸，总长 4.7 米，底部略呈坡状，北高南低。墓内共发现随葬品 2 件，均为陶罐，保存较差。M15 全长 5.52 米，墓圻长 4.34 米、宽 1.46 米、深 0.48 米。墓道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封门南部。出土少量夹砂陶罐残片。M40 全长 3.52 米，墓圻长 3 米、宽 1.34 米、深 0.24 米。墓道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封门南部。出土 2 件（套）夹砂陶罐，烧制火候较低，出土时已成碎片。



长方形的不带墓道墓葬包括M33、M32、M4等。M33全长3.4米，宽1.2米，深0.66米。该墓发现时券顶基本完好，券顶由大小不一的石块竖砌而成，多数为青石块（石质较硬），也夹杂有少量表面有粉色粉末的石灰岩石块（石质较脆）。中脊石块呈东西向竖砌，后再沿中脊向两侧将石块呈南北向竖砌，



○
M33 清理前照片



○
M33 清理后照片



○
M33 出土遗物

使券顶整体呈“龟背”状。封门位于墓室南部，自墓底向上逐层堆砌，朝墓室内部一侧未经过修整，石块整体由下层至上层逐渐向南凸出。墓内共发现随葬品6件，其中四系陶罐2件，陶釜1件，铜器1件，铜手镯2件。

M32 全长4.14米。墓圹长3.55、宽1.28米、深0.78米。券顶保存基本完好，墓室顶部结构尚存，因墓内木棺腐朽，部分券顶塌陷，券顶整体呈“龟背”状。经解剖封门后发现排水沟，位于墓室南部封门之下。沟北侧在底部铺有石块，截面呈“U”字形。墓内共发现随葬品4件，其中陶罐2件，银饰2件，保存较差，无法辨认器形。M4 全长3.66米，宽1.24米，深0.54米。封门砌筑不太规整，整体略向墓室外凸出。出土有夹砂陶罐碎片。

马场一带是贵州目前发现魏晋南北朝至唐时期墓葬最集中最丰富的地区，对这批墓葬进行保护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丰富了贵州魏晋南北朝考古的内涵，



以石室墓为主的特征，丰富了魏晋南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墓葬形制和部分随葬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可能与当地的民族构成有关。通过分析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可以发现南朝和隋唐时期墓葬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同时也展现了不同时期的墓葬特征，对于研究魏晋南朝至唐朝时期当地的民族及其文化状况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章 多元一体

从秦汉时期即开始的羁縻之治在边疆地区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到隋唐时期，逐渐发展成一种管理制度——羁縻州制度。特别是随着两晋南朝时期中央对西南边疆管理力量的减弱，助长了地方家族势力的发展，为以后的地方羁縻家族首领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为羁縻制度的成熟提供了土壤。这一特征在贵州宋元明时期考古遗存中特别明显。

黔中地区也是该时期遗存发现的一个重点区域，遗存类型以墓葬为主，出土器物包括陶器、瓷器、青铜器、金银玉器、纺织品等，生动体现了中央对边疆管理的羁縻·土司制度、军屯民屯与族群的社会生活、突出的民族文化元素以及文化的交流交融和多样性特征。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是最典型的代表。大松山墓群坟坝顶区域是一处公共大墓地，这一格局从宋代开始出现，从两晋南朝隋唐时期家族墓地到宋元明时期公共大墓地格局的转变，或可说明羁縻·土司制管理为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松弛有度的空间，体现出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宽松和族群文化的彰显。大松山墓群出土文物数量众多，有4000多件（套）。文物主要分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两类。这些数量众多、类型丰富、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器物，或本地生产，或来自外地甚至域外，按一定的组合方式随墓主安葬或摆放于墓室的前后两端，或置于棺内，或随身穿戴，在体现了一定丧葬仪式和丧葬习俗的同时，也反映了“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也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客观写照，记录了当时黔中地区居民富足、安宁、祥和的生活。大松山墓群突出的地域族群文化特征，



在宋元明时期出土器物上有突出体现，根据所体现的文化元素和古DNA等信息，推测其族属有可能是苗族。

而以黔中地区为核心的广大地区，还流行一种苗、瑶民族使用的丧葬形式——洞葬，最早或可追溯至唐代，明清时期最为丰富，部分地方现在仍在延续使用。以平坝棺材洞规模最大，洞内容纳有数百具棺木，系附近刘姓苗族使用，出土有蜡染百褶裙等服饰和生活用品等器物，但除生活用品外，其装饰品的文化面貌与大松山墓群有着不同风格。此外，在纳雍百兴发现的一批明清时期石板墓中出土了衣扣、耳环、插针、抹额、衣片等银质饰件，有着独特的浓郁土著特征。这种石板墓系用薄石板砌筑墓室，墓葬规模小，主要分布在黔中、黔西和黔西南地区，最早可追溯到汉代，是该区域自有的石板墓传统，出土器物体现出不同区域和不同族群的文化特征，但汉文化元素一直贯穿始终，既体现出族群文化的个性，也体现出汉文化元素的共性，体现了区域之间、汉夷之间、族群之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明初中央对贵州治理方式仍以土司制度为主。至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了更好地防御云南边疆，从湖南至贵州开一线以通云南，实行“调北征南”，后又相继有“调北填南”“移民就宽乡”等政策，大军多次移民至此，留下了丰富的屯堡文化遗产。通过对屯堡及相关遗存展开考古调查，厘清屯堡及相关文化遗存的整体构成，对屯堡历史进行立体考察和贵州文化多样性进行阐释，探析明代中央对贵州的开发历程，归纳明清贵州发展模式，为中国一体化进程和对边疆管理的研究提供了生动案例。

第一节 清镇宋墓

贵州早年进行水利工程建设时，发现了很多历朝历代的古墓葬，猫跳河水利工程的尹关、琊陇坝、芦荻哨、下山口、余家龙潭、新新桥、冷坝、牧马场、土门寨等地清理了汉至宋代墓葬 140 余座，其中宋代墓葬 91 座，均为土坑墓。这些墓葬分布于羊昌河两岸，大多位于平原或一些小丘的边沿上。

清镇宋墓数量较多，多成群分布。从发掘者的报告中可知，较多墓葬中没有随葬器物，只发现铁棺钉，整个墓地中出土的随葬品不多，但这批墓葬的年代应该是宋代无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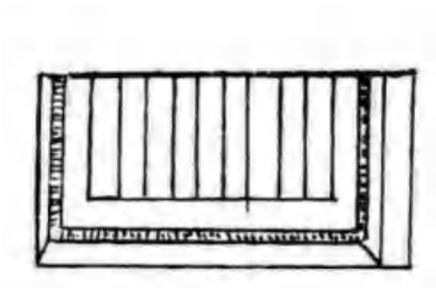
墓穴均为长方形竖穴，墓内填土为黑灰色，一般 30 ~ 50 厘米即见底，唯有封土堆极大，高 6 ~ 11 米。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很多人骨，其头向均朝着墓门，这就是这批墓葬比较特殊的地方了。在目前已经发掘的大松山墓群中，从可见的少量人骨和饰品推测，唐代墓葬的头部应该是朝向墓门的，但在宋代墓葬中还没有发现头朝向墓门方向的。再从清镇宋墓的随葬品中观察，整个清镇宋墓出土有夹砂陶釜、陶项饰、陶珠，银项圈、银手镯，铜项圈、铜手镯、铜铃、铜指环、铜片，铁指环、刀、剑、镖枪、鼎、双耳铁锅、铁三脚架、铁四脚架，大小骨珠，钱币。其中夹砂陶釜较小，质地粗疏，同大松山墓群出土陶釜类似，而陶项饰、陶珠则未见于大松山墓群。因大松山墓群未出土铁兵器，铁刀、剑、镖枪没有对比材料。但大松山墓群出土了 10 余件双耳铁锅，出土双耳铁锅的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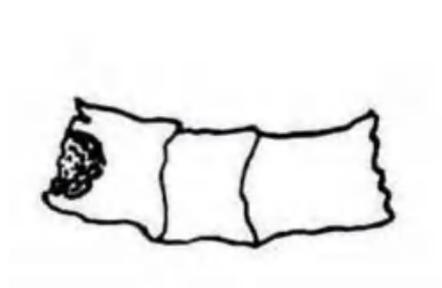
葬年代均在宋代。铁鼎则同大松山墓群出土的唐代铁鍩相同，在大松山墓群的几个宋代墓葬中也出土了铁鍩，推测是因为铁器炊具在当时比较珍贵，使用者将该器物从唐代沿用至宋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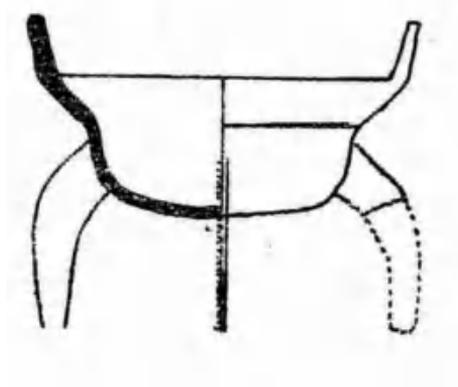
清镇宋墓出土的扭丝银项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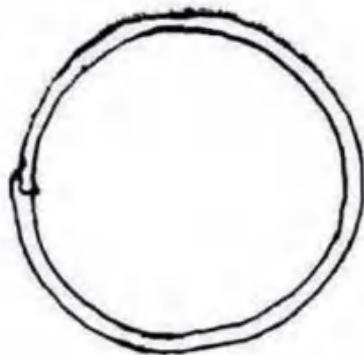
清镇宋墓出土的宽边银手镯



清镇宋墓出土的陶项饰



清镇宋墓出土的铁铛



清镇宋墓出土的铜项圈

清镇发现的这批宋代墓葬，虽然发掘时间极早，出土器物相对贫瘠，但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同干河坝石棺葬相比年代应该更早，代表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另一个类型，符合考古队员们所说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少数民族居住生活方式。而墓葬中的出土器物，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考古队员们对大松山墓群中一些墓葬年代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第二节 干河坝石棺葬

干河坝石棺葬是贵州“文化大革命”期间发掘的一处民族墓地，它位于清镇市西约5千米的地方，地处当时的滇黔公路干线的北侧。现在的清镇市红枫湖镇中八村北3千米处，原有一个圆弧形的大土堆，土堆东西长56米，南北宽



约 48 米，因为土丘上分布着很多的古墓葬，有一些已经露出了石块，因此当地人称呼它为“古坟坝”，也是墓地发掘的主要区域。小丘的西北侧有一条季节性的河流，就是“干河坝”名称的来源。而地形较高的小丘，远离水源的影响，也成为古人墓葬的风水宝地。当无人打扰的它们静静地在这里矗立了 800 余年后，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清镇洗涤剂厂基建施工需要使用这块土地，因此，在 1972 年 4 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对它们进行了考古发掘。

干河坝石棺葬墓群一共发掘了 84 座墓葬。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 20 世纪 70 年代，没有条件像现在的考古队员们一样去做出土容器的残留物分析、人骨 DNA、金属成分等方面的研究，只能从墓葬的形制、墓内随葬器物等方面去做对比研究，得出初步的判断结果。从墓葬形制看，绝大多数墓葬为长方形石室墓，仅有刀形石室墓 1 座。有空墓 45 座，仅 39 座墓出土有随葬器物，未发现棺木痕迹。根据能推测出葬式的 28 座墓推测，这批墓葬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因此，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埋葬时没有使用葬具（棺木），而是使用石板或者石材作为棺木。按照古籍的记载，在安顺、清镇有一种少数民族，死后用石棺，据此就称这种墓葬形式为石棺葬。干河坝所有墓葬分布范围井然有序，北面最密，西北部、中部次之，南面最少，虽然有一些墓葬已经露出石块，但依然有封土存在。故虽每个墓葬封土高低不一，但未有相互打破现象，发掘者以此认为这是一处一直延续使用的民族墓地。

早年考古发掘中，属于同一个县级区域的古墓葬，其编号需要延续之前的编号往后开始编号，因为之前几次在清镇发掘过一批古墓葬，干河坝石棺葬的编号也从清 M142 开始。现在通过考古资料来看干河坝这批墓葬时，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从墓葬形制来看，可以分为 4 种形制，其中 I 型墓主要为生土底墓葬，即墓葬底部直接使用生土，未垫有石头。而 II 型墓葬则是墓底使用有石片垫底，没有直接将死者放置于生土面上（如果是没有葬具就只能直接将死者放置于墓内）。III 型墓葬则是唯一的刀形石板墓。IV 型则是唯一的一座石板侧立的墓葬。从考古队员们现在在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发掘情况来看，这

样的墓葬分期方式不太妥当，大松山墓群中的宋代墓葬的长度一般在5米左右，而明代墓葬长度则一般在2~3米，元代墓葬因为数量不多，暂不能具体分析。干河坝石棺葬墓地将墓葬长度因素抛弃，单纯从墓葬形状来讨论，有可能混合了多个时代的墓葬，如其Ⅱ型墓葬中的M214长5.6米，而M151则只有2.6米。另外在大松山墓地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板侧立墓葬，但从出土器物、墓葬位置、墓葬年代来看，同平铺石板的墓葬也没有什么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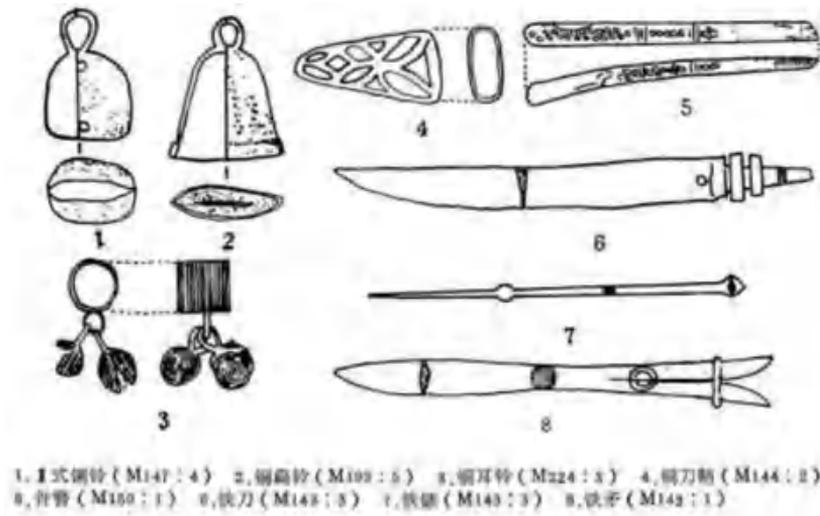
为验证干河坝石棺葬墓地所谓的不使用葬具、直接使用石棺的说法，发掘者通过《清镇平坝宋墓》《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凉山州昭觉县石板墓发掘简报》《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多篇文章中提到的关于在川西岷江上游的茂汶、汶川、理县和凉山州以及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一些石棺葬，并以此来论证干河坝石棺葬墓群使用“石棺葬”名称的原因，文章也提到这是“贵州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晚期石棺葬”，也有“只要能够确认这类墓葬具有不用棺木，以石室代棺的明显特点，便可称之为石棺葬”的提法。而考古队员们近年在大松山墓群和相邻的大林头墓群及不远的谢家寨墓群，发掘墓葬近2700座，时代跨度从两晋至明清，大量的墓葬形制类似于干河坝石棺葬墓群，但在墓葬中却大量地发现棺木残片、板灰痕迹，证实是有棺木存在的。当年定义的“干河坝石棺葬”中，其实也是有着葬具使用的，如清M144，随葬器物除了铜戒指1件和铜刀鞘饰1件外，还有铁棺钉5枚和铁扣子1件。如果没有葬具，那铁棺钉拿来钉什么。而清M149，随葬器物除有铜簧饰2件和小料珠1串以外，还有铁抓钉1件。从大松山坟坝顶墓区宋代墓葬部分出土器物看，抓钉也是固定棺木用的工具。2014年发现的遵义新蒲土司墓地南宋杨价夫妇合葬墓中，就使用金、银、铜抓钉来固定葬具。因此，可见该墓群中间有部分墓葬出土了与葬具有关的工具，直接无葬具埋葬死者的想法不甚可靠。

从发掘者的描述中可知，干河坝石棺葬墓地墓葬均有封土存在，也没有发现盗洞的记录，意味着这批墓葬没有被盗的迹象，从这批先民被埋葬下去最早的宋代开始，整个埋葬活动经历了元、明时代，没有埋葬行为之后一直到现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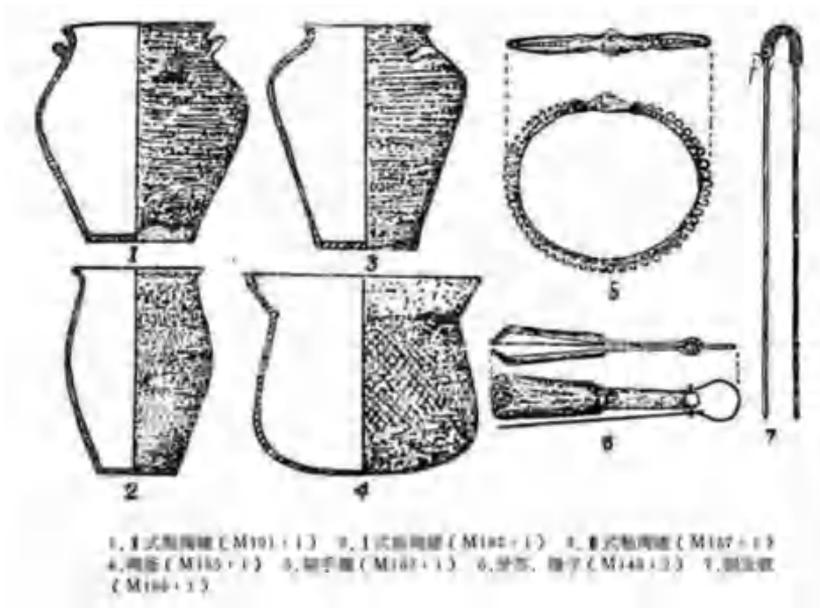


都是属于原生的状态，没有被人为地扰动过，所以整个墓葬的状态是贴近当时这群人的生活状态的。但并不是每一个古人都有着丰富的生产生活，作为经济活动更不发达的宋代、元代、明代来说，贫富差距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通过发掘简报可知，当时一共发掘了 84 座墓葬，其中有随葬器物的仅有 39 座，可知当时有较多的人生活条件并不好，以至于陪同死者在地下王国生存的随葬器物都没有，53% 的人属于赤贫的状态。而清 M157、清 M170、清 M175、清 M183、清 M185、清 M191、清 M192、清 M217 的随葬器物只有 1 件釉陶罐（应该是酱釉瓷罐）。而清 M190 的随葬器物则只有陶釜 1 件。清 M160 的随葬器物仅有铜股簪饰 1 件。清 M151 和清 M207 的随葬器物都只有铜发钗 1 件。清 M146 的随葬器物仅有铜簪饰 1 件。清 M187 的随葬器物仅有钱币 8 枚。清 M200 的随葬器物仅有小料珠 1 串。可见这些墓主人的生活水平也就略高于普通水平而已。另外还有清 M145 的随葬器物仅有铜簪饰 7 件。清 M149 的随葬器物有铜簪饰 2 件，铁抓钉 1 件，小料珠 1 串。清 M162 的随葬器物有铜簪饰 2 件，铜手镯 1 件。清 M164 的随葬器物有铜簪 1 件、铜簪饰 4 件、小铜簪饰 1 件（位于小料珠串内），大料珠 2 颗。清 M172 的随葬器物有釉陶罐 1 件，铜发钗 1 件，锡鱼 1 件、锡压胜钱 3 件，大料珠 2 颗。清 M180 的随葬器物有铜簪形饰 1 件，小料珠 1 串。清 M196 的随葬器物有铜发钗 2 件、铜簪饰 2 件，银边木梳 1 件。清 M199 的随葬器物有铜簪形耳铃 2 件、铜扁铃 1 件，料珠 4 颗，钱币 1 枚。清 M201 的随葬器物有铜簪饰 1 件、铜簪形耳铃 1 件、铜管状耳饰 2 件，料珠 6 颗。清 M202 的随葬器物有铜簪饰 1 件、铜发钗 1 件。清 M218 的随葬器物有铜管饰 1 件、铜铃 1 件。清 M219 的随葬器物有铜跳脱 2 件，钱币 1 枚。清 M220 的随葬器物有铜簪饰 1 件，钱币 53 枚。这批人，或许就是当时族群中的中产阶级。

剩下的 7 座墓葬，从它们墓葬随葬器物的多寡大致能推断出来，墓主人很



千河坝石棺葬墓群出土器物一



千河坝石棺葬墓群出土器物二



有可能就是当时当地地位最高的一批人。如清 M147 的随葬器物有铜发钗 2 件、铜簧形耳铃 1 件、铜管饰 1 件、铜簧饰 16 件、铜跳脱 2 件，银边木梳 1 件，料饰 6 件、小料珠 1 串。清 M148 的随葬器物有铜发钗 1 件、铜簧饰 12 件、铜跳脱 3 件、铜铃 7 件。清 M159 的随葬器物有铜印 1 件、铜簧饰 2 件、铜圈铃 2 件、铜跳脱 1 件，骨簪 1 件，料珠 1 颗，钱币 1 枚。清 M161 的随葬器物有铜发钗 1 件、铜簧饰 1 件、铜跳脱 1 件、铜圈铃 2 件、铜管饰 2 件，料珠 1 颗，钱币 1 枚。清 M205 的随葬器物有铜簧饰 2 件，锡鱼 4 件、锡压胜钱 1 件、锡水泡 4 件，料珠 10 颗，锡边木梳 1 件。清 M214 的随葬器物则有铁刀 1 件、铁镞 1 件，铜发钗 1 件、铜簧饰 17 件、铜管饰 17 件、铜铃 8 件、铜跳脱 2 件。清 M224 的随葬器物有铜发钗 1 件、铜簧形耳铃 1 件、铜簧饰 14 件、铜管饰 2 件、铜跳脱 1 件、铜铃 1 件、铜戒指 1 件，料珠 4 串、大料珠 4 颗，钱币 1 枚。这些处于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生活条件的人，他们的头向都向着墓地的中心，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圆丘上，这很有可能是一处延续数百年的少数民族墓地。

干河坝石棺葬墓地的族群男女比例如何？在古代社会中，男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如耕种、打猎，而女性则多从事采集、纺织类消耗体力较少的工作。虽然墓地出土了较多的人类遗骸，但那个时代是没有条件通过人骨取样分析其性别的，因此，只能从干河坝石棺葬墓群出土随葬器物来判断遗骸性别。清 M142 的随葬器物有铁刀 1 件，料珠 1 颗，刀 1 件。清 M143 的随葬器物有铜镞 1 件、铜镊子 1 件、铜牙签 1 件，铁矛 1 件。清 M144 的随葬器物中虽然没有刀、矛，但其中有铜刀鞘饰 1 件，有可能存在兵器。这些持有兵器的墓主人，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男性。但是最后的清 M214 情况相对特殊，它的随葬器物有铁刀 1 件、铁镞 1 件，另外还有铜发钗 1 件、铜簧饰 17 件、铜管饰 17 件、铜铃 8 件、铜跳脱 2 件。除了兵器外，还有大量的饰品，甚至随葬器物数量在整个干河坝石棺葬墓群中也是名列前茅的。2022 年发掘大松山墓群时距干河坝石棺葬墓地的发掘时间已经 50 年了，把出土有人骨和铜钗的墓葬送去测定男女性别的结果是，只要出土铜发钗的墓葬都是女性，所以可以推测，当时墓葬中



干河坝 M164 的出土的梅花形料珠（北宋晚期）



坟坝顶 M174 出土的锡饰片（明）

出土铜簧饰、铜簧形耳铃、料珠的墓葬不敢确定，但出土有铜发钗的，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女性。故考古队员们认为清 M214 的墓主，虽然随葬有铁兵器，但也应该是一位女性，而她本人在当时的族群中应该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从干河坝石棺葬墓地的随葬器物可以看出，女性的地位应该是凌驾于男性之上的，随葬最丰富的 7 座墓葬中，女性的墓葬至少占了 5 座，清 M205 还不能从随葬品中完全确定其性别。因此，居住在干河坝附近的这一民族很有可能是由女性来主导的。

干河坝石棺葬墓群的族属，发掘者认为可能属于仡佬族墓葬。墓群的年代，除没有出土随葬遗物的墓葬无法确定外，出了八思巴文铜印的清 M159 被确定为元代墓葬，出土有洪武通宝背浙的清 M187 被确定为明初墓葬，其余 M142、M157、M160、M164、M170、M172、M175、M180、M183、M185、M190、M196、M199、M203、M205、M207、M214、M217、M224 这 19 座墓葬的年代为北宋。目前从干河坝石棺葬墓葬发掘简报后面的图版可知，除 I 式釉陶罐材质不明，但器身纹饰可能是较早的器物外，其他几式釉陶罐应该是酱釉双系瓷罐，其年代应在明代。M143:2 的铜牙签和铜



镊子同民国时期老照片上屯堡老年女性胸前所佩戴的“压襟”类似，在坟坝顶墓群中的明代墓葬中也出土有几个。M172 出土的锡压胜钱和锡鱼，在坟坝顶 M21、M88、M100、M174 等多个墓葬中都有出土，且所谓锡压胜钱应该是锡饰片中间的钱形纹饰残损部分，并非压胜钱。锡饰品本身出现较早，在威宁中水银子坛的战国墓中即有发现，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中则在唐代和元明时期

○
坟坝顶 M21 出土
的锡花（明）



○
坟坝顶 M100 出
土的圆形镂空锡
饰品（明）





○
坟坝顶 M88 出土的三角形锡饰片（明）



○
坟坝顶 M88 出土的双鱼锡饰品（明）



墓葬中所见较多，宋墓中似乎暂无发现。墓葬中出土的钱币，可以确定墓葬的上限，但对于墓葬的下限无法确定。2022年在贵安新区马场镇发掘的坟坝顶墓群的很多墓葬中，随葬的钱币年代远远早于墓葬年代，故对于干河坝墓群的年代判断应当结合墓葬出土遗物、墓葬形制进行判断。干河坝墓群应该始于宋代，经元代至明，其中有部分出土北宋钱币的墓葬的年代应属于明代，它的明代墓葬的数量应远远大于报告中的数量。

干河坝石棺葬墓地作为贵州发掘较早的一个少数民族墓地，地处水东宋氏土司辖地内，能够反映或部分反映出水东人民当时的真实生活。墓地中出土的大量不同时期的古钱币，说明当时本地也不是完全处于封闭状态，而是同外界还有着一定的经济交流，八思巴文铜印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从墓葬中出土的铜发钗、铜手镯、铜铃、铜簧形饰、铜管状饰、铜耳铃、料珠等各类装饰品来看，说明他们是一个爱美的民族，也有自己的审美情趣。从随葬物的多寡也能判断在族群中女性地位较高，有能力置办一定的装饰品。M143:2的“压襟”铜牙签和铜镊子与M159出土的骨簪(应该是骨质牙刷部件)这类个人卫生清理设备，说明在当时已经很重视个人卫生的清洁工作了。总之，干河坝石棺葬墓地发掘于50余年前，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遗物进行了有效保护，虽然对于墓葬年代的判定、墓葬性质的判定有着一定的错误，但是，终是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让考古队员们在今天能够对当时当地存在的先民有一定的了解。

第三节 大松山墓群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就在马场的坟坝脚清理过几座宋明墓葬，相比东晋南朝墓出土的器物，宋代墓葬出土的就很寒酸了，因此也没有更多付诸笔墨，仅在《贵州平坝县马场唐宋墓》中对 M60、M62、M65 三座宋墓进行介绍，但从文章中列出的出土器物线图来看，这些墓葬的具体年代还有所存疑。

2013 年，为配合贵安新区的一系列建设，省考古所在贵安新区进行了细致的考古调查工作，也没有什么吸引眼球的大发现。2014 年，配合贵安新区安康大道的建设工作时，考古队员在对杨家桥附近的几座魏晋墓葬进行清理时，征集到一件明墓出土的玉器，非常漂亮，让人对马场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大有遐想。

2021 年底，省委省政府决定在贵安新区马场镇及花溪区启动 4 所大学的新校区建设项目，其中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面积最大，有 3228 亩之多，它把



2014 年马场发掘时征集到的明代玉器



1965 年建设的大松山水库整体包了进来，因为大松山六朝墓群这一文物保护单位就在建设用地的范围内，省考古所从最开始就知道这一区域会有数量惊人的墓葬存在，但是否有遗址存在则不清楚。省考古所考虑先进行考古勘探，于是从 2022 年 1 月初开始，考古队就从工地的东北侧开始钻探，初期没有什么收获。2 月份，在工地的西南侧发现了数量不菲的石板墓，甚至在田坎的断面上都有发现。但是和发现相对的，就是钻探的速度远远不够工程进度的需要。为尽快完成勘探工作，支持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考古队联合河南省专业的钻探公司，扩大钻探的队伍。之后在洋沟土、四川坟、小团坡、马坡、张家坟等地就发现了大批的石室墓。4 月初的时候，在对最后的几块土地进行钻探时，发现了坟坝顶墓群，当时确定的是这片区域有着 230 余座墓葬。省考古所的考古队员们站在 001 县道上，总觉得有点玄幻，毕竟除了 2000 年在赫章可乐发掘时发现过密集分布的墓葬，贵州其他地区还从未发现过。

大松山发现了数量这么惊人的两晋至明代墓群，省考古所的第一反应是激动，第二反应则是为难，毕竟省考古所力量有限，完成这样的任务基本是不现实的。于是省考古所首先计划在网上招募一批有过考古发掘经验的考古专业或文博专业的学生，通过暑期突击完成发掘工作。但是因为合同和经费的原因，暑期开始了，工地开工还遥遥无期，所里只能改变工作思路，希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这 3 家单位一起组成考古联合体共同对大松山墓群进行发掘，而这也成为考古所之后实行的方案。计划赶不上变化，2022 年 7 月初，为不耽误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工期，考古队必须先期进入工地进行发掘。

7 月 13 日，按照所里的安排，考古队先期进入大松山墓地进行发掘。这一项目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4 家单位组成考古联合体进行发掘的，参与工作的人数也是贵州省考古发掘工作参与人员数量最多的，为了纪念这一重要的时刻，于是就选择了墓葬密度最大，但交通最为方便的 79 号墓区拍摄开工



大松山墓群开工合影

合影。

从考古学科肇始以来，考古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早年的考古工作依靠手铲、探铲、毛刷、竹签、锄头、撮箕来进行刮面和发掘，用照相机来拍摄发掘现场，用小平板来测绘和绘制探方图，用人工来绘制墓葬图或者遗迹图。但现在的考古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发掘依然只能依靠人工来操作，但毕竟可以使用大量的翻斗车来运送泥土。测量也能使用 RTK（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测点，远比人工更为精确。照相机辅助细部的拍摄，大规模的现场则可以使用无人机来进行。后来发掘的时候，因为大多数墓葬都是石板墓，绘图就成了抑制考古队员发掘速度的最大问题，即使把所里专业绘图人员都派到了工地现场，绘制石室墓葬图的速度还是赶不上发掘出土的速度。后来从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借来专门绘图的专业老师使用的一款软件，可以



直接扫描墓葬图到室内电脑上绘制，考古发掘队员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使用 3DScanner（一款 3D 模型扫描软件）扫描石室墓生成三维墓葬图，才解决了绘图慢的问题。

经历了 10 余天的铲草、布方、刮面，实际工作中发现这一区域的墓葬的确很多，100 平方米的一个大方内分布着 10 余座墓葬，但墓葬都很小，墓葬被破坏的情况也很不容乐观。刮面的过程中不时地能刮出随葬器物来，根据刮出的青白瓷罐粗推断这些墓葬的年限不会早于宋代。在 8 月初的时候，除了还在刮面的坟坝顶墓区外，大部分工地传来的都不是好消息，虽然墓葬都在，而且长长大大的，但是十室九空，大小不一的盗洞在宣告考古工作的贫瘠收获。面对着所里传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大松山墓群的坟坝顶墓区也开始了对墓葬的清理工作。

发掘者们选择靠近山脚的一侧进行清理，小山后清理的南朝墓葬被编号为坟坝顶 M1，这边就从 M2 开始进行发掘。彼时考古队员已在坟坝顶工作 20 余天了，在石室墓之间也已经发现了一些土坑墓了，清理时的 M2、M3、M4 都是土坑墓，在其中出土了青花碗和白瓷瓶，说明墓葬年代并不是初步认为的宋代，而是到了明清时期。而 M4 和 M6 中出土的漆器，则增加了考古工作的难度，为做好这批有机质文物的保护工作，对于出土的漆器只能先使用海绵喷水保湿的方法暂时保护，同时紧急联系荆州文保中心，请他们安排人员来贵州指导考古发掘队员们提取和保护。

初发掘的一个星期有喜有乐，当然也有着不解和疑惑。无论是石室墓还是土坑墓，没有随葬器物的墓葬数量还是很少的，但 M7 却很让人失望，它不仅是一座石室墓，顶部覆盖的石板也是完整无缺的，但未经盗掘的它没有出土一件随葬器物，只有少量的骨骼而已。当然，埋葬时墓主应该是有着衣物的，可惜近 600 年的岁月已经使它腐朽殆尽了，这让发掘队员们只能面对空荡荡的墓穴叹息。

未发掘前，或许是根据直觉，考古所的专家们一次性地就开始了 10 座墓葬

的发掘工作。坟坝顶墓区东侧墓群存在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而坟坝顶区域也应该有很多，但刮面过程中出土的石室墓远较正在黄山井、西瓜地等地点发掘的石室墓短小，而从部分石室墓中出土的残存的青白瓷瓷器又让发掘队员们作出这些墓葬不早于宋代的推论，M2 等墓葬中出土的青花瓷碗把墓群的下限拉到了明清时期，M32 中的出土器物则无限拉低了大家对整个墓群的年代判断。在整个 M32 中共出土了 7 件随葬器物，在墓室东壁下填土内发现碗底瓷片，在墓室东北角、西北角、东南角、西南角发现青瓷罐、夹砂陶釜、酱釉瓷罐和青白瓷罐各 1 件。这件青白瓷罐的出土让大家极为兴奋，它没有被墓葬压坏，也没有因为岁月而变得黯淡无光，美丽的釉水在阳光下反射着玻璃光泽，可惜，接下来在墓室中部出土的“万历通宝”则破坏了考古队员对它年龄的遐思，只能黯然地把它放到了明代。

仅仅 20 天左右的发掘就让考古驻地的临时库房变得拥挤了起来，因为北大、中大和川大的发掘队伍住在泰豪 E 时代的创客新时代宾馆里，没有放置文物的条件，所以他们发掘出土的文物也只能放置到大松山墓群的临时库房中。数百件文物的出土让考古队员们明白了坟坝顶墓区是一处文物富矿，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这批文物都是先民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创造的物质文化遗产，值得考古工作者去好好地研究它，保护它。考古队员们就如同小蚂蚁一样，每天孜孜不倦地往库房里搬各种文物。而其余区域的发掘队伍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面对着广袤的还没有刮面的坟坝顶墓区，只能将它们分割成不同的小块，分配给中大、川大和北大的发掘队伍来进行发掘，这片工地也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有二三十个专业人员和近 300 名民工在工地上忙碌，每天上下班时期的人流量都让人感到激动，不愧是贵州考古史上发掘规模最大的考古工地和一次性发掘面积最大的考古工地，也是贵州考古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考古工地。大量人力的投入也拓宽了大家的视野，在 1 号墓区（坟坝顶墓区 001 县道以东部分）和 79 号墓区，大量的石室墓、土坑墓被刮了出来，墓葬编号很快就达到了 700 多号，加上之前在其他区域发掘的墓葬，已经接近 1000 座，远远超出了当时考古钻



探的数量。

在墓葬的发掘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类遗骸。对于它们，早年发掘中基于对先民们的尊重，一般会采购一些骨灰罐之类的东西，将它们择地掩埋。而对于大松山墓群可能出现大量人类遗骸的信息，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学院很早就开始关注。2022年8月，首次提取部分人牙和肢骨进行DNA、同位素检测工作。在考古工作现场，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学院对考古发掘出的为数不多的遗骨进行拣选。人牙最好是要没有残碎的，能够有更大的可能性提取出DNA来，肢骨也是整节的比较好。为了提取更多的信息，他们还带了液氮来，将一些重要的提取物放入其中冷冻保存。

M69的发掘出土让考古队员们看到了坟坝顶墓区的另一面，墓里还残存有少量的棺木，垮塌时可能压碎了一个酱釉瓷罐，在清理掉那些碎片之后，在少量棺板灰痕上面静静地躺着一具已睡了600年的女性遗骸。她头上插着长长的铜发钗，发钗南侧的玻璃珠聚集成珠花的式样，发钗东侧则压着纹饰复杂的银梳背，小臂处佩戴着锡饰片、铜手镯，手臂则弯曲着放在腹部，在手指上还有不多的2枚戒指，大腿处还放置着她喜爱的铁剪刀和铁锥。这一墓葬的发现，完整地诠释了一个明代的少数民族妇女的形象，也带着大家走进那个时代。同时，北大发掘的一件器物也进入了考古队员的视线，它就是M208出土的银梳背，其实就是木梳或木篦子的银包边，只是M208中出土的这件梳背保存完好。为了观察和拍照，考古队员用少量的水将它清洗干净之后，可见它的主体由7个图案组成，分别为花和鸳鸯，工匠们有可能使用了模制和篆刻的方法。鸳鸯胸口的绒毛清晰可见，花瓣上也使用篆刻的细线来表示花朵的层叠。在主体图案之间，通过镂空或使用小联珠纹表现纹饰。整件器物极为精美，表现了那个时代工匠手艺的成熟，也让大家对坟坝顶墓群之后的发掘工作增加了许多的希望。



坟坝顶 M208 出土的银梳背（明）

10月份的考古工地还是一如既往地重复着清理工作，只是随着清理进度的加快，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内部由省考古所负责的西南角的清理工作基本临近结束。在对大松山墓群保护墙东侧的四五千平方米的范围大规模刮面后，发现了10余座隋唐时期的石室墓。而考古工地中划归中大发掘的坟坝顶墓区东侧区域也传来了好消息，中大在坡顶发现了一批同之前发掘的墓葬都不太一样的独特墓葬，它们长达5米，宽度在1米左右，没有之前在马坡和洋沟土、大茶山等地出土的墓葬那样窄，也没有券顶，而是使用平顶，多数墓葬内还有棺木的垫底石块，随葬器物有青瓷弦纹和波浪纹的罐子、造型优美的青瓷执壶、施半釉的青瓷碗，铁抓钉、铁三脚架、铁四脚架、双耳铁锅，还有大量的漆器，以及铜手镯、戒指，整个这种类型的墓葬没有出土青花的器物，且出土钱币年代均在宋代，说明这批墓葬的年代可能在宋代。

武大负责整个大松山考古发掘项目的监理工作，他们也在10月上旬来到了大松山墓地的发掘现场。在他们来之前，大松山墓群考古队队员们对于墓葬年代的研究主要基于墓内出土的钱币和瓷器，但钱币所确定的只是一个上限，即墓葬不早于某一年代，但墓葬内的钱币年代相对复杂，后人使用或收藏前代



青瓷执壶（宋）出土现场



宋代双耳铁锅出土现场

钱币的比比皆是。如 1983 年在毕节虎踞山发掘的虎踞山 M1，它作为一座砖室墓，因被盗，在墓葬中仅出土 1 件鎏金弩机望山，少量铜钱、铁钱，以及方格纹陶罐 1 件，铁钱锈蚀严重，发掘者依据墓葬中出土的剪轮五铢，将墓葬年代定为东汉。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期间，在整理虎踞山 M1 出土铁钱时，发现这批铁钱可以清理的应该最晚为南宋庆元通宝，故这座墓葬的年代应该晚到南宋。有以上例子，大家在大松山墓群发掘期间，并不敢仅仅通过钱币就判断墓葬的年代，还是需要同墓内伴出物进行比对，而很多墓葬除了瓷器、陶器外，没有钱币，对它们年代的判断更是完全没有头绪。还好作为考古监理的武大不仅仅要检查工程进度，还要检查考古队的工作方法和资料记录情况，并对整个发掘工作进行指导。有的专家对瓷器的研究非常厉害，他在看了坟坝顶出土瓷器后，辨识出一些唐代、宋代、元代的墓葬和出土器物，通过这些墓葬时代可以反推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

到 10 月下旬的时候，在工地上又出土了几件少见的文物。如在 M104 中出土的铜印章，呈青绿色。圆形，平台，拱形钮，钮有一圆孔，孔穿铜丝，印面呈圆形，有边栏，阴刻八芒星（八角几何形），且阴文篆刻有一个难以辨别的字符。这枚印章开了坟坝顶印章出土的先河，之后中大、北大、川大陆续出土了几枚印章，这些印章的时代有些是元代的商号合同章，也有明代的印章，是整个发掘工作中除了钱币之外唯一带有文字的器物了。

大松山墓群出土器物中，最漂亮的或许就是五颜六色的珠子了，发掘者们将其称为料珠，算是汉墓或者宋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器物吧！8 月份川大发掘的坟坝顶 M356 是一座土坑墓，规模不大，仅存墓底，人骨完全腐朽了，但是在墓室的东侧还残存了一块棺木底部，在它的上面，出土了圆珠 4 件、椭圆珠 1 件、六棱珠 1 件，铜戒指 1 件、铜环 2 件，银梳背 1 件，小串珠和串珠共 48 颗。观察这些随葬珠子，白色的圆珠可能是玉质的；而六棱珠透过灯光时是蓝莹莹的，不确定它是什么材质的；小串珠也是绿绿的，看着很是漂亮。因为材料原因，琉璃质的珠子多为蓝色或绿色。接着在坟坝顶 M21、M57 中出土的珠子



○
明代漆碗出土现场



○
青瓷罐（宋）出土现场



坟坝顶 M104 出土的铜印章印面

有黄色、白色、蓝色多种颜色及八棱形、黑色花瓣形多种形状，还有绞胎作品，考古队员们一度都以为是各类天然宝石。后面发掘坟坝顶 M356 时，在残存不大的棺板上，有着各色的珠子，铜戒指、铜手镯等出土遗物，考古队员们总觉得墓主人的身份不一样，认为自己掌握了一条区分坟坝顶墓区墓葬身份的方法。结果 10 月 25 日，川大几位专家对大松山墓群发掘出土的玻璃珠进行取样工作，对这些五颜六色的珠子进行观察后，很遗憾地告诉考古队员，除了早期南朝时期存在一定数量的玛瑙珠外，其余的都是玻璃珠，而鉴别它们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观察它们的气泡。

11 月，在山脚处又刮出了四五百座墓葬，虽然这些墓葬大多是土坑墓，而且都显得短小，但其中还是有不少已经暴露出随葬器物了。这些墓葬的年代也让考古队员们难以分辨，大多数墓葬存在复杂的打破关系，川大在刮面的时候就发现最多有 12 座墓葬之间存在打破关系，而考古学发掘要求按照“由上到下、由晚及早”的发掘顺序，因而正确地判断这些墓葬的年代早晚是一件很难的工作。

大松山墓葬发掘中出土了金、银、铜、铁类的金属文物，发掘过程中陆续出现的一些锡制的器物更引起了发掘者的关注。其实在贵州，锡制器物最早出现在威宁中水的银子坛战国墓地中，该墓地曾经出过一些锡环。干河坝石棺葬



中也出土了锡鱼和锡压胜钱等。在之前的发掘过程中，大松山墓群也发现过一些锡制品，可惜多已腐朽成渣，看不出曾经的形状。而 11 月份出土的这些锡制品保存还好，可见鱼形、叶片及牌饰和坠子。它们多有穿孔，同时伴出的还有一些玻璃珠，且总是出土在手腕或者手肘处，应该是作为手链一类的装饰品。

在考古工地的时间总在不经意间就飞逝而去，大多数工地加快了工作的进度，而一些之前没有出现的東西也扎堆地冒了出来。12 月 11 日下午，位于当地村民房屋北侧的 M1114，当时村民修建房屋地基时打破了墓葬的东侧面并接近底部，如再深入 3 ~ 4 厘米，就会破坏它下面的那件青花盘。更幸运的是，墓中还出土了一枚大中通宝折十钱，它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南京称吴王时铸行的钱币，时间在元至正二十一年至至正二十八年（1361—1368），和龙凤、天佑等一样，为元末起义军钱币。从这枚钱币判断，这件青花盘的年代应该是元末。

在大松山墓群的发掘过程中，女性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的青铜发簪，基本是



M1114 的元青花劝盞劝盘出土照片



坟坝顶 M1325 出土元的代青铜印章

女性墓主的标配。这些青铜发簪一般是青铜质，有青绿色铜锈，整簪细长，由单根铜条弯成，呈“U”形，圆头，簪尾圆钝，股间距稍大，横截面圆形，簪首用细铜丝缠绕加固，长度在20~40厘米。目前发现最长的一枚发簪有42厘米。对于这些发簪，关于它的佩戴方式，是直接插在头上，还是像牛角苗妇女一样，使用毛线缠出巨大的头饰来？因为有机质的文物在墓室中不好保存的原因，贵州考古工作中还没有出土过类似的装饰，所以无法确定是否有这种发饰。12月11日，在M732中出土的铜发簪簪首位置串了一串颜色各异的玻璃珠，通过它，考古队员们才可以确定，在这批女性生活的时代，至少是存在发簪尾部垂珠的装饰行为的。



——○
M732出土的
簪首坠珠

临近中旬，中大在刮面时新发现了几座封顶石没有被移动过的墓葬，这一一下子就引起了整个考古工地的关注。因为雨水冲刷和常年耕作的原因，之前发掘的墓葬基本都没有墓顶存在，这些还有墓顶存在的墓葬就显得珍贵了，它的发现发掘展现的是明代将逝者埋葬下去的真实场景。M1302就是其一，它是一座土坑竖穴单人石室木棺葬。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向。墓圻长4.16米，宽2.6米。墓室长2.9米，宽1.08米，深1.24米。墓室建造方法为石条交替叠压，



墙壁用石条进行简单修整，修砌至近墓口处采用毛石填充，使得墓口与顶部平齐契合。盖板采用6块石板平铺，以小石块或石条填缝。在其东壁设有供龕，供龕呈长方形，南北长74厘米，高20厘米，深36厘米。供龕内出土有漆器、动物蛋和雉类动物骨骼。墓室中发现白灰木棺痕迹。出土人骨架1具，保存较差，为仰身直肢，上身屈肢。右侧上肢骨抚于腹部，左侧已腐蚀无存。石室内平铺一层厚约3厘米的木炭，应该是起到防潮、防腐的作用。墓内发现17件随葬品，分别出土于供龕内、石室内和木棺内。石室内出土有陶釜、瓷罐、陶壶、铜饰、剪刀和马蹄形木器。木棺内出土有穿孔海贝、铜发钗、头饰、串珠、饰件和戒指。这座墓葬出土的后龕中存有鸡蛋，鸡类和漆器作为供死者食用或享用的祭祀用品，在整个墓地仅此一例，完整地表现了该时期的埋葬礼仪。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专家对大松山墓群发掘出土的各类珠饰材质、制作技术、产地等进行了检测、鉴定及分析后，基本知晓大松山墓群不同时代的墓葬都大量地出土各类玻璃制品，有白色、咖啡色、黄色、蓝色、红色、绿色及无色透明等多种颜色，以及圆形、桶形、纺锤形、花瓣形、弹簧形等多种形状。在南朝墓葬中，考古队员们看到的有从东南亚或者印度洋传过来的桶形珠，也有本地生产的玻璃珠，它们同天然的玛瑙珠组合成五颜六色的挂饰。元明时期有从西亚传过来的纺锤状的玻璃珠，山东淄博传过来的圆形玻璃珠，以及中国传统绞胎工艺生产的玻璃珠，还有少量雕成花瓣形状的琥珀，很多的戒指上也嵌饰着玻璃戒面，这些圆形、花瓣形状的玻璃珠，历数百年依旧光亮如新。这些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玻璃制品从另外一个层面反映了贵安新区马场镇当时的对外贸易和商业交往，作为黔中地区的腹心之地，汉晋唐宋之时由北向南的交通通道和元明清时由东向西的交通通道始终交会于该地。

大松山的考古发掘工作，创造了贵州考古史上许多的第一，它是贵州考古史上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面积最大的、贵州参与人数最多的、贵州考古一次性发掘墓葬数量最多的、贵州考古发掘一次性出土文物最多的、贵州考古发掘目前发现漆器最多的、贵州考古发掘年代跨度最大的考古发掘。这些

数据，或许在贵州很多年都无法被超越。

大松山墓群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为贵州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年代标尺，见证了汉晋至明代黔中地区社会文化中心逐渐转移至贵阳周边的进程，以及明代贵州建省前后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作为一处全国罕见的大型地方民族公共墓地，它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情况，展现了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是西南地区两晋至明清时期社会生活的最真实体现。

最为重要的是，该墓群是历史上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展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次重要考古发现。其在文化上既体现出地域文化传统的长久延续，同时兼有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域外等文化因素，是中央政府在贵州实行“土流并治”的成功范例，也是多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交往、交流、交融中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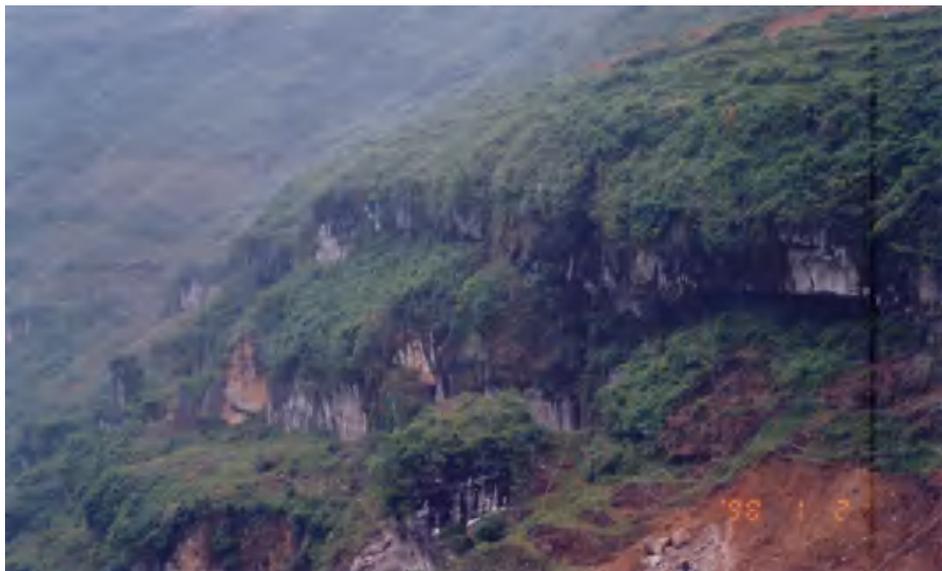
第四节 平寨岩洞葬

早年的考古发掘似乎都很匆忙，刚刚完成大花水水电站调查之后不久，在2004年的5—6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队员对其进行清理发掘。

大花水水电站开始发现的岩洞葬一共有3处，均位于清水江左岸。围坡田1号洞，是发掘的岩洞葬中面积最大的一个，洞口长20余米，宽10余米，高4米多，洞内北侧基本为基岩，没有发现任何人类遗物。而南侧则由于洞顶的岩石垮塌，有几块几百斤的大石块压在地面上，可以看到石块中间的泥土中夹杂有一些蓝绿色的料珠。由于仅有该处有着地层，发掘地点也只能选在这里。工人们撬开石块后，发现那个区域残存的面积并不大，仅能布4×4米的探方4



个（一般为 5×5 米），部分遗物和人骨分布在地表上和第一层黄褐色沙土内，第二层则应为洞顶垮塌的碎石和灰白色的沙土混合堆积，部分遗物也位于该层。从残存的棺板（仅存一小块）和地面的残骨及随葬器物可知，当时棺木应该是直接放置于洞穴南侧，垮塌后被洞顶的大石块压在了下面。考古队员们从这一现象推断，此处岩洞葬可能埋葬的个体有限，且沿用时间不长。果然，之后仅仅清理出少量人骨和近50颗人牙。此处岩洞葬出土的随葬器物也不多，只有3片陶片、1片釉陶片，3件残断锈蚀严重的铜手镯和1件无法辨识的铁器残片，蓝绿色不同的料珠（玻璃）50余颗（直径仅二三毫米），另外还有1根骨簪和1件骨制品、残碎的蚌壳制品1件（无法确认其具体形制）、猪蹄骨1件。从围坡田1号洞向南一侧的山壁上，还发现有不到1米高的几个小洞，在这些小洞中没有发现岩洞葬的任何痕迹。有意思的是在紧邻围坡田1号洞的小洞（考古发掘者命名为围坡田2号洞）洞口处发现有少量料珠，就不知道它是人为移



——○
围坡田洞远景

动还是因有另外的墓葬存在而形成的了。

幺罗寨洞则在围坡田洞南侧 1 千米处幺罗寨村民组后山断崖上，东侧为幺罗寨。考古队员在调查时询问当地村民，得知这个洞穴也没有具体的名字，就依据地名将其命名为幺罗寨洞。该处洞穴较小，长、宽仅 3 米，仅能容下一具棺木，可见棺木残片散布洞内各处，清理时也不用布方发掘地层，出土遗物均在地表且靠近于洞口处，仅发现人类头骨碎片 3 片，没有任何其他人类遗骸。随葬器物则出土有方格纹陶釜残片 70 余片，骨制品 1 件，料珠 300 余颗，另发现穿孔的海贝 1 枚。



——○
幺罗寨洞

在考古队发掘了几天后，村民们告诉大家在后山还有一个洞里也有岩洞葬，它就是仓口洞，位于平寨村顶驮村民组后山。这个洞长 8 米，宽 3.9 米，高 2.9 米，洞内面积较幺罗寨洞更大，因此可以容纳更多的个体。考虑它和其他洞穴可能



存在的关系，考古队还是决定把它也纳入清理发掘的范围内，可惜历史终是为时间所掩埋，除了2截人指骨外，棺木和人骨均已无存，只有洞内西南角地表处的随葬遗物告诉考古队员们它曾经作为岩洞葬墓地的存在。这个洞穴中的出土器物相对丰富，有50余片方格纹陶片，形制与幺罗寨洞出土陶片一致，且为圆底。还有9节大小不一的骨簪，1件骨制品和残铜指托，近400颗玻璃料珠，另有穿孔海贝100余枚。让考古队员们惊喜的是，还出土了5枚钱币，分别为景佑通宝、皇宋元宝、熙宁元宝，以及2枚洪武通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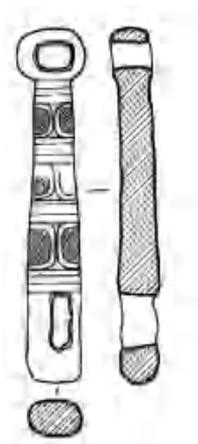
对于最后清理的观音洞，因为它位于幺罗寨东侧约200米处的一座孤峰半



观音洞出土人骨



出土骨簪线图



出土骨制品线图

腰处，上下均没有路可通上去，带路的小莫依靠攀岩树枝徒手进入了洞穴，记录洞内的遗物分布情况后，将洞内遗物全部采集。据他介绍：这些遗物均位于洞口地表，分布较为散乱，没有棺木，仅有人肢骨2截。随葬遗物有陶罐碎片40余片，纹饰均为绳纹，还出土残铜指托4截，骨簪2件、骨珠1颗，穿孔海贝2枚，玻璃料珠近200颗，还有宋代嘉祐通宝1枚。

这次发掘的4处岩洞葬，从其规模和出土遗物推测，它们埋葬的数量极其有限，不说与平坝棺材洞、惠水仙人洞这些大型岩洞葬相比，连中型也算不上，只能称之为微小型岩洞葬，其能埋葬的死者数量少，而且洞穴中已没有较好的



平寨岩洞葬出土的玻璃珠



平寨岩洞葬出土的穿孔海贝



平寨岩洞葬出土的骨簪



棺木残存，具体使用的葬具形制已无法确认，埋葬人数、葬式等也同样无法确定。出土的人类肢骨和牙齿，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去做人体 DNA 和其他人骨鉴定的意识。只能根据出土不多的随葬遗物，对其早晚关系和相对年代进行判断。

能够确认的是这批岩洞葬埋葬时均使用棺木，应为薄木板制成。棺木放置位置没有固定要求，一般放置于洞穴靠内处，贴近墙壁，直接放置于地面。随葬品种类少（因受到的破坏较大），一般均有穿孔海贝、料珠、骨簪、陶器碎片。这些随葬器物应为墓主日常生活使用物品，死后即随葬。这批岩洞葬，同平坝、花溪高坡等地的岩洞葬相比，埋葬死者数量少，使用洞穴面积也很小。最大的围坡田 1 号洞，面积近 200 平方米，通过对出土人骨（牙）进行分析，推测可能埋葬个体数量为 3 人，其中成年 2 人、小孩 1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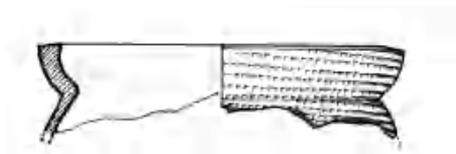
通过以上几点可知这几处岩洞葬可能为同一族属的岩洞葬，但年代上有一定差异。根据伴出的钱币，大致推测这些岩洞葬的年代应为宋明时期。由于观音洞仅出土 1 枚宋代钱币，且出土陶片纹饰为绳纹，年代上可能早于仓口洞。围坡田洞和幺罗寨洞虽未出任何文字纪年材料，但出土器物形制同仓口洞等相同，故其时代应相近。而这批岩洞葬中出土的陶片的纹饰和形制相似或接近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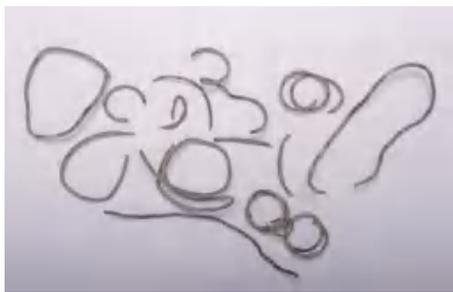
平寨岩洞葬出土的明代钱币



平寨岩洞葬出土的宋代钱币



平寨岩洞葬出土的陶器口沿复原图



平寨岩洞葬出土的铜跳脱残件

平坝棺材洞、干河坝石棺葬等宋明时期墓葬中所出陶器，其年代也应为宋明时期。

从历史沿革看，宋时开阳地属蛮州（为羁縻州）绍庆府，元代属乖西军民府，明清时期多属水东宋氏管辖区。宋明时，开阳多为边鄙羁縻之地或由土司管辖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仡佬族早年的埋葬方式为“悬棺葬”或“崖葬”。如《百苗图》中的“红仡佬”条：亲死，殓以棺而不葬。置岩穴中，或临大河，不施蔽盖，而傍树木为主，其名曰“家亲殿”。明《嘉靖贵州通志》卷三《风俗》“龙里卫、平伐司”：花仡佬，性犷戾，居深山，言语莫晓，婚嫁论牯牛，大者为上，死则置于山洞……妇人盘髻，贯以长簪……杂缀海、铜铃、青白绿珠为饰……男子椎髻，上插白鸡毛，白布短衣，男女以蜡画布衣，首饰海（贝巴），青白小珠。

龙里卫辖地即在今龙里县境内，平伐司即“平伐长官司”，其辖地靠近龙里卫。平寨靠近龙里县，岩洞葬出土随葬器物也同花仡佬的服饰特征相同，因此，这批岩洞葬族属应为花仡佬。



第五节 花溪洞葬

埋葬逝者，以各种不同的仪式祭奠祖先，或者将逝者的遗骸放置于不同的地点，让逝者更靠近天国或者地府，这是人类内心情感的不同表达方式。而贵州作为民族大省，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因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信仰等方面的原因也产生了许许多多奇特的葬俗，如黎平的挂葬、天苗的树葬、洗骨苗的洗骨葬等，因历史的发展，很多都仅仅只能在史书记载中找到一些痕迹了。在今天的贵阳辖区内，还能够看到的民族葬俗，除了土葬外，还有直接在天然的岩洞内或者岩壁上放置死者棺木的行为，称为岩洞葬或者崖葬（其实二者形式相差不多，但是在悬崖绝壁上人工开凿墓穴的崖墓，与将木棺悬置于插入悬崖绝壁的木桩上的悬棺还是略有不同）。

贵阳和贵安的洞葬分布，就目前了解的资料来看，主要还是在花溪区的高坡苗族乡（后简称高坡乡）、孟关苗族布依族乡（后简称孟关乡）和开阳县高寨乡的平寨村附近，其中以高坡最为密集。其民族组成中，71%的人口为苗族，26%的人口为汉族，3%的人口为布依族。从历史上来看，大量的苗族实行岩洞葬，一般一个家族占据一个洞穴，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岩洞葬保存均不太理想。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陆续有一些学者对高坡岩洞葬进行调查研究。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花溪区文管所则在高坡乡和孟关乡对已知和新调查发现的岩洞葬进行了核实。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在花溪区辖区内共存在20余处岩洞葬或崖葬。2009年7—8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组队对其中9处岩洞葬进行了详细调查，其中保存较好的有以下几处。

甲定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甲定村以南约 1.5 千米处，高坡至龙里公路西侧约 100 米处的一个半山腰上。甲定洞为一天然洞穴，地质结构为喀斯特溶洞，处在栗木山的半山腰处，山上植被保存良好。洞呈“U”字形，分上下两个洞口，上洞口为主洞口，下洞口为一耳洞，两洞相通。洞口四周为茂密的灌木丛，有一条水泥便道从公路直通洞口。上洞口宽约 13 米，进深 26 米，高 16 米。洞底高低起伏不平，耳洞部分极为陡峭，堆满了许多从洞顶崩塌下来的乱石。棺木主要分布于上洞洞口和洞中心，洞底部也有少量存在。目前仅存 88 具棺木，形制有现代棺（又称三片瓦或者雄头棺）和两侧外凸棺木（棺盖棺底平，左右棺墙均外凸）两种类型，可见的绝大部分棺木都放置于井字形木架上。从当地村民处调查得知，该岩洞葬使用时间较长，但是其中至少有 13 具棺木为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放入。部分棺木的棺盖被打开，可以见到遗骸骨骼，观察其葬式应为仰身直肢葬，故该岩洞葬使用葬式多为一次葬，仅部分晚期迁入的墓葬为二次葬，使用小木盒盛装骨骼，且该洞内早期棺木曾被火焚毁，目前洞内还可见大火焚烧痕迹，所以可见的棺木年代较晚，推测目前洞内棺木最早应在清晚期，最晚为 20 世纪 90 年代。该岩洞葬棺内随葬器物（或祭祀遗物）有酒坛、碗、茶壶、茶盏、菜坛、双耳陶罐、单耳壶等陶瓷器，也有草鞋、木勺等有机质器物，还有纸伞、祭幡等祭祀用具。

中坝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硃口村中坝组东南 700 米处。该洞为一天然溶洞，四周均为高山。洞口四周为茂密的灌木丛，山下有大片林地，植被丰富。洞呈袋状，洞口高于洞底，底部较为平整。洞口宽约 30 米，高约 25 米。洞底略呈长方形，宽约 50 米，进深约 75 米，面积达上千平方米。洞尾部呈斜坡状，堆满许多从洞顶坍塌下来的乱石。棺木主要分布于洞内中部位置，少量位于洞底斜坡处。洞内的棺材遭到过严重的盗扰。从当地村民处调查得知，最先来的盗墓贼主要是奔着棺材里面的随葬品来的，而在 10 多年前，盗墓贼再次光临了该墓地，主要是为盗取洞内棺材木料。经过多次盗扰，外加年代久远无人看管和雨水的侵蚀，洞内的棺材有的垮塌揉成一大堆，有的则是散落一地。



洞内人骨随处可见，还有很多被打碎的陶、瓷片。整个场面惨不忍睹。大致统计出棺木约 148 具，分为两侧外凸棺木和有栓方棺两种类型，未被扰乱的葬式为仰身直肢葬。采集随葬器物（或祭祀遗物）有陶罐，瓷罐、青釉瓷碗、青瓷碗、青花碗，铜手镯。

五寨王氏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五寨村约 4 千米处一天然岩洞内，四周均为高山。洞口四周为茂密灌木丛。洞呈袋状，洞底处有一条深沟。洞口宽 8 米，进深 28 米，高 3.2 米。该岩洞塌方较为严重。该墓地因该村王氏家族墓地而得名。墓地里的棺木主要摆放在洞口西部和中部，在洞底也有少量棺木。棺木摆放整齐，特别是洞中区，基本上一排排整齐分布，每排 6 ~ 7 座。该墓地的棺木所有头向一致，朝向洞口，这在考古队员们调查的所有墓地中唯此一例。从现场情况看，原来所有的棺木都放在井字形棺架上，但棺架基本已经腐朽或散落，大部分棺材腐朽严重。棺木形制主要有三块瓦和梯形木棺，墓葬随葬器物有菜坛、单耳罐、壶、瓷罐、青瓷碗、白瓷碗、青花碗、青花碟、瓷器盖。

五寨唐氏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五寨村约 2 千米处一天然岩洞内。洞口四周多茂密灌木丛，并有一棵大树。岩洞呈一口小底大的袋状，洞口有一



五寨唐氏墓地
棺木堆积情况

缓坡，洞底西北方有一相对独立的小洞，内有自然高台及斜坡，最深处有一水潭。洞口宽约 18 米，洞底宽约 25 米，进深约 60 米，面积达上千平方米。支洞洞口宽 12 米，进深约 20 米。洞内钟乳石发育良好。该墓地因该村唐氏家族墓地而得名。棺木主要分布于洞口、洞底及洞底西北侧小洞内。该岩洞葬清代晚期曾被火焚毁大部分棺木，其余棺木则多已腐朽，仅辨认出棺木 185 具，其中大致完整的有 6 具，均为侧板带栓棺木。墓葬随葬器物有壶、碟、盘、褐釉双系罐、青釉罐、单耳带流罐、褐釉碗、青釉碗、青花碗，铜指环、铜手镯，芦笙带。

杉坪罗氏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杉坪村，北距杉坪小学约 3.5 千米，距村寨中心约 5 千米。该洞为一天然溶洞，在杉坪岩半山腰。洞口四周为茂密灌木丛，植被丰富。洞口开阔，洞内较浅窄。洞口附近有《龙村锁钥》碑、《安息于龙宫罗氏宗族后代》碑及《龙邨永印》石刻。据调查，该洞为杉坪村罗氏家族墓地。可辨认并能进行测量的棺木共 8 具，皆为两侧棺板带栓木棺，其余皆腐烂坍塌，叠压在一起，无法绘制平面分布图。由于大部分棺木已腐朽，其原来的安置方式和头向不得而知。墓葬随葬器物有青瓷双系罐、青瓷碗，以及贝饰。

杉坪将军山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杉坪村将军山，距杉坪村小学约 400 米，岩洞位于将军山的半山腰。四周为茂密灌木丛，植被丰富，洞口下山势起伏，山下为一平坝。该墓地为一半圆形岩厦，洞口略平，洞底呈弧形，洞口宽约 10 米，进深 5 米，高 5 米。该墓地的棺木保存情况十分不好，完整棺木基本不见，主要是自然腐朽所致。根据棺木腐朽留下来的残迹，推测该墓地大约有棺木 13 具。从现存的情况来看，该墓地的棺木都是依据地势摆放。能够明确有 7 具棺木头朝洞外，其余的因腐朽严重而无法判断。棺木形制为两侧棺板带栓木棺。未能在洞内采集到任何随葬遗物。

批林罗氏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批林村。该洞为一天然溶洞，洞口四周为茂密灌木丛。洞呈口小底大的袋状，可分成洞口区和洞底区两部分。洞口宽 15 米，进深 20 米，高 8 米。洞内潮湿多积石，岩石上遍布青苔。可辨



认的棺木共 13 具，均为三片瓦，放置于洞口和洞底两处。部分棺木上插有纸幡等较晚近的祭祀品。棺架大多散落。墓葬随葬器物有残陶罐、单耳带流瓷罐、壶、残高领罐、青瓷罐、青瓷茶盏、青瓷碗、青瓷碟、褐釉单耳罐，以及铜手镯。

北杉坪墓地 位于花溪区高坡乡五寨村北杉坪组，西北距村寨中心约 4 千米。该洞为一天然溶洞，处于半山腰，洞口四周为茂密灌木丛。洞呈口小底大的袋状，分成洞口区和洞底区两部分。洞口宽 3 米，洞底宽 5.5 米，进深 21 米，平均洞高 1.3 米。棺木分布于洞口及洞底两处。可辨认棺木 20 具，均为两侧棺板带栓木棺，棺架皆已散落。墓葬随葬器物有单耳带流瓷罐、青瓷双系罐、青瓷碗、带流罐、瓷烟斗。

渔洞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苏亚村渔洞组，未发现棺木遗存，仅在洞内采集到青瓷碗 1 件。

除了这批岩洞葬，在花溪区高坡乡的范围内，还有如下几处岩洞葬。

杉木山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苗族乡高坡村翁西组杉木山。洞内南部为洞口向内坍塌的巨石和石块堆积向下的斜坡。木棺、随葬品的残片及残存人骨主要分布在坍塌的石块上。棺木因受后人盗扰和烧毁已残缺。



北杉坪墓地
内景

大坡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苗族乡克里村二组大坡岩洞葬，共有岩洞葬2处。1号洞棺为苗族祖先“落牙公”洞葬。该洞较小，只能放一具棺材，现除棺材盖板未见外，其他构件保存较好。尸骨已无存。2号洞棺现已腐烂严重，糟朽的棺材构件和人骨满地都是，其中掺杂大量的陶罐和青花瓷残片。洞内还保存有完整的酱釉陶罐和土瓷碗。该岩洞葬时代为明清，族属为苗族。

掌门山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甲定村茶山组掌门山一处岩洞内。该岩洞坐东朝西，洞宽29米，高11米，深55米，木棺存于洞中部最低处，东部巨石上只存有木棺1具，部分棺木构件已朽，木棺形制均由木板凿成相套，部分架在圆木支架上。该岩洞葬时代为明清，族属为苗族。

流坝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甲定村流坝坡。山洞坐南朝北，洞较小，接近其下平坝，深3.2米，宽8.2米，高2.4米。棺木构件分布于岩洞东部。随葬品残片有瓷罐、碗。该岩洞葬年代为清代，族属不详。

花溪区高坡三岔河墓葬群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杉坪村和水塘村之间的三岔河大峡谷内，共3处地点。一是三岔河北面侧壁，有棺木1具，为长方盒形，放置于“井”字形木架上。二是水塘悬棺葬，位于三岔河摆弓岩。距地面80米的峭壁岩壁缝中现存棺木1具。据村民介绍，其为明末清初苗族悬棺葬。三是三岔河峡谷南壁，可见棺木3具，形制不明，未发现随葬遗物。

安基冲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苗族乡五寨村。洞口高3米，宽6米，进深12米。洞内有坍塌棺木和死者尸骨。据村民介绍，其为明代至清代苗族洞葬。

苏亚白岩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五寨村苏亚白岩上。发现棺木1具，已朽坏，形制不明。可见仍放置于“井”字形木架上。

龙山洞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龙山洞内。棺木放置于洞内左侧，约有棺木百余具，置于“井”字形木架上。右侧仅见棺木许多碎片。

无名山墓地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高坡苗族乡五寨村。洞内有棺木20余具，该岩洞葬时代为明清，族属为苗族。

除此之外，花溪区孟关乡还有一处岩洞葬，即马鞍山洞葬，位于石龙村马



鞍山组马鞍山西侧。洞口朝西，近圆形，直径3米。进洞约40米的洞底散落有木棺6具，木棺外有散落的人体骨骼。棺木形制特殊，均为原木整体刻凿，呈船形，每个棺木单体为上、下两部分合扣而成。该洞葬年代为宋明，族属不详。

为什么会有岩洞葬这一特殊的葬俗？这应该是和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喀斯特地貌形成大量的岩洞，天然便有了存放棺木的场所。贵州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使用土葬会占用大量的耕地，而使用不能耕作的洞穴放置，也节约了土地。

从这些岩洞葬中采集的器物来看，彼时的物质生活应该是相对贫乏的，随葬品数量不仅少，而且种类也只有寥寥几类，且有较多的墓葬完全没有随葬品。可见当时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准极低，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元明清时期的贵州经济发展水平极低，至少大部分的区域居民经济生活水平相当低。除少量祭祀用品外，均使用日常实用器物来作为随葬品。

贵州的民族墓葬种类繁多，目前已知的就有树葬、岩洞葬、悬棺葬、崖葬、火葬、土葬、石板墓、箱式石板墓等多种类型，这些不同的墓葬形式是贵州各民族通过漫长历史积累和选择的符合本民族或本区域民族生活习俗的埋葬方式，也是贵州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环境形成的特殊丧葬形式。在清之前，贵州地域多由土司羁縻管辖，尚未对这些不同的丧葬习俗进行干预，故保存较好；而清政府入关以来，西南少数民族“改土归流”之后，清政府大量禁止民族埋葬方式，对民族墓葬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古籍中记载有：

《黔南识略》卷一 贵阳府宋家、蔡家并通汉语，知文字，勤耕织，守礼法，今尽变而为华，不复可别识矣。仲家……葬以雨伞遮墓上，期年而焚之。祭用枯鱼。……男子俱汉装，近更有读书应试者。……于今久被声教，渐习华风。

《黔南识略》卷二 修文县苗有青苗、花苗、养牛苗、仲家苗、长头苗五种。服饰均与汉民同。

贵州多彩的民族墓葬文化在清政府的多项政策干预下艰难生存，自清中期之后，民族墓葬形式日渐式微。

第六节 贵阳明清墓及其窖藏

新中国成立以来，贵阳地区在工农业建设和市政建设过程中，出土了一批明代文物。其中，以省人民剧场、太慈桥原医学院操场、太慈桥原康复医院、贵阳水泥厂、贵阳师院、贵阳医士学校、贵阳六中、贵阳玻璃厂、三林村、新添寨新江小学、普陀路街道办事处等地点出土的明代文物数量较多，另在太慈桥省一监狱、省政协、威清门派出所等地也有零星发现。这些文物的出土，虽然脱离了具体的遗迹单位，但对于探索明代贵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情况，无疑还是具有一定的价值。

经统计，贵阳境内出土的明代文物共有 229 件，其中有陶罐 3 件、陶仓 7 件，瓷罐 1 件、瓷盘 22 件、瓷碗 28 件、瓷杯 2 件、瓷碟 2 件，金梳 1 件、金簪 2 件、金发针 1 件、金耳环 3 件、金戒指 2 件、金花片 7 件，银簪 2 件、银手镯 2 件，铜炉 1 件、铜镜 1 件，锡仓 2 件、锡壶 4 件、锡盘 20 件、锡杯 10 件、锡灯台 1 件，玉簪 7 件、玉牌饰 35 件、玉手镯 20 件、玉戒指 7 件、玉扳指 1 件、玉扣饰 5 枚、玉帽花 3 件、玉耳坠 5 件、其他玉器 6 件，另有水晶、玛瑙、琥珀、玳瑁饰品 16 件。

其中重要的有青花盖罐，直口，圆唇外折，丰肩、敛腹、平底，有斗笠形盖，盖钮为圆珠形。器内外施白釉，上绘青花，内容为人物、松竹、芭蕉、花草，盖施白釉，上描青花，内容为童子嬉戏图。通高 37 厘米，口径 13.2 厘米，底径 15.5 厘米。溪山渔乐图青花碗，敞口，浅腹，圈足。通体施白釉，碗内底部绘有青花“溪山渔乐”图，碗外腹部也饰同类青花图案。高 4.4 厘米，口径



16.2厘米，底径6.1厘米。青花杯，直口，浅腹，圈足。白釉青花，腹部绘人物山水图案，底部楷书“大明成化年制”等。

1980年7月，贵阳市中华北路北横巷一位居民在修理院墙时，发现一批银锭，旋即送交派出所。贵州省博物馆得知消息后，前往出土地点进行调查，发现这批银锭是出土于地表之下约0.3米处的一个陶罐中。这批银锭一共31件，重41.2斤，它的形状有马蹄形、长方束腰形、方斗形和圆形4种，除其中一件之外，其余均有地名、商号、工匠姓名、重量和纪年等内容的铭文。其中纪年最早的为马蹄形银锭横：6号，重17两，长9.2厘米，宽5.5厘米，高6厘米；左铸铭文“江夏”“公盛”，右铸铭文“同治二年（1863年）”。纪年最晚的为圆形银锭横：25号，重3.5两，底径4厘米，高2厘米，上有方印章式铭文“新关光绪元年二月（1875年）”，还有“桃源”“芷江”“叙浦”“江夏”“万年”“辰州”“思南”等州县地名，也有“熊新盛”“李源茂”“永隆裕”等商号，也有“匠朱兴”的工匠姓名。

对于贵州，有所谓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那么这批银锭的价值有多大呢？清代的一两约等于37.3克，这批银锭的重量约等于552两，在清代晚期，约2两银子可以购买1石米，即1两银子大致等于60斤米，从米价上推测这批银锭值七八万元人民币，目前拍卖价中金银锭的成交价格从几万元至四五十万元不等，这批银锭价值在几十万元至几百万元。面对这一批价格不菲的财富，清代晚期进入窖藏后，没能重见天日，目前最有可能的推测就是物主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将这批巨大的财富埋在地下后，因各种原因没能将其传承下去。在100年后的1980年，因为偶然的机会有重见天日。这些银锭的出土，对于考古队员们研究清代晚期的货币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1982年9月25日，贵阳市防疫站在基建施工中发现一座古墓葬，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和贵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共同对其进行清理。这座墓葬是一座拱券顶（一种建筑，指半圆的拱形结构）的长方形石室墓，仅1间墓室，长4.1米，宽3米，高1.95米。石质门框内安放2扇石门，门高1.25米，宽0.66米，



北横巷出土的窖藏银锭拓片

厚仅 0.1 米。门的正面有铁质门钁一对，门后有一根长 0.5 米的抵门石柱。墓的后壁上有一头龕（在头部上方凹入的小室，可以放置随葬品）。龕高于墓底 0.48 米，宽 1.07 米，高 0.56 米，深 0.65 米。后龕上有一早期盗洞，墓室内的随葬品已荡然无存，仅见黄色黏土中偶有连续的紫红色漆片和一些瓷片残存。墓门前立有墓志 2 盒，分别束 2 道铁箍（铁箍已锈蚀）。志盒为泥质石灰岩制，正方形。一盒为 68×68×7 厘米，另一盒为 65×65×10 厘米。盖文是阴刻篆书，志文是阴刻楷书，文笔流畅，书法娟秀，刻工精细。第一盒墓志：盖文为“明故昭勇将军贵州都指挥张公墓志铭”，志文由于水浸剥蚀，绝大部分字迹已不能辨认。第二盒墓志：盖文为“明故张夫人李氏淑明墓志铭”，志文直书 25 行，每行 12 至 27 字不等，字径 2 厘米，字迹基本完整。根据墓志铭记载，可知墓葬时代为明朝成化年间。

墓葬男主人的名字由于铭文被水浸剥蚀，已不能辨认，但从残字断句中尚可看出张都指挥“喜文儒习”，曾“兵征剿都匀”，活了 54 岁。据历史资料记载，明成化以前担任过贵州都指挥的姓张的计有 6 人。即张锐、张任（贵阳



人)、张祥(四川人)、张贵(清镇人)、张骥(贵阳人)和张晟(清镇人)。从志书对这6人的记载来看,并结合铭文考证,仅有张晟的可能性最大。张晟,贵州威清卫人,好读书、能诗文、尚气节,曾任威清卫指挥,正统中以征南功迁都指挥僉事出守都匀,推僉阩政。贵州都指挥使司设于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明史·职官志》云:“都司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从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都司设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二人,从二品,都指挥僉事四人,正三品。”可见都指挥使司共有7名都指挥。“昭勇将军”是明代武阶官之制,为正三品初授之阶。“昭勇将军”与“都指挥僉事”的阶衔是统一的,即正三品。张晟“征南功迁都指挥僉事出守都匀,推僉阩政”与张都指挥铭文中“兵征剿都匀”,以及张夫人铭文中的“今都阩公之俚也”也是吻合的。故笔者认为墓男主人是明朝贵州都指挥僉事张晟。而像昭勇将军张晟这样的地方高级武官夫妻合葬墓,在贵阳还是首次发现,为研究贵州地方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96年9月,贵阳基建二公司在东山晒田坝安居工程挖基槽的时候发现了一批墓葬,但工程方没有对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等到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到消息派考古队到达现场时,发现出土的陶器、瓷器已经不知道具体的出土墓葬,陶器的碎片也散布于工地现场。2天的重点钻探后,考古队并没有能直接进入工地进行发掘,而是直至11月13日,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贵阳市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才进入现场进行发掘,共计清理墓葬6座,出土各类文物20余件。

晒田坝的这批墓葬,包括5座土坑墓和1座石室墓,其中3座土坑墓均使用了厚达0.22~0.55米的石灰糯米浆浇灌,这种石灰糯米浆极为坚硬,使用钢钎打上去也不过出现一个小白点而已,是古代防止盗墓的手段之一。另外2座土坑墓虽未使用石灰糯米浆封护,但其葬具却使用了棺槨(葬具,棺为装殓尸体的葬具,槨为古代套于棺外的大棺,在古代,二者的有无多寡代表了身份地位)。《墨子·杂篇·天下》中有:“天子棺槨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

士再重。”明代丧葬之制主要是依据《仪礼·士丧礼》及参考了唐的《开元礼》和宋的《朱子家礼》而形成，虽然晒田坝明墓中使用的只是一棺一槨，但使用棺槨，依然是一种高级身份的象征。

晒田坝墓群的随葬器物，带盖陶仓没有见过实物，材质不明。釉瓷罐和长颈釉瓷瓶应该是同大松山墓群出土的瓷罐和瓷瓶一样，釉色、胎质均不好。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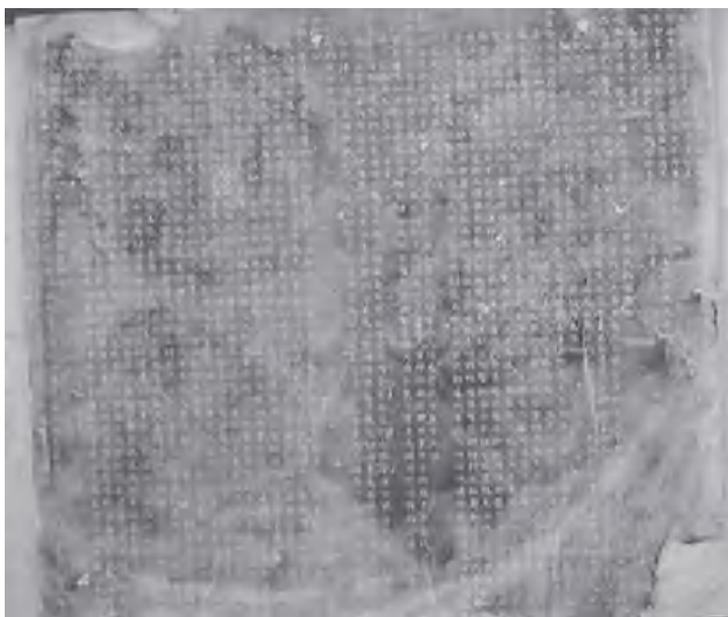
晒田坝明墓现场



青花瓷器则不然，瓶碗的组合在墓葬中常见，清代直到现代均有发现，但其使用青花，且96GS器12上绘的牡丹喜鹊图的题款“富贵到白摩大雅山人在丁巳画”和96GS器14上的“仿元人笔法”，再联系出土墓志上的年代，确定一批年代明确的明代中晚期青花瓷，具有一定的科研价值。可惜的是，当时器物具体出于哪座墓葬已不可考。在晒田坝明墓中一共出土了7方墓志，本次发掘出土墓志5方，除“许太公（许厚德，许一德四胞弟）暨原配孺人余太君合葬墓志铭”明确出自96GSZ3之外，其余墓志均无法对应墓葬。其中包括“许一德（吉庵）墓志铭”“许一德妻越氏墓志铭”“许母刘氏（许一德伯母）墓志铭”“许修德（许一德堂兄）墓志铭”4方，而“许修德妻袁氏墓志铭”和“许成德（许一德五胞弟）墓志铭”早年为贵阳市文物管理所收藏。通读墓志志文，则主要展现了许氏“德”字一辈在明代万历、天启、崇祯年间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地方史料价值。而此次发现及以前发现的墓志基本为明代晚期的，根据“许一德（吉庵）墓志铭”中的“葬公于东山祖莹”，可知东山应是许氏家族祖莹所在地，而这次发掘的明墓仅仅是许氏家族明代晚期的家族墓地之一，而作为从洪武时即活跃于贵州政坛的并延续至明末的许氏家族，其墓志的史料价值对于贵州地方史研究具有极大的意义，以后在东山可能发现许氏家族其他成员的墓葬。

2007年6月11日，贵阳市花溪明珠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在修建贵阳花溪区青岩镇南街村菜园地停车场时，发现2座石室墓。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闻讯后立即组织力量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发掘工作从6月16日开始至25日结束，历时10天。共清理石室墓2座、土坑墓6座，墓上封土皆被破坏殆尽。2座石室墓均为竖穴式墓圪，长方形石板券拱的石室墓，由墓道、挡墙、墓门、墓室和护墙等部分构成。从护墙内石板的叠压关系分析，M1、M2系同时修建，填土多为回填的黄黏土，墓室内有木棺（已腐），棺表有红漆，棺底铺有石灰，仅M2右侧墓室残存人骨，葬式为仰身直肢葬。

其中M1为单室券顶墓，墓葬结构由墓道、挡墙、墓门、墓室、后龛和圆



晒田坝明墓出土的墓志拓片



晒田坝明墓出土的墓志盖拓片



形护墙组成，墓室全长 2.8 米，宽 2.6 米，残高 1.72 米，在墓室内右侧近后壁处出土 2 件残釉陶罐，在护墙填土内出土 1 件铜锁。

其中 M2 为多室券顶墓，墓葬结构同样由墓道、挡墙、前室、墓门、后室（可分左、右两墓室）、后龛和圆形护墙组成，墓室全长 4.06 米。后室单室长 2.76 米，宽 2.8 米，高 2.04 米。墓底有棺木痕迹。棺木外侧有红漆，且有数枚棺钉，人骨保存状况较差。左侧墓室仅见棺木 1 块和数枚棺钉，龛内平置 1 件釉陶罐。在 M2 右侧墓室底部有棺木朽痕和人骨存在，可惜人骨保存状况较差，仅存少许肢骨、盆骨和下颌骨，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双手放于身体两侧。棺木下铺石灰，且头部位置石灰呈块状，头部位置出土有 3 件随葬品，分别为铜烟斗、银发簪和瓷碟。虽此 2 座墓皆未见任何可资纪年的遗物，但依据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特点能比较可靠地推测年代应为清代早期。



青岩清墓 M1、M2 俯视图



青岩清墓出土的清代酱釉瓷罐



青岩清墓出土的清代青花梵文盘（雍正）



青岩清墓出土的挖耳勺形银发簪



第七节 贵阳明代卫所及屯堡遗存

一、从点到线——“一道长蛇”的形成

元末时期，社会陷入动乱，战火不断，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此时的西南地区同样不太平，各方势力瓜分西南，当时夏玉珍占领了四川、重庆等地，而贵州遵义、思南一带就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元朝旧势力梁王占据云南一带，贵州西部乌撒、乌蒙等地势力归附梁王。而此外的贵州中南部等大部分地区尚属少数民族区域，属于较为分散的势力。

朱元璋势力大振之后，黔东南思南、思州于1365年相继归附。1367年，思、沅两界军民安抚使黄元明献出所领之地内附朱元璋政权。此时，贵州东部全然归附朱元璋政权。到洪武四年（1371），朝廷以平定四川为契机，意欲打通川黔两地交通，决定在四川南部今叙永一带设永宁卫，于今贵阳城区设立贵州卫。这开启了贵州卫所设置的篇章，也是贵州步入快速发展、设立省份的第一步。之后，播州土司等势力相继响应归附明王朝。朱元璋向各地民族势力宣扬其政策：凡是天下守土的臣子都是朝廷官吏，天下的人都是朝廷的人民，你们只要归附于朝廷，朝廷定会好好安抚，使你们能各安其身、长享富贵。

想要经营管理贵州，仅仅倚靠永宁、贵州两卫显然不行。在朱元璋时期，贵州的土著势力叛服无常，各地多次叛乱。如洪武五年（1372），古州、田州、澧州等处洞蛮作乱。洪武六年（1373）三月，大平伐苗僚作乱；四月，思南宣慰司溶溪芝子坪蛮民叛乱。洪武七年（1374），平伐、谷峡、古浪等苗蛮作乱；

十二月，播州江渡蛮黄安等作乱。但朝廷都是采取平定的策略，并未有进一步的针对性措施。直到洪武十一年（1378），黄平安抚司地界内蛮人多次作乱，安抚司不能治理，朝廷决定在此设置了黄平守御千户所。朱元璋对于贵州的管理采取了极为宽松的政策，这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关。

西南地区存在的最大问题来源于云南，至洪武十四年（1381），云南梁王仍然盘踞西南一隅，拒不归附。朱元璋派遣傅友德等，从四川、湖广两个方向进兵，经过贵州平定云南。次年平定云南之乱，朱元璋认为“霁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故而屯兵各地，筑城以守。为了巩固湘滇黔一线的畅通，沿线分置卫所，贵州东侧有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都匀卫，史称“下六卫”；西侧分别为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普安卫，史称“上六卫”。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又于贵阳城南置贵州前卫指挥使司。加上东部地区湖广所辖镇远卫、平溪卫、清浪卫、偏桥卫四卫，贵州中部形成“一道长蛇控百蛮”之势。

明代晚期天启年间，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和贵州宣慰司安位的叔父安邦彦勾结叛乱，历史上称为“奢安之乱”。这场叛乱延续数年，中央和地方官员付出了巨大代价，几经波折才得以平定。以这场叛乱为警戒，朝廷为了加强对水西势力的监管，对鸭池河南部沿岸加强了兵力布置。一是以水西水外六目改置为镇西卫，下领威武守御千户所、赫声守御千户所、柔远守御千户所和定远守御千户所；二是以扎佐长官司改置敷勇卫，领于襄守御千户所、息烽守御千户所、濯灵守御千户所和修文守御千户所。

二、明代贵州古城

（一）明代贵州城址的种类与选址

明代的管理体制一般分为两大系统，其一为行政系统下的府、州、县制度，其二为军事系统下的卫所制度。明代军事系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同行政系统一样，是一种政区地理单位，管辖不属于行政系统的大片疆土，都司卫所系统



被认为是司府州县系统的辅助政区系统。两大系统之下，贵州明代的城址主要可分为卫所城址和府州县城，此外还有少量的土司山城以及一些作为权宜之计建设的军事据点。

明代早期中央对贵州的开发主要以卫所制度为基础。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主张全国各地设立卫所，这便是明朝“以武功定天下”的结果。按照明代的兵制，一个卫大概 5600 人，其下领 5 个千户所，千户所下再设百户所，以 50 人为总旗、10 人为小旗。这些军户的来源，有的是跟随军队征战而来，有的是投降归附而来，有的则是因犯罪谪发而来。军户都是有军籍的，世代可以承袭。卫所具有一定管辖区域，尽管其边界可能模糊不清、土地多数插花，具有实土或准实土性质；卫所制度作为区别于府州县的另一套管理系统，其本质属于兵制的重要部分，同时兼有司法、经济等独立管理权，故而卫所被称为“军管型的特殊地方行政区”。

明廷为经营西南经贵州开一线以通云南，于川滇黔、湘滇黔沿线置卫镇守，连点成线，形成“一道长蛇控百蛮”之势。广置卫所，筑城以守，卫所的筑城即是明代贵州城镇发展之滥觞。卫城是明代贵州城址建设的主要类型。卫治多系今之市、县治所在，仅铜鼓卫、清浪卫、层台卫三城位于乡镇。保存较好的以锦屏县铜鼓卫城、镇远县清浪卫城等为代表。

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后，对府、州、县的建设逐步展开。府城多与卫城同城，“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如贵阳府、安顺府、都匀府、平越府、黎平府，镇远府与镇远卫属于同地异城，分别处于濠水南北两岸。州城的建设在早期时并不完善，由于政治条件不成熟，一些州处于“遥辖”状态，州官长期居于卫城、府城。单独建城者有安顺州、黄平州、开州等地。县城有施秉县、贵定县等。

明代贵州长官司众多，以播州杨氏、思州田氏、水西安氏、水东宋氏为四大土司，其余各地尚有诸多势力较弱的土司。这些土司势力在明代贵州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土司城防的遗存，在考古调查或是文献记载之中都所见

甚少。部分长官司与卫所同城，如永宁卫与四川永宁宣抚司同城。单独建城者甚少，文献记载有平头司城，另有顶营司城等。在考古调查中，一些营盘遗址在当地民间口碑传说中被认为是土司所建，如安顺市西秀区安榨城、普定沙家屯、关岭大塘山等。郭子章“土司无城”之说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具体说明：“土司无城，例也。惧尾大也。即播悍且叛，不敢城夜郎。今水西、永顺、保靖犹无城也。”

其他的一些军事据点城址，以黔西南地区的“盘江十一城”为代表，另外有西秀区的羊边城、福泉市的竹王城等。天启六年（1626）至崇祯四年（1631）期间，朱家明建盘江十一城，“盘江曰连云，西坡曰有嘉，板桥曰靖氛，海子曰恬波，马场曰奏肤，以上蒙赐名城者。又于归集小黄河建龙新城，亦资孔建资孔城，顶站建鼎新城，定头建定边城，尾洒建维藩城。阿机建石碁城”，现存连云、定边、石碁等城。通过考古调查发现的有安顺西秀区羊边城、黔南州福泉市竹王城。羊边城可能与明初驻军有关。竹王城长期传说与汉代竹王有关，根据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此城应是明代一处军事性质城址，极有可能与杨老堡、都清守备有关。

明代建城，多数是为了戍守“一线”。城址选址，核心要素为三：一者便于防御，此为建城之根本，防御的需求使多数城址依山而建，甚至是位于山丘之上；二者水源，此则生活之必要，故大部分城址均是“一水环流”，这也为防御提供了一道自然防线；三者平坝，此则建城之保障，一般在城外有一定面积的平坝，便于屯种。城址的选址始终以军事战略为主导，一是控制交通干道，二是置于蛮夷出入之处。由于贵州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城址的选址多元，呈现出“半山半坦”“一水环绕”“城压平原”“居高筑城”等多种样式。筑城多因地制宜，选址的不同亦使城址平面形态不同，包括了圆形、长方形、椭圆形、莲花形、水滴形等。

城市的选址大体可分为几类：第一类为平坝之地，因坝子大小和周边地势差异，使得城市形态差异较大。坝子大者，提供足够的建设空间，并缺少地形阻碍，



城市形态规整。这类城市多分布于黔中地区。如省城贵阳府（含贵州卫、贵州前卫等）、安庄卫城（镇宁州）、普定卫城（安顺州）、平坝卫城、威清卫城。第二类为河流阶地。此类城址多依山为城，以水为池，城内多为半山半坦之势，其城垣一面临江，一面背倚丛山。临江城垣，既可御敌又可作防洪之用。由于阶地平整，城垣宜笔直规整，后倚靠高耸山峰，垣墙多顺山脊而上。故而此类城在形态上多为近三角形，或为前方后弧的形态。如清朗卫城、施秉县城、镇远卫城、镇远府城、都匀卫。第三类位于高埠之地。明廷所建者，山势一般较低，且山脚有河流及平坝，以满足屯种的需求。土司修建者，往往在群山之中，山势陡峭，城内甚至几乎没有一里平坦之地。城址规模受限于山顶便于活动空间的大小，形态则因地势而成。这类城址应是极为注重防御，因日常用水难以满足，人口规模较为有限，面积多较小。此类城以所城略多，卫城极少。如铜鼓卫坐落于一个三角形坝子中间一座较矮的山顶，平坝中一条河流从东北向西南流过，注入亮江。山顶较为平缓，西高东低。

（二）黔中的城镇化

明代广置卫所促使贵州城镇化进程达到历朝以来新的高度。在明代，对卫所的城池修建最为重视，这主要是由于其特殊的军事功能，一般设立卫所之时便组织筑城。而州府城池的修建显得更为滞后，一些州府在设立后，有的会过了几十年后才组织筑城，修建规制也更为简单，如独山州城由市民筑土墙，墙高1丈，厚3尺，城墙之上栽种荆棘。而土司则多奉行“土司无城”的原则，一般无城。

明代卫所的设置，基本奠定了黔中地区城镇格局。明代贵阳地区先后建有贵阳（即省城）、敷勇卫城、威清卫城、镇西卫城等城，驻外千户所一般都筑有城，威武所、赫声所、柔远所、定远所、于襄所、息烽所、濯灵所、修文所均有所城。这些城址分布于今贵阳市南明区、清镇市城区、修文县城区、清镇市卫城镇等地。卫所的城池是经营黔中的重要据点，也是黔中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敷勇

卫城位于修文，威清卫城位于清镇市区，两城遗存均已在城市建设中被破坏殆尽。清镇镇西卫城是目前贵阳地区保存较好的卫城遗存。另在宋氏地设置开州，建开州城，即今开阳县城，今城区内米阳坡山脊尚存一段明代土城墙，均由土石拌石灰夯筑而成。

1. 省城贵阳

贵州卫、贵州前卫即省城，与宣慰司、贵阳府、新贵县同城而治。洪武四年（1371）置贵州卫，洪武二十四年（1391）增置贵州前卫。明成化十二年（1476）七月分贵州宣慰司地为程番府，治于程番长官司，至明隆庆二年（1568）六月移入布阵司城，与宣慰司同治。隆庆三年（1569）改为贵阳府，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四月升为军民府，领州三、县二、长官司十六，新贵、贵定两县倚府城。

省城贵阳城最早修筑于元顺帝至正年间（1349年前后），最早的时候还是土城。洪武十五年（1382），都指挥马煜向北扩建省城，并将土城改为石城。贵阳城周围九里七分，高二丈二尺，共计5个门，北边叫柔远门，南边为朝京门，东边称永安门，西边称德化门，西北尚有圣泉门。这些城门之上都修建有城楼。万历九年（1581），都御史王缉将女墙增高数尺，城下开路建桥，以便夜巡。至万历十三年（1585），都御史舒历龙因拦马墙容易崩坏，以石块垒砌三尺高，上面再筑五尺高的墙。天启六年（1626），总督张鹤、巡抚王城在北门增修外城。明代贵阳府、新贵县、宣慰司、贵州卫、贵州前卫均在城内。清顺治十六年（1659）重建，康熙十一年（1672）重修外城，雍正四年（1726）、十年（1732）两次修缮，乾隆六年（1741）改外城为石城。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因为日本侵略者使用飞机轰炸贵阳，为方便疏散城内居民，将一些城墙拆除开辟为门洞。抗日战争后期，杨森出任贵州省主席兼贵阳市市长，下令撤除城墙。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贵阳城垣便只剩断壁残垣。

时至今日，贵阳仅存局部几段城墙，如大西门段、蟾宫巷段。东门，即武胜门、永安门，位于云岩区文昌街，俗称老东门，以和明末天启时修建的外城新东门



相区别。东门以加工规整的条石垒砌而成，与其他四门规制略同，上建门楼，外筑月城，万历十九年（1591），巡按陈效将此改名为“永安”。万历二十四年（1596），在门外月城上修建文昌阁。清初，改“武胜门”为“昭文门”。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贵阳城区周边相继发现一些明代墓葬，其中有不少职官墓葬。如1945年太慈桥曾出土明张惇及妻曹宜人合葬墓志铭；1954年城西出土詹英、詹木、詹恩、詹惠、詹侯墓志，贵阳工校工地出土王麒墓志；1955年贵阳城西出土詹木妻越孺人墓志，贵阳市南门观风台出土李诠、李诚墓志；1974年贵阳东山垭口曾出土处士伴鹤与刘氏墓志；等等。除此之外，在贵阳市政建设中也有一些零散文物的出土，先后于省人民剧场、太慈桥原医学院、原康复医院、贵阳水泥厂、贵阳师院、贵阳医士学校、贵阳六中、贵阳玻璃厂、三林村、新添寨新江小学、普陀路街道办事处等地出土较多明代文物，陶器有陶罐、仓，瓷器多为青花瓷，种类包括罐、盘、碗、杯、碟等；铜器见有“大明宣德年制”铜炉、“湖州薛仲发造”铜镜；锡器有仓、壶、盘、杯、灯台；金银器有戒指、耳环、发簪、针、花片、梳等；另有一些玉器饰品。

2. 清镇卫城的过去

镇西卫城位于清镇市卫城镇上。该城始筑于崇祯三年（1630），设有东、南、西、北四门。城墙以加工方正的石材垒砌，内部为夯土。城址平面布局呈椭圆形。康熙二十六年（1687）撤卫，与威清卫合并置清镇县，改名卫城至今。民国《清镇县志稿》记载：明镇西卫城，俗呼卫上……城今尚完好。开四门，内分东、西、南、北四大街及数小街，视县城略小。然县城本合老新二城而成。往昔行旅云集，商贾星罗，惟在新城。老城形成冷静。卫城则住居者、过往交者易者萃聚一城中。清咸同光宣间，烟泥畅销，外商争先至此，因而吸引他叶，并驾活跃，市容较县城为盛。今清毕马路贯通老城后，复自卫城之南穿入经城北而出，两城盛况可曰伯仲。卫城坐落于低山丘陵地带，东部、西部、西北部环山，三山之间地势较为平坦。跳蹬河从城址西南部由南向北流过，相距约800米。城址平面近椭圆形，城内面积40000余平方米。城内现为卫城镇所在，民居密布，分为东

门、西门、南门、北门四村。由于自然风雨的侵蚀和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影响，又因年久失修，目前大部分城墙已消失，仅东、西残垣两段，处于今卫城镇两侧山上。现在的城门所建位置为原南门遗址，于 2017 年至 2019 年建成。东门旧址位于东门部两山山坳处，如今仅能看到此处为一条水泥路，两侧为民房，结合地势仍能看出类似关口的意味，民房之下，尚能见到一块早期石门的基础石。



清镇市卫城镇（镇西卫城旧址）全景

3. 鸭池河南岸山城

鸭池河南岸沿线设置了 8 个驻外千户所，这些千户所分布于今清镇、修文、普定等地。8 个驻外千户所均有筑城，但至今保存有城垣等遗迹的仅有濯灵所、赫声所、威武所、柔远所。

濯灵所位于贵阳市修文县六广镇广城村村庄西部山顶。在 184 县道进入遗址的路口，立着一块残碑。该碑系圆首，碑首阴刻祥云。碑身居中阴刻楷体大字，



如今尚能清晰看到“贵州濯灵”4个字，这也是六广村曾是明代千户所的直接历史证据。遗址占地面积1300余平方米。建于洪武十九年（1386），贵州宣慰使司宣慰使奢香所辟“龙场九驿”之一六广驿于此。崇祯三年（1630），建濯灵所城于此。据道光《贵阳府志》记载，“六广城，在修文县北，明崇祯时建，为濯灵所”，城“六里三分，高一丈六尺”，“清康熙初年裁所，称六广城，黔西协六广汛把总驻此。旧系石城，近多坍塌，惟东北三门尚存，居民三十余户，城内有明守御千户所地址，现以官产变卖无存”。城址建于山顶，坐南向北，平面呈不规则四边形。现残存垣墙长70余米，位于城内顶部，当地人称为“营上”。留有南门和北门，现残存南门遗址。西南部残存局部土墙，墙体中包含一些碎瓦片，残高有1.6米。在遗址北部坡地中，现存一道以方正条石垒砌的石坎，长仍有10余米，高逾2米，当地村民称此地为寺庙。在当时，广城村一带有八大寺庙之说。遗址东部，今公路下一户瓦房，之前也是一座寺庙，现在还能看到石板平铺的地面。后因“改土归流”后驿站弃用，20世纪60年代六广镇下迁，驿城变为耕地。

赫声所建于崇祯三年（1630），同年筑城。据民国《清镇县志稿》记载：“周七里三分。高一丈八尺。崇祯三年建。此城为毛石砌城。门五，东、南、西、北四门，外更有小南门。现有少数住户。城身半倒塌。北门已毁。城内一小山矗立。小山前建一关帝庙。庙前可见鸭池河对岸黔西之大小关。”所城旧址位于贵阳市清镇市新店镇茶店村后山上。城址坐北向南，处于山体南麓斜坡之上，这一带基本没有一块平整之地。西北就能看到鸭池河北岸。如今仅存西南部一门洞及局部城墙，整体破坏严重，城址平面形状和面积都不得而知。城门处于两山山坳处，门洞两侧各残存城墙一段。门洞及石墙均系石砌，门洞处石材加工更为规整。此城于2018年被清镇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威武所设于崇祯三年（1630），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改属平坝卫。今其旧址存在两种说法，一说位于安顺市平坝区乐平乡乐平村东北角。该城分上下两城，上城坐落于乐平村东北较为低矮的西门坡山顶上，下城位于上城西



清镇市六广驿遗址残碑



清镇市赫声所城门现状

北面至穿洞河，东南高西北低。上城平面为规整的椭圆形，城内面积有 3.7 万余平方米。北城垣与下城共用一面城墙，距离穿洞河约 280 米。城内现为耕地，地势高低不平，南高北低。东南西 3 面城墙保存较好。原来有 4 处城门，如今都被破坏。在城中保存有“柔远城青龙寺常住碑记”1 通。下城平面为不规则的长方形，城内面积有 7.8 万余平方米。南抵上城北城墙，北距穿洞河南岸约 50 米。下城内如今多为居民房，位于穿洞河南岸一级台地上，南高北低，在西侧与上城连接处有一段残存下城西墙。除西侧与上城连接处有约 5 米长的城墙残存以外，其余城垣均已被毁。

另一种说法是位于贵阳市清镇市站街镇老城村。平面布局呈椭圆形，周长

约4500米，原设东、南、西、北四门，现残存西门及残垣一段。2018年被清镇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民国《清镇县志稿》记载：“谓明制，所有千户，有副千户，有镇抚。威武千户驻威武城。其副千户、镇抚或驻此老乐平、新乐平也。存之以俟识者。”从乐平村发现“柔远城青龙寺常住碑记”而言，乐平村应是柔远所在。

这几个千户所城除了定南所，都是位于山上，尤其是赫声所、濯灵所，地势居高临下，可直接监控鸭池河两岸，但是要作为城市发展，两地在水源和城内空间上都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定南所选址就较为优越，周边平坝较大，能满足城市长期的发展需求，所以能历经数百年后，演变为现代的普定县城。

三、黔中屯堡遗存

（一）贵州的屯堡

明初平定云南后，认为“虽有云南，亦难守也。其从征军士有疾病弱者，每卫每限十人百人，可先遣还”。决定将随征士兵留卫镇守，七分守城，三分屯耕。最开始所置屯堡皆为军屯，后因粮草不足，中央推行开中之法，吸引一批商人入黔屯种，以粮食换取盐引，此类谓之商屯。

据《安平县志》中的记载，一个卫可“分隶五所，列五十屯”，“有事征调，无事屯守，屯田耕种，自食其力”。贵州二十四卫，屯堡不计其数。屯堡的选址一般受限于防御与屯垦两个方面。由于时局不稳，屯堡的选址需要考虑到满足一定程度的防御需求，所以考古队员们看到很多屯堡都是依山而建，位于矮小的山坡顶部，或是山体半坡，或是山脚，以山形地势形成一道自然防线；在此基础上，相应地修筑屯墙、寨门，加上内部规划有序的空间格局，巩固屯堡防御能力。屯垦是屯堡的生活保障，这要求屯堡的选址需要足够便于耕种的土地，所以屯堡周边都有一定面积的平坝。

屯堡的分布主要围绕卫所，考古队员们今天所见安顺、贵阳等地，均保留了大量的屯堡村寨。这是贵州今天能见到屯堡最为丰富、集中的区域。这得益



于黔中地区属于中低山丘陵地带，多山间平坝的环境优势。相比较之下，黔东南潯阳河流域和黔西北等地则十分分散。在黔东南地区，受湖广管辖的镇远、清浪、平溪等卫，其屯堡的分布可至周边州府辖地。今松桃县普觉镇侯溪屯村就曾经是镇远卫中所管辖的屯，在该村发现有明代时期墓地，目前发现共计7座石室墓，均是以加工规整的石板修建，其中一座墓的墓碑上写有“大明国湖广镇远卫中所管下侯旗屯居住”等字样。此外，这些卫所的屯堡甚至远在湖广行省辖境之内。而毕节卫也有这样的情况，明代董其昌所著的《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中记载：“毕节卫之屯堡不在毕节，皆镇雄之土也。层台白崖等驿之马馆，皆镇雄之马也。层台白崖等毕节卫军之本色食米，皆镇雄之毛。镇雄之治乱，利害切于黔而远于蜀。”

（二）黔中屯堡

明代贵州二十四卫，加上改土归流后改置的镇西卫、敷勇卫，黔中贵阳一带即占五席，其密度远高于其他区域。如果参考平坝卫“列五十屯”的情况，那贵阳地区5个卫应约有250个屯堡。贵阳一带曾经屯堡遍布，到今天保留了大量相关地名，其中一部分屯堡保留了部分文物遗存，包括了花溪区青岩古镇、镇山村，观山湖朱昌堡，白云区朱官堡，南明区永乐堡，修文县永安屯，等等，其中以青岩古镇最负盛名。

青岩古镇位于贵阳市花溪区南部，是贵州四大古镇之一。洪武六年（1373）在此设铺和塘，驻军建屯，被称为青岩屯。到天启三年（1623），班麟贵“以土人从征苗”，在第二年被升为指挥同知，于是组织修建了青岩土城，该城设了4个城门。这就是最早的青岩城，后来的青岩城在此基础上进行修建。到了清顺治十七年（1660）班麟贵的儿子应寿将土城墙改建为石城墙。嘉庆三年（1798）武举袁大鹏曾经对城墙进行重修。咸丰年间，赵国树“散家资巨万以筑青岩城”。在明代，青岩屯属于贵州前卫，但其所在的地界属于广顺州。青岩古城东倚大茨窝山，西靠黄家坡，南部为飞云山，青岩河绕城而过。城平面

呈不规则形，城内面积有 30 余万平方米。城垣自东门，跨阁上山、大茨窝山，至南门，经黄家坡至西门蜿蜒北上至北门。到今天，北、东、西门都已经被毁，仅仅保留了南门，也就是定广门。现存城垣长约 50 米。东、南、北门段城垣外原有池濠。城内居中为一广场，有一东西向干道，共计 12 条主街。城内尚有万寿宫、川主庙、书院等明清建筑遗存。2005 年 9 月，青岩古镇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现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观山湖朱昌堡、白云区朱官堡、南明区永乐堡、花溪区镇山村、修文县永安屯都是依山而建，山势不高，日常往来较为方便。山脚为广阔的平坝，为屯垦提供了宽阔、肥沃的土地。这样的地理环境是屯堡的最佳选择。

朱昌堡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朱昌镇金钟村。民国《清镇县志稿》中记载：“明朱昌堡，崇祯十一年。浙江金衢道、黄金钟故里。请准捐资修建，工甚坚固。周约四里，东西二门。此堡原属清镇，贵筑只辖朱昌场坝。因画插花，并堡画去。”原城墙高 7 米。城门上建有木结构城楼。东城楼三层八角，西城楼三层六角，高 10 米。堡内有祖师庙、观音阁等庙宇。门额置一规整青石质石板，长方形，上行横向楷书阴刻“奉部院朱按院冯建”8 个小字，下行横向楷书阳刻“朱昌城西”4 个大字，刻于崇祯十一年（1638）。“部院朱”指时任贵州巡抚朱燮元，“按院冯”指的是时任巡按贵州监察御史冯士晋。古城在 1958 年被拆除，墙体基本已不在，如今均是现代民居。

朱官堡位于贵阳市白云区麦架镇小桥村朱官堡，建于明洪武年间。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加筑“永胜门”，道光十四年（1834）又加筑“得胜门”。城内平面布局呈四边形，占地面积约 1 万平方米。二城门以石砌筑。门洞两侧刻有瑞兽花草图 4 幅，极精美，保留较为完整，至今仍为进出村寨门洞。永胜门是明清时期保存下来的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遗迹，也是明清时期当地屯兵的一个有力见证。2015 年，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永乐堡被当地人称为“竹林寨”“钟上顶”，位于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乡永乐村永乐堡。这是东边洗马河、瓮安等地前往省城贵阳的通道，来往的行人众多。



○
贵阳朱昌堡现状全景



○
贵阳朱官堡现状全景



○
贵阳永乐堡现状全景



○
贵阳永乐堡现存石拱门



据当地传说，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曾经路过此处，所以将此地改名永乐堡。该堡建于永乐年间，以石块砌筑寨墙，之后经历了几次维修。其平面布局呈椭圆形，占地面积约 7.8 万平方米，分内外两城，均设东、南、西、北四门。如今现存 4 个门址，另有石墙数段，总长 4750 余米。北门保存较好。早年永乐堡辖 18 寨。清同治末年（1875）焚于战乱。光绪元年（1875），朱、梅、李、余、芮、包、陈七姓重建城堡。光绪三年（1877）于城内坡顶上重建玉皇大殿。民国年间，大殿改作永乐中心小学。2019 年，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八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镇山村位于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地处花溪水库北岸。村寨分为上、下两寨，总面积有 3.8 平方千米。上寨即为屯堡，保存屯墙，青石砌筑，长 2000 余米。设南、北二门并建有门楼，现存北门、南门及 1600 米长的石墙，屯墙围合之中，民居密布，多为三合院木质结构。下寨因水库修建而搬迁。据《李仁宇将军墓志》记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廷平播之际，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协镇李仁宇奉命入黔，屯兵安顺。后移至石板哨镇山设堡屯守。原配病逝后，与镇山班氏婚配，长子姓李，次子姓班。1993 年，镇山村被批准为“贵州镇山民族文化保护村”；1994 年，设立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1995 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 年 1 月，被认定为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永安屯筑于洪武年间，位于贵阳市修文县龙场镇龙冈路北侧龙冈山南麓，现在只保存了长约 50 米的石墙，但重要的是保留下来了一块“永安屯”碑，上面竖向楷书阴刻“永安屯”3 个字。

附记：考古随笔

在贵阳贵安考古工作开展的 70 年间，贵州考古人在这片土地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通过出土文物“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也涌现出许多感人、有趣的考古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些仍活跃在贵阳考古一线，有些已经退休，甚至有些已与世长辞。考古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考古人也同样被时间公平地对待着，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代考古人都在他们自己的历史坐标点上青灯长卷、孜孜以求。时至今日，贵阳贵安特色文化的挖掘、研究、阐释，贵阳贵安完整历史编年的建立，离不开每一位考古人的辛苦付出。可以说，他们存在的价值，就是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更了解自己脚下的土地。



寻她千百度·考古调查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招果洞遗址的发现

考古学是以古代的实物遗存研究为基础，旨在构建历史发展脉络，复原古代社会的学科，浪漫一点的说法，考古学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科，考古人则是时间轴线上的旅人，他们用手铲叩问着脚下的黄土，每一次考古工作，都是一次在时间的逆旅中和古人的对话。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足可以改写和重塑历史，使考古队员们对过去的认识更加接近真相，招果洞遗址就是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考古发现。

贵安新区是2014年1月6日国务院同意设立的第8个国家级新区，从设立之初就被寄予厚望，赋予了西部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生态文明示范区、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重要功能。作为一名考古人，从2012年开始在贵安新区开展考古工作至今，目睹了贵安新区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到高楼林立、路网纵横的发展过程，这片古老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其背后是高瞻远瞩的部署，是苦干实干的拼搏。如今，厚重的历史、秀美的山水、便利的生活、前沿的科技在这里融为一体，人文、自然、科技在这里和谐共生，互为倚助，也有考古人的一份辛勤和付出。

自2012年牛坡洞遗址启动考古发掘以来，考古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连续耕耘了12年。从牛坡洞遗址、招果洞遗址到大松山遗址，考古队员们一路走来，用一件件石器、一根根骨锥、一块块陶片构建起了贵安新区4万多年迄今近乎完整的人类活动史。为文化寻根，为发展寻脉，12年的贵安新区考古工作将成为贵州考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贵安新区洞穴遗址考古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全省发现和确认了数百处洞穴遗址，在贵安新区原属贵阳市花溪区和安顺市平坝区（原平坝县）范围内都有几处洞穴遗址，牛坡洞遗址是其中之一。2013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贵安新区建设进行第一阶段的文物摸底，又发现了30余处洞穴遗址和一批历史时期墓葬，这些洞穴遗址的年代从旧石器时代延续至商周时期。

2015年7月，我刚刚从中科院古脊椎所硕士毕业回到贵州，也是从那年开始，正式负责贵安新区洞穴遗址考古工作。当时牛坡洞遗址已经由中国社科院主导开始发掘工作。当时我的工作思路是首先对贵安新区的所有洞穴遗址进行逐一核查，评估每个遗址的工作潜力，选取具有较大工作潜力的洞穴遗址进行发掘。但对所有的洞穴进行核查评估后，结果让人大失所望，数量庞大的洞穴遗址中，仅有部分洞穴遗址具有一定的考古发掘潜力，且远低于已经开始发掘的牛坡洞遗址。洞穴遗址和其他类型甚至晚段的遗址不同，由于其精细的发掘工作要求和多学科高度融合的时段属性，发掘和研究周期更长，一旦开始发掘，就要至少用几年时间来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所以在选择洞穴遗址做进一步考古发掘时，必须慎之又慎。

我在贵安新区的洞穴中就这样兜兜转转了半年，食之无味、弃之不舍的鸡肋心理，是我当时的心境写照。这期间也并非全无收获，先后试掘了3处洞穴遗址，获得了一些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其中一处是位于目前贵安新区综合保税区附近的大岩洞遗址，一处是位于贵安新区普贡村的张口洞遗址，一处是位于贵安新区马场镇鱼雅村的大花洞遗址。大岩洞遗址的年代应该为新石器时代至



商周时期遗存，出土的石制品中，水晶占比极高，整体尺寸偏小，出土的动物骨骼也以小型哺乳动物为主，遗址相对高程很小，文化层整体堆积不厚，推测应该是个史前临时的居住营地。张口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数量不多，但是石制品中工具比例很高，且加工十分精美，应该也是一处临时营地，古人在这里临时休憩，并未在这里长时间居住，也并未进行石器的加工。大花洞遗址的骨器十分精美，伴出技术成熟，据出土的质地较硬的薄陶片推测，年代应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

2015 年的后半年，我的足迹踏遍了之前发现的所有洞穴，虽小有收获，但不能让人满意。在徘徊和遗憾中，2015 年就这么过去了，可能是太急于找到一处科研潜力巨大、可以长期开展研究工作的洞穴遗址，我总感觉这半年过得太快了，时间总是不够用。

2016 年 3 月，百花吐蕊，万物复苏，在那浓浓的春意里，我和其他的考古队员们开始了贵安新区洞穴遗址调查工作。这次调查队伍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3 家单位的青年业务骨干组成。整整 1 个月的时间，调查队伍穿行于贵安新区的高山坝子之间，核实了百余处洞穴遗址。这次调查除了摸清贵安新区的史前文化家底，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一处具有考古工作潜力和重要学术价值的洞穴遗址，解决黔中地区持续困扰学术界的学术问题。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调查队伍在人员配备上做了优化，覆盖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石器技术等各个领域，基本上抽调了上述 3 家单位中青年的学术骨干，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对洞穴遗址的学术潜力做出准确的评估。

经过近 1 个月的调查核实，虽然发现的洞穴遗址数量众多，但大多数情况并不乐观。不同的洞穴遗址由于自身资源禀赋不同，在古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同。这是因为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还处于纯粹从自然界攫取资源的阶段，对周边资源的高消耗决定了人类的高流动性，在资源攫取和生态恢复之间，不停变换自己的居所。基于对黔中地区古人类遗址分布规律的初步认识，可以

判断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存在一些极其适宜人类生活的洞穴，人口流动的同时，又会在这些洞穴中频繁居住。这些人类居住相对固定的洞穴，往往保存着大量人类活动的信息，是考古队员们破解史前社会的一把钥匙，考古队员们试图寻找的就是这样的洞穴。

在调查工作接近尾声时，考古队员们将视野聚焦在高峰镇岩孔村周边，地图显示这是一处南北走向的长条形坝子，有一条河流从坝子中间蜿蜒流过，当地人称之为麻线河。河流阶地宽阔平坦，周边山体洞穴发育。从地貌判断，在史前时期，这是极其适宜人类活动的自然环境。考古队员们所携带的地图一般都会将比较大的洞穴进行标注，根据调查惯例，考古队员们对地图上标注的洞穴逐一进行了核实，虽然采集到燧石制品、陶片等少量的人类遗物，却与考古队员们的期望相去甚远。“不甘心啊！这么好的环境！”一位考古队员感叹道。这时考古队员们看到岩孔村村部所在的楼房边，聚集了一群晒太阳的老人在聊着家常，这就是每个村寨的“信息中心”。何不去“信息中心”打听一下。

“信息中心”以老年男性为主，年纪基本都在70岁上下。我拿出一盒烟散给大家，向他们打听起当地的山洞。在听完我的描述后，有一位当地的老人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在养鸡场后面有一个洞穴，很符合我描述的特征。

费了一番周折，在这位老人的带领下，我们终于进入了这个被称为牛洞的所在。在距离洞口不远的地方，我们一眼就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堆积剖面，那清晰的层位、丰富的遗物和用火产生的炭屑烧土，都显示这是一处人类活动十分频繁、研究价值十分重要的史前洞穴遗址。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在给遗址进行命名时，我们了解到，当地的自然村名为“招果”，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布依族村寨。“招果”一词在布依语境中的意思是“等待”，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词汇。一个等待万年的古人类遗址，碰上了一群在时光中逆行的旅人。考古队一致同意，将此洞命名为招果洞。

经过5年的考古发掘，深达8米多的文化层，以及出土的众多丰富重要的



招果洞遗址发掘现场照

文化遗物，将贵阳贵安的历史往前推至距今 4.5 万年。因其重大价值，2021 年，招果洞遗址入选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随着媒体的广泛宣传，招果洞的知名度迅速提升，逐渐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古人类遗址。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称为考古界的“奥斯卡”，是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每个年度举行的评选活动，该活动综合考虑考古发掘质量、发掘方法和考古发现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从全国当年发掘的数百项考古项目中选出 10 项，作为当年度的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13 日，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招果洞遗址从 20 个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获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成为贵州考古历史上第7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遗址。

评选结果公布当天起，按照贵州省委宣传部的指示，中央驻黔新闻单位、贵州省内各新闻单位迅速响应，高度重视，对招果洞遗址现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工作情况组织采访，陆续推出如短视频、音频、长图、直播、VLOG、720° VR手绘等多角度、全方面、立体式亮点报道，掀起对贵州考古成绩的全网推送、全媒报道的宣传热潮。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4月20日，各级媒体共刊发、转载稿件17300余篇。报道带动以#招果洞遗址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招果洞遗址揭秘4万年前古人类生活、#4万年前古人类的菜单都有啥等为代表的微博、微信、客户端话题达成百万级阅读量。

2022年6月1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推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探寻文明根脉 筑牢自信根基》专题节目，点赞了贵州招果洞遗址重大考古发现。该节目报道了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推动下，考古工作者扩大视野，从贵州招果洞遗址发现种类丰富、磨制精美的骨角器，以此为代表的我省考古工作成果，为科学阐释中国境内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关键问题，提供了珍贵实物证据，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招果洞遗址成为贵州目前唯一一个登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考古项目。

2022年7月22日，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新时代文物工作的22字工作方针，即“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根据工作方针，考古队员们对招果洞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已经启动，未来考古队员们将按照总体规划、逐步推进的工作思路，做好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利用工作，建设招果洞考古遗址公园。

史前洞穴遗址在全国范围内不乏保护利用非常成功的先例，如北京周口店遗址、桂林甑皮岩遗址、三明万寿岩遗址等，这些遗址不仅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还成了展示、体验本土灿烂史前文化的重要场所，成为本地重要的文化名片。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招果洞遗址公园建成后，普通游客可以在招果洞遗址公园深入了解招果洞先民们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适应策略。4万多年以来，他们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路上，筚路蓝缕，生生不息，延续着人类的种族和文化。

（执笔：张兴龙）

卧牛吐宝，追溯万年 ——牛坡洞遗址的发掘

贵州位于我国西南腹地，属于中国西南高原山地。区域内岩溶地貌发育，存在大量天然岩溶洞穴，其中有很多洞穴都成了古人类天然的庇护所。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旧石器时代以来的洞穴遗址 500 余处。如果从 1965 年裴文中率队赴黔西观音洞发掘算起，贵州洞穴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已经走过近 60 年的风雨历程。在此期间，有大量洞穴遗址经过考古发掘且取得重要收获。这些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于认识我国旧石器考古学文化、现代人类起源与扩散、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人类活动及贵州地区史前早期文化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对认识我国多元一体文明化进程的史前渊源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也奠定了贵州洞穴考古在国内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地位。尽管贵州洞穴考古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仍存在一些未解之惑，需要后来人全力以赴，继续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一队（下文简称“华南一队”）长期在华南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华南一队早前在广西地区的考古工作已取得重要的收获，并陆续将考古界十大考古新发现、田野考古奖等几乎所有相关奖项收入囊中，因此凭借深厚的科研实力、精湛的田野考古技术水平、开



—○—
筛土

阔的学术视野等，在学术界颇有盛名。时任队长傅宪国先生，有心将考古工作进一步扩展至周边地区，特别是贵州地区，希望探索广西、贵州地区的区域文化关系。古代，特别是史前时期，没有类似现在一样的高速公路、铁路系统，河流水道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顺流而下，或者逆流而上，就是彼时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贵州地处高原地区，境内如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都柳江等多条重要河流先后流往广西。逆流而上，探索两地之间的史前文化交流，自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适时，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方面也有心邀请傅宪国先生在贵州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以探索贵州地区的史前文化。因此，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在贵州开展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等专题工作的合作意向。

华南一队 在贵州地区的洞穴考古，可谓是一次美丽的意外。实际上，华南一队进入贵州地区开展工作的初衷，首要是希望探索贵州、广西之间的区域考



古学文化交流，先期的计划是在北盘江流域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这一学术目的实际上是有着丰富的文献基础和学术准备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有云，“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又云，“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大意是夜郎临近牂牁江，江面开阔，可以船运，向下游一直可以通到番禺城下。贵州被认为是夜郎故地，番禺即今广州地区，也就是说，贵州的牂牁江可直通广州。有学者就认为牂牁江很可能就是现在的北盘江。北盘江下游与南盘江汇合之后，称红水河。红水河与柳江汇合后，始称黔江，在接纳郁江之后，又改称浔江，再与桂江汇合后，就是西江，也就是珠江的主要支流。恰在此前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本建设，已经在北盘江流域开展了多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故在北盘江流域开展合作考古工作已具备较好的学术基础。2010年前后，傅宪国先生即开始率领联合考古调查队在北盘江流域进行调查，并初步选择多个具备发掘潜力的遗址。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华南一队在贵州的考古计划旋即被纳入该项目并获充足资金支持。同时，美丽的意外也随之而来，同年11月，华南一队一行抵达贵阳，拟与贵州同行组建联合考古队。当众人还憧憬北盘江流域考古前景时，时任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负责人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即贵州的洞穴遗址数量多，更具工作前景，希望能首先在黔中地区开展洞穴考古工作，为未来贵州考古打开新局面。虽然黔中地区洞穴遗址繁多，但是多年以来贵州考古的前辈学人已经开展了大量相关工作，并积累了大量资料，作为贵州考古“新生”的华南一队能否取得新的突破，实际上傅宪国先生并无十分把握。

适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束不久，黔中各地对洞穴遗址的发现情况、保存情况比较了解。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飞、张合荣等先生，建议首先从工作基础比较好的安顺市平坝县（今平坝区，后同）开始。著名的飞虎山遗址即位于该县，保存有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进行发掘，但受技术发展的限制，多少还存在一些遗憾。实际上，李飞等先生希望华南一队发掘飞虎山遗址，期望产生类似华南一队重新发掘桂林甑皮

岩的效果。后者在 2001 年重新进行发掘，取得了重要学术收获和社会效果，被誉为“华南史前考古的明珠”，此后建设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确定工作区域之后，张合荣先生与平坝县方面联系，并全程参与考古调查。联合考古调查队在平坝县受到热情欢迎，县文化局局长安排县文管所的文应峰所长予以配合。文所长无私地提供“三普”资料。在平坝县期间，联合考古调查队冒雨工作，除了复查飞虎山遗址，在一周的时间内，合计调查数十处洞穴遗址，以至于考古队员们不是在山洞内，就是在爬山洞的路上。由于受自然、人为因素的影响，多数洞穴遗址保存状况不佳。尽管如此，仍筛选出马场镇的牛坡洞、高峰镇的狮子山南洞和飞虎山 3 个遗址。前 2 个遗址属于考古队员们调查认可的遗址，第 3 个属于“无奈”的选择。从调查情况来看，无论牛坡洞还是狮子山南洞，保存状况均不佳。前者洞内上部已有将近 1 米的文化堆积被破坏，后者洞内也有大量基岩裸露，但是“短中取长”，也得做出选择。此时，牛坡洞的真实“威力”，尚未暴露。

选择牛坡洞作为第一个发掘项目颇有戏剧性。2012 年，拟计划对前述 3 个遗址先后发掘。其中，牛坡洞遗址距马场镇约 5 千米，而狮子山南洞距高峰镇 1 千米左右。当时考虑到生活的便利性，希望选择靠近镇中心的遗址，即狮子山遗址首先发掘。但是在上报发掘计划的时候，误认为牛坡洞遗址距镇中心更近，牛坡洞遗址遂成为首选，由此开启了对牛坡洞遗址长达近 10 年的考古发掘。

牛坡洞遗址是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由平坝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发现，并在现场采集到了少量文化遗物。2011 年，在对牛坡洞遗址的复查中，于遗址上见到石器、陶片、兽骨、螺壳等遗物。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大家还是认为其可能是保存状况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牛坡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原属平坝县）平寨村龟山组东约 0.2 千米处的牛坡，即位于新成立的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的城市核心区。东北距贵阳市约 40 千米，北距马场镇约 5 千米，西距猫跳河支流马场河约 0.8



千米。牛坡是一座东西走向的石灰岩孤山，形似一头卧牛，故得名牛坡。东西长约0.5千米，南北宽不足0.2千米，山顶比较平坦，岩石大量裸露，植被稀疏。遗址由A洞、B洞和C洞3个地点组成。A、B两洞位于牛坡东麓，A洞位于北侧，洞口朝向东北；B洞位于南侧，洞口朝向东南；C洞位于牛坡西麓，朝向西南。在2009年和2011年的两次调查中，仅在A洞发现有文化遗物，B、C洞是在此后的正式发掘中经试掘确认。A洞洞口部分为宽敞的洞厅，宽约8米，进深3~7米，洞内上部堆积受到后期破坏。B洞保存完整。A、B两洞前为水稻田，田下亦有文化堆积。2012年春，即第一次正式发掘前不久，当地村民在田内取土，对遗址边缘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并在A、B洞前形成一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水塘。同时，为了取土，在洞口外靠近山脚部分开辟便道，



○
水洗土样



提取植硅石和孢粉样品



套箱提取墓葬



亦对遗址上部堆积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遗址洞外堆积仅在 A 洞靠近洞口部分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原生堆积；B 洞口外，靠近山脚部分，上部因修路遭到破坏，洞内及洞外靠近洞口部分原生堆积保存较好；C 洞完整地保留了原生堆积。

2012 年 10 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一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坝县文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始对牛坡洞遗址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由于 A 洞洞内堆积上部后期破坏严重，根据洞壁残留的迹象判断，推测约 1 米的上部堆积已经被破坏殆尽。因此，联合考古队对遗址洞内残留文化堆积的保存情况并不乐观，以至于最初计划用 1 个月就完成发掘任务。然而，遗址文化堆积的丰富程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最终联合考古队花费了 9 年的时间对遗址进行发掘。

联合考古队于 2012 年进驻发掘现场，恰逢遗址边缘新遭破坏不久，一片



鉴定测量 AM1

狼藉的现场在雨水的冲刷之下，暴露出了大量细小燧石制品和兽骨，表明遗址的丰富程度远超想象。为了尽可能全面地采集遗址资料，联合考古队花费多日筛选地表散落的遗物。尽管如此，每逢下雨，仍能在地表发现文化遗物。

2012年的发掘在B洞确认文化堆积厚达3米，除了发现大量打制石制品外，还在遗址上层发现有数量不菲的陶片，但最重要的发现是在B洞口外左前方邻近山脚处的墓葬区发现了4座墓葬。这是本地区洞穴遗址中首次集中发现墓葬。可惜4座墓葬已经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2012年度的发掘合计发现各类型石制品上万件，陶片数以百计，以及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进一步确认了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

牛坡洞遗址的首次发掘，首先从地层上确认遗址文化堆积自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其次，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重要指标的陶器在遗址地层中阶段性分布的特征明显。最后，早期墓葬、灰坑、用火遗迹等的发现大大丰富了遗址的文化内涵。但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遗址的年代下限是什么时候？是否存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农业何时出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特点是什么？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面貌和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本地区考古学文化和周边地区的相关文化是否存在交流交往？

正是由于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一开始就带着明确的学术问题，且在发掘过程中又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加上遗址丰富的文化堆积，使得牛坡洞遗址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取得了大量重要收获，并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

鉴于牛坡洞遗址的重要意义，2017年先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评选为2016年度中国六项考古新发现，被中国考古学会和文物报社评选为2016年度全国十项重要考古新发现；2018年获田野考古三等奖；2021年荣获中国考古学会评选的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执笔：付永旭）



寻觅古人的痕迹

——大花水水电站调查

2004年春季的一天，在贵州省考古所三楼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刘恩元老师办公桌上放着的一大包铜饰件、蓝绿色料珠、穿孔海贝、陶片等文物时，好奇它们的来源。刘老师告诉我，这些东西是开阳县平寨村的村民小莫在当地的几个岩洞中捡到的，他觉得这些应该是很重要的文物，便不辞辛劳地送到考古所来。刘老师在和小莫打招呼时才发现他的一条腿不方便，是小时候因小儿麻痹形成的后遗症，顿时大感辛酸，也鉴于他对于古代文物浓浓的爱护之情，所里安排车辆派刘老师同小莫一起去高寨乡调查发现文物的洞穴。而我因为其他工作的原因，未能同行，心里不免有些遗憾。

或许是同这批文物的缘分，仅仅半个月左右，所里安排刘老师带着翁泽坤、我、赵红坤、陆永富同开阳县文管所何先龙所长对大花水水电站施工区和库区进行考古调查。何先龙所长也是老文物人了，他对于水东宋氏土司的典故、事迹和现存遗迹了如指掌，只要一谈起他感兴趣的话题就滔滔不绝。考古队员们居住在高寨乡政府所在的平寨村，每天由赵师（赵恩春）开车送进大花水水电站所在的顶驮组附近进行调查。考古队员们先在贴近河面的岩壁处发现了梯子岩岩画，作为新发现的开阳画马岩岩画群的成员，它地处靠近河谷被当地村民称为旋水湾的一处悬崖崖壁上。在岩画的下面有一个不大的石平台，应该就是当年绘画岩画时人们所站立的地方。岩画画面的主体是一位巨大的人像，高74厘米，宽47厘米，腰部宽18厘米，呈直桶状，两脚之间间距约10厘米，手中还牵着一只类似狗的猛兽。后来研究岩画的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巫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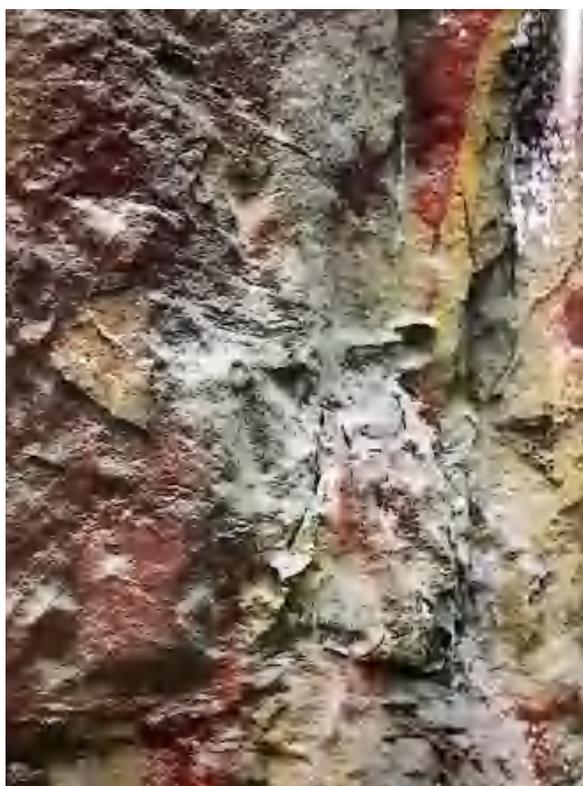
形象，他在崖壁上顶天立地，周围包裹着虎、鸟、鹿及大小不等的圆点，或许表现了在神奇且无所不能的巫师的庇护之下，部族能够战胜强大的猛兽而获得丰裕的收成。或许当年梯子岩下有着原始部族的先民们用各种祭品来祭祀这位伟大的巫师，用那苍凉的歌声在述说着生存的不易，但在今天已经化作遥远历史中的一抹回忆。梯子岩道路和平台之间有着一定的空隙，为了近距离观察和拍摄岩画，赵红坤背着摄像机，轻轻松松就跳到了平台上，我却不敢跳过去，毕竟下面就是近乎垂直的崖面，只能把相机递过去，请他略加拍摄。之后考古队员们沿着河谷向上攀爬至垭口处，这里就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开阳画马岩的大岩口岩画的所在地。气喘吁吁的考古队员们在休息了很长时间后才起身去欣赏这千年前人类在岩壁上留下的痕迹。它和梯子岩岩画的内容大不相同，多为太阳、不知名兽类、马及一些圆点，也有狗和骑马人的形象。赤红色的赭石在



开阳画马岩大关口岩画之一



梯子岩岩画
的猛虎
形象



梯子岩岩画
的人像

岩壁上留下的画面历经千年依然如新，宛如昨天刚画上。在大岩口岩画崖壁上还刻有一些汉字，如“道光十三年，泰山石敢当”等，这些应该是稍晚的东西吧。还有一处位于小岩口的岩画考古队员们没有去，据说那里除骑马的人之外还有鹤和驾鹤飞天的人，考古队员想或许是先民们想表现出仙人的形象吧！在调查了几处岩画之后，考古队员们下到顶驮组所在的苗寨，跟村民询问后确定了在半山腰的围坡田有一些洞穴，洞穴内早年有古墓葬，可惜已经被毁掉了。考古队员们来到洞内，确实没有发现墓葬痕迹，但地面有残留的棺板、料珠和骨簪，便确定它是一处岩洞葬。

在么罗寨附近调查时，随同考古队员们一起调查的小莫告诉考古队员们在寨子的后山有一处不大的洞穴，在向寨子外的村民打听情况时村民告诉考古队员，他们手上还有一些宝贝，这也是考古队员们感兴趣的东西。待村民把这些东西拿过来，才发现也不过是一枚南明李定国的兴朝通宝，以及两三枚乾隆通宝，时代和东西是让人大失所望的。但是之后调查么罗寨后山的洞穴时感觉还是颇有收获，虽然洞口倾斜坡度大，还好洞口边多是小灌木，凭借它们还是努力地爬到了洞口。这次的洞穴比较小，洞内地面上铺满了棺木的碎片和陶片、料珠、碎骨。站在么罗寨洞的洞口处，远眺清水江的河谷，风景很美，距离这里不远处还有一处岩洞葬，可是望着那接近90度的小孤峰，没有什么安全措施的古考古队员们还是明智地放弃了攀爬的念头。

在清水江河谷中发现了梯子岩岩画和几处岩洞葬之后，为确定是否有早期的史前遗址存在，所里就邀请曹泽田来到考古队员们调查的顶驮组一带看看（因为曹波老师的缘故，正好曹泽田老先生在考古所和王燕子老师一起整理打儿窝遗址出土的骨器、石器），沿着清水江峡谷么罗寨一侧向围坡田洞方向前进。曹老先生是贵州资深的文物工作者了，是贵州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大家，1957年同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胡承志先生一起在兴义顶效绿荫调查时发现了一批小型爬行动物化石，即后来的“胡氏贵州龙”；1972年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森水先生、吴茂林先生在桐梓岩灰洞试掘，出土了2枚人类



牙齿化石、12件旧石器及烧骨等重要遗物；1975年在兴义市发掘了猫猫洞遗址；1979年调查发现安顺市普定穿洞遗址，在穿洞首次发现贵州第一个古人类头骨；撰写了《猫猫洞旧石器之研究》《我国古人类文化宝库——穿洞遗址》《贵州水城硝灰洞旧石器文化遗址》等文章。当时和考古队员们一起调查时他已经退休多年，但是在山间小道上行走的时候依然健步如飞，考古队员们都追不上他，这也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和曹老先生一起出差。

这些在顶驮组发现的文物点其实都在早年发现的画马岩岩画遗迹的下面，但是这批岩洞葬和岩画是否有关考古队员们已不得而知了。且这一区域并不是考古队员们认为的同外界隔绝的地带。在后来的调查中，考古队员们又在平寨村的南侧一山洞中发现了一处岩洞葬，可惜的是洞顶有大量的碎石塌陷砸在棺木上，让它们支离破碎。怕碎石继续掉落，考古队员们也不敢到洞内实地踏勘，只是在洞口观察棺木造型，其造型类似于现代的棺木，因此考古队员们推断这个岩洞葬的年代晚到清代，可见这一片地域的岩洞葬具有一定的传承，至少清代还在使用它。在河谷中，考古队员们还发现有着古建筑和古代驿道、驿亭及光绪二十年（1894）的渡口碑。可见，在明清时期，这片区域也是贵阳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之一。

对于人类而言，河谷地带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在调查中，无论是多么幽深的峡谷中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有古代的遗存，也有更多的现代的建筑。在调查中，通过询问几个小孩后知得，他们上课需要到乡政府的所在地去，没有住校的他们则每天来往于家和学校之间，往往需要两三个小时，小孩子们来往匆匆的求学生涯或许表现出中华民族对于文化的追求。调查期间，在开阳县龙冈镇大荆村小学内发现的道光十年（1830）的惜字塔，则是中华民族对文化载体的另一种珍视表现，通过“惜字”的行为来表现对文化的重视。之后，调查队伍告别贵阳市，进入了黔南州，直至完成对整个大花水水电站施工区和库区的文物调查。

（执笔：胡昌国）

翻山越岭来找你 ——贵安新区考古调查纪实

地处黔中腹地的贵安新区，地势平坦、地理位置优越，距今若干万年前，即是古人类劳动、生息、繁荣的重要场所。当世界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芜的时候，这里已是生机勃勃。贵安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于贵州其他地区独特的文化面貌。贵州发现的魏晋至南朝时期的考古材料目前仅有赤水崖墓、松桃悬棺、董箐电站、平坝马场4处；而唐代考古材料，只有马场唐宋墓1处而已。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贵安新区古文化遗址点的分布情况，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

2013年主要对马场境内的文物进行调查。调查工作历时30多天，取得了重要收获。在马场境内共发现了各类文化遗产71项（含地下文物40处、地面文物27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其中地下文物包括史前至商周时期的洞穴遗址28处、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和遗址4处、唐宋至明清时期的遗址和墓葬7处、近现代墓葬1处；地面文物包括洞屯及营盘遗址9处、寺庙2处、村落文化景观7处、古井古桥古塔及碑刻9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苗族夫妻舞、布依族“六月六”等4项。

2016年3月中旬至4月初，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队对贵安新区除马场镇以外的其他乡镇进行系统的考古学调查，主要调查史前洞穴遗址。在高峰镇、湖潮乡、红枫镇、党武乡境内都发现有史前洞穴遗址。此次的调查工作队伍庞大，主要分为两个分队。一个队由成都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何锟宇及贵州省考古所的研究一



考古人员在贵安田野调查工作照

室主任张兴龙负责，一队由四川大学考古系吕红亮教授负责。在此次调查工作中，新发现 20 余处史前洞穴遗址，其中高峰镇岩孔村的一个叫招果洞的遗址堆积非常好，从清理的剖面来看，该洞穴的文化层堆积至少有 6 米厚，最下层年代至少距今 3 万年。在清理剖面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们采集到上万件石制品及大量的动物骨骼和骨器。

在此次的调查工作中，由于正处初春，冬日的寒意还没有完全褪去，夏日的炎热也遥遥无期，天空时而飘着毛毛细雨，时而狂风大作，由于现在贵州地区农村大部分人员都在外打工，所以调查工作大部分时候并没有民工，只有自己挖剖面。加上 21 世纪初的退耕还林政策，使得有的洞穴周围植被非常茂盛，部分洞穴要花上几个小时用去开路，原来的路由于长时间无人行走，大部分都被荆棘灌木封死。尽管这样，考古队员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有史前人

类居住过的洞穴。

老乡是很热情的，考古队员们在调查的时候，问他们：“你们这有山洞吗？大不大，洞口距平地低不低？”老乡很热情地回答：“有啊，以前有人在住过呢。洞里面平得很，我带你们去看看。”然后考古队员们就问：“远吗？”老乡说：“不远，最多10分钟就到了。”然后老乡在前面带路，考古队员们就跟着他走。翻过一座山，我问：“到了吗？”老乡说：“翻过这座山就到了。”随后又翻过了一座山，路由于长期无人行走，很窄。路边全是荆棘，甚是扎人。最后又翻过了一座山，终于在另外一座山的半山腰上看到了这个洞口，然而洞口位置并不像老乡说的那样距平地很低。考古队员们费了很大劲爬上洞口，发现洞内也不大，洞内有解放前当地居民在此躲匪居住留下的石磨等。由于这个洞穴的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何锟宇老师操锄挖剖面



地理位置并不是很理想，洞口也比较小，考古队员们在洞口挖了好几处地方也没有发现石器陶片等遗物，但考古队员们还是对老乡表示了感谢，临走时老乡还让考古队员们去他家里吃饭。由于天还没黑，考古队员们还有时间多跑一个洞穴遗址，所以便谢绝了。

在野外的工作有时候很有趣，但有时候也很辛苦，对于在城里长大的人来说，考古调查这种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工作模式，很多人都适应不了。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城里长大的人出于对考古的热爱，从事着这份自己喜欢的事业。女孩们都是爱美的，有时候胆子也比较小，但是在野外工作的时候，女生顶着烈日，并不怕被晒黑，跟男生一样跋山涉水，打狗问路。很多时候，由于调查的地点距离乡镇很远，午饭就由司机开车去乡镇上给考古队员们每人带一盒炒饭，其中尤以糟辣椒蛋炒饭最受欢迎。

尽管困难重重、条件艰苦，但是新发现的一处处遗址带给考古队员们的乐趣是无穷的。考古队员们翻山越岭，只为寻找人类曾经留下的足迹。

（执笔：朱梅）

手铲释天书·考古发掘

大松山考古记

2022年12月15日，在完成了赤水地区某基建的文物考古调查后，我被调去贵安新区的大松山墓群帮忙发掘。

刚去大松山墓群参加发掘时还是很激动的，因为真的“好多人啊！”考古队员们在贵州干田野一线的，经常是两人一组做调查和发掘工作，一下子来到一个有4所高校助力、几百号人工作的大工地，在我进贵州省考古所的近10年间也仅此一次，激动的心情不言而喻。

上工第一天，工地同事胡老师和韩东先带我参观了库房和工地，熟悉文物特点和遗址环境。看着从7月开始就陆续出土的各类文物，我很是羡慕，遗憾没能早点来和同事们一起战斗，又高兴还能赶上个“尾巴”参与。大松山主体范围内的墓葬虽然已经基本发掘完毕，但是其中数量最多的坟坝顶区域的墓葬群还需要攻坚，而且绝大部分墓葬已经在同事韩东、韩建军（下文简称东哥、军哥）等常驻工作人员的努力下通过刮面找出来，并用白色喷漆画出了轮廓。打眼一看，密密麻麻的，少说也有1000座墓葬。工地现场也是一片热闹的发掘景象——北边是川大白彬老师亲自带着几十个学生在攻坚面积最大、最复杂



墓葬清理工作照

的区域，东边坡顶范围由中大和我们单位的考古队员史恣负责，中心半坡区域是东哥带着毋静帆、王静寂、张锦华在做清理，南边由北大负责，我要负责的区域则刚好在他们下面的坡脚位置，而刚赶来的同事董州和韩文华则将要负责坟坝顶的西南角。

眼看着这发掘盛况，耳边听到东哥介绍说要在春节前完成坟坝顶墓群的发掘任务，我猛然一惊，春节在次年1月22日，这已经12月了，要赶在春节前将剩下的大部分墓葬清理出来，“这……咋挖啊？！”我问东哥和胡老师，他们说第二天有贵州民族大学的学生来帮忙，过两天同事许国军也会赶来支援，和我一起带这群学生。我听完稍稍松口气，呵呵一笑说没问题，毕竟都带过好几拨实习学生了，几个学生还是好带的。

第二天到了工地后发现我天真了，原先预想的几个学生变成了11个学生，他们分别是李晴晴、张文芳、周英琪、田光猛、王吉才、严再雨、吴彩莉、王健、陈美娜、李想、禹贵强，都可以组支足球队了。这支“足球队”里的大多数同学之前完全没有实习经验，所以要从识土→找边→发掘→拍照→绘图→建模这些步骤一步步来教。不过好在东哥他们提前把墓葬范围标记清楚了，我只要带

学生们明白一些基础的入门知识就行了。而且同学们大多认真好学，工地上肆虐的寒风和低温也没有阻挡他们学习的热情，带学生的第一天就让我收获了1万多的步数和沙哑了的嗓子。

考古队员们负责的发掘区位于坟坝顶地势较低的区域，算下来也就200平方米左右。这片区域大部分都是土坑墓，只有极少数的石室墓。按理来说考古队员们前期清理工作只要根据已经画出的白色轮廓的指示向下发掘就行，但是复杂的地方在于，这些墓葬的打破关系特别复杂，甚至有的是十几座墓中三三两两之间有打破关系，像一串鞭炮一样。清理的时候必须要搞清楚他们的打破关系，而且谁挖了其中一个，为了记录资料的方便必然得将剩下的墓全都发掘，刚下工地的学生必然完成不了此复杂的情况，只能等学生们出了“新手村”再带他们来打这个“大BOSS”，现在只能先带他们挑单个简单的小墓清理，攒攒经验和能力值。刚开始这样给同学们介绍，听起来很像打怪升级一样，这种类似游戏的挑战感让同学们一个个都摩拳擦掌，特别是几个男同学都挑了面积大的墓葬，想着肯定有陪葬品，可以快点出“新手村”。女孩子们相对就比较矜持，挑的也是秀气点的小墓。结果是一开始男生们挑的大号的墓没发现陪葬品，而两个文静的女生挑的小墓反而有了发现，男生们就哀叹手气差。这样的状态持续两天后就有了改观，因为有陪葬品的墓要进行更加细致的清理，所以进展缓慢。没有陪葬品的墓葬反而很快进入了绘图、拍照阶段。清理完毕后，又选了新墓进行发掘清理，每个人也逐渐挖到了有陪葬品的墓。

随着学生们发掘工作的推进，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仅是给学生们指导前期清理工作就已经分身乏术，好在离东哥负责的片区近，看见旁边片区小毋、小张、小王忙碌的身影，厚着脸皮把他们拉来帮我指导学生们拍照建模。在此真要感谢3个女孩子的帮助，忙自己工作的同时还来帮我带学生，比心。

发掘工作热火朝天地进行了几天后，请假的民工开始增多，听说是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仔细一观察发现，北边川大区域人数也减少了好多，原先几十个学生减少到了只有几个。后来才知道川大片区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倒



了一拨人了，只不过我在忙着带学生没注意到，民工也有好多因感染请假。而两拨考古队员的距离只有50米，只能叮嘱大家都戴好口罩，注意保暖，别轻易中招。可现实还是很残酷，过了两天就陆续有学生感觉不舒服，开始发烧，请假休息。大家都说感染是迟早的事，可当时我的搭档还没来，哪敢倒下啊！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刚来时那两天的低温和刺骨的寒风都没撂倒我，说不定能无症状扛过呢！但是这种天真的想法也很快被现实打脸。12月22日我开始感觉天气有点冷，想是不是气温下降了，可是看着旁边人的状态又不像，就问了几个同事和学生，除了小母也说冷，其他人都说天气挺暖和，心想有点大事不妙，果然第二天晚上我开始觉得眼痛手酸，小母也打电话给我说她也觉得不舒服。不过好在22日当天，同事许国军和韩前进已经完成调查到了工地，我也能放心倒下了。24号一早量了体温，38.1摄氏度，就这样先高烧后低烧，折腾了一个星期，元旦都是在工地的床上躺着过的。澡也不敢洗，饭也是靠没倒下的学生和同事给我带。等我完全恢复回到工地都已经次年1月了，学生们陆续也开始回家了，考古队员们负责片区的墓葬已经在国军和前进的带领下完成了大部分，最后剩下的陈美娜、李想、王健、禹贵强4个学生留到1月中旬还在坚持，工作能力也越来越熟练，很快也把当初认为最复杂的11连炮墓葬给清理完毕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为这些优秀的同学点赞。

（执笔：杨磊）

黄土难掩的华美瓷韵 ——马场镇出土瓷器

1965年至1966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在今贵安新区马场镇附近的万人坟、熊家坡、大松山等地仅仅清理了34座古墓葬，其中包括16座东晋南朝墓葬，出土了丰富的陶、瓷、漆、铜、金、银器等珍贵文物700余件。

自2022年7月以来，大松山墓地和谢家寨墓地发掘以来，又发掘南朝至明清墓葬400余座，出土各类随葬器物近千件。

几次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出土了大批精美瓷器，初步研究结果显示，这批瓷器在宋以前多来源于外地，有湖南的岳州窑、洪州窑，江西的景德镇窑，也有部分瓷器无法辨别窑口，其中马场早年发掘出土的大鸡首壶，则很有可能来源于当时建康（南朝都城，今南京）朝廷的赏赐，因此该件瓷器体型巨大，远超同时期的同类型器物，在当时的建康附近也没有出土几件。

宋代以后，随着贵州本土瓷业生产的出现和发展，贵州开始出现本土窑口，如清水江远口镇的瓦罐滩窑址，其时代就在元明之际。2009年开始，四川大学白彬教授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和研究，初步判断，有部分清水江瓦罐滩窑址的产品远销至北盘江流域。2010年，吴小华在天柱县江东乡发掘的溪口窑窑包中出土了行灯和白瓷碗、罐及大量支钉、匣钵，其时代在南宋至明。2011年，中山大学刘文锁教授带队在天柱县白市镇盘塘组附近发掘的盘塘窑，出土了大量青瓷碗、盏、钵，酱釉瓷罐，以及垫圈、垫饼、垫柱，其时代在宋代至明代。以上窑址的发现发掘，说明贵州的瓷器生产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因为贵州窑口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对其特点和分布范围有待研究，马场镇出土的瓷器



老瓦坡出土的青瓷钵（西晋）

可能有部分就来自本地窑口。

此外，马场镇在宋以后也有部分明确来自外地窑口的瓷器，如景德镇窑的元代青花劝盏劝盘、明正德法螺纹碗、明代晚期青花盘、明代晚期白瓷杯、龙泉窑青瓷八方杯等。

2022年大松山墓群发掘出土的瓷器，最早的同样是两晋时期的青瓷器，如老瓦坡 M1 中出土的青瓷钵，器形为敞口，圆唇，弧腹，平底微凹。内底心饰旋涡纹，口沿下部饰两道凹槽，模印一周菱格纹。轮制，外壁可见轮旋痕。底部有烧制粘连痕。胎色浅灰，胎质较粗。施青釉，釉面有细碎开片，内壁满釉，外壁施半釉，脱釉严重。

小团坡 M2 出土的青瓷钵，器形为敛口，圆唇，浅曲腹，大平底。外壁口沿下饰两周凹弦纹，内壁腹底衔接处凸起，内底刻画双圈弦纹。灰白胎较粗，夹少量砂，胎体坚硬，轮制，内外壁及器底均可见拉坯形成的旋痕，器底有修坯痕，烧制温度高，因受热不均，胎体露出的部分呈砖红色。青釉，内底不施釉，外壁施釉至下腹部，釉质浑浊，釉层较厚，釉面过烧失光，胎釉结合差，大部分釉面脱落，有流釉现象。内底有垫烧痕，外壁近底处有叠烧粘连痕。

时代稍晚于它们的有洋沟土 M4 出土的青瓷六系罐，器形为泥质灰白胎，



小团坡出土的青瓷钵
(东晋)



洋沟土出土的青瓷六
系罐(隋-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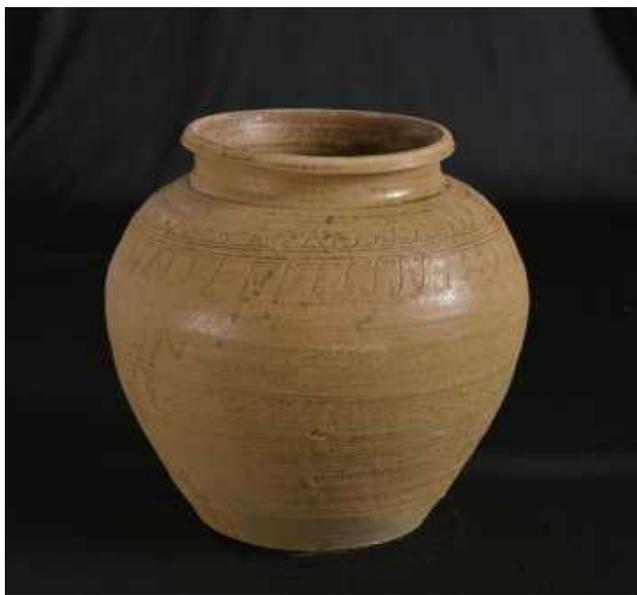
胎质较粗，胎体坚致，轮制，内外壁及器底可见拉坯形成的旋痕。青釉泛黄，内壁满釉，外壁施釉不及底，釉质浑浊，釉层较薄，釉面较光亮，遍布细碎开片，施釉不均，有流釉、积釉现象，肩部有一处窑变斑。直口，方圆唇，矮颈，丰肩，上置六个桥形系，均为单根泥条捏制并贴塑，其中四系横置，二系竖置，上腹鼓，下腹弧收，收束幅度较大，近底处外撇，最大径在腹上部，平底微内凹。系下饰两周凹弦纹。这件器物出自湖南的洪州窑，时代在隋到初唐。

进入宋代之后，马场镇出土的瓷器依然以青瓷器为主，目前尚未发现白瓷、青白、青花等釉色的瓷器，但也有其他釉色如酱釉出现。典型的有坟坝顶 M507 出土的青瓷罐，它的口径为 12 厘米，底径 10.8 厘米，高 18.4 厘米，腹最大径为 19 厘米，器形为直口微侈，圆唇，溜肩，上鼓腹，下腹斜收，平底，肩部饰数道凹弦纹间水波纹，素面，器外壁可见轮旋痕。

坟坝顶 M513 出土的青瓷执壶，器形为敞口，方圆唇，短颈，上鼓腹，下腹斜收，平底，外壁可见轮旋痕，灰白胎，器内外壁均施酱釉，施釉大部分残缺，肩部有一管状流，相对一侧颈、腹部有一把，把上有叶脉纹。流和把为后期所加。坟坝顶 M538 出土的酱釉三系瓷瓶，器形为近直口，卷沿，圆唇，束颈，丰肩，肩部置三横系，鼓腹，下腹斜弧收，平底内凹。器表可见轮旋痕，肩部饰一道凹弦纹。灰胎，器内外壁均施薄酱釉，内壁局部未施釉，外壁施釉不到底，有流釉现象。坟坝顶 M738 出土的青瓷碗，器形为敞口，尖圆唇，弧腹，矮圈足，外底略有凸起，内底略凹。外壁可见轮旋痕。灰胎，施青灰釉，外壁施釉不到底，外底均露胎，内外壁局部开片。

这些瓷器的年代和窑口，除坟坝顶 M538 出土的酱釉三系罐为南宋中晚期，坟坝顶 M738 出土的青瓷碗为南宋时期景德镇窑的产品外，其余窑口大多不明，但其时代应为两宋，来自外地的可能性最大。

而进入元代之后，贵州瓷器的生产有了巨大的变化，在大松山墓地出土的瓷器中，出现了大量使用中国早期的石灰钙釉烧制的青瓷器（即大松山墓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酱色瓷器）。这类瓷器使用植物灰作为助燃剂，起源于商代，



坟坝顶出土的青
瓷罐（宋）



坟坝顶出土的
青白瓷碗（元）



在晚唐时期就开始逐步退出瓷业的主流舞台，到宋代基本上就以矿石釉为主流，使用石灰作为助燃剂，而在元明时期的云贵地区，传统的石灰钙釉青瓷生产仍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占主流地位。另外在瓷器的造型上，也较之前出现了一些不同。如两晋南朝时期多为四系罐，在宋代瓷器中则没有此类带系的瓷器出现，而元代却出现了三系罐或三耳罐。比较有意思的是，它的使用时间有限，最迟在明洪武时期出现，之后即不再出现。当然也有高足碗和元青花出现在马场元代墓葬中。典型的有坟坝顶 M9 出土的青白瓷碗，器形为敞口，圆唇，斜弧腹，内底心凸，外平底内凹。灰白胎，胎质较粗，有气孔。施淡青釉，釉面光亮，有细碎开片，沿面无釉，内壁满釉，外壁施釉不及底，有流釉、积釉现象。轮制，器表可见轮旋痕。

坟坝顶 M63 出土的青白瓷高足碗，器形为敞口，翻沿，圆唇，曲腹，高足，足内中空。灰白胎，胎质较粗。器内外壁施青白釉，较光亮，脱釉严重，足柄内无釉。轮制，器内外壁可见轮旋痕。从这些瓷器的烧制特征看，它们应该是贵州本地的，但是具体窑口不明。

当时应该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地的瓷器，最让人惊喜的，就是在坟坝顶



坟坝顶出土的青白瓷高足碗(元)

M1114 中出土的青花劝盏和青花劝盘，发掘时先发现青花劝盘，清理完劝盘后发现其下有青花劝盏一只，这座墓葬中出土有朱元璋起义时在集庆府（今南京）称吴王时铸行的大中通宝折十钱，所以，在工地上就把它们的年代确定为元末。这件青花福字劝盘，器形为圆唇，斜折沿，浅曲腹，平底，底部内凹一周。内壁沿面处饰几何形锦地纹一周，内壁与器底交接处饰双圈弦纹，内底有一周凸棱，外饰一周弦纹，凸棱内环绕绘制卷云纹，内底正中有一行书“福”字，青花色黑灰，略有晕散。釉面光亮，内底有多处铁锈斑，内外底均有粘砂痕。青花寿字劝盏，器形为敞口，圆唇，曲腹，饼足，内底微凸，外底平。外壁处附一把手，把手作卷云状。青花装饰，外壁口沿下饰一周弦纹，外腹部饰一周卷草纹纹饰带，内壁腹部饰一周几何形锦地纹，内底饰一周弦纹，内底心有一行书“寿”字，白釉微泛青，内壁满釉，口沿一周涩胎无釉，外壁施釉不及底。青花呈浅蓝色，略有晕散。这两件元青花均产自江西景德镇，元末时，红巾军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攻占景德镇，大量熟练工匠外逃，导致景德镇瓷业生产水平下滑，青花劝盘盘底粗陋的制作工艺正是这段历史史实的见证者，而这两件青花的青料特征也符合“苏麻离青”的特征。

进入明代之后，随着西来高产作物的进入，彼时马场镇的人口远较之前增加，反映在墓葬上就是大量明墓出现，但瓷器生产依然使用原始的石灰钙釉烧制的青瓷器技术，只是瓷器器形出现了变化。目前，三耳或三系瓷器退出历史舞台，双系或者无系的瓷器和青花瓷开始大量出现，典型的有坟坝顶 M31 出土的青白瓷罐，器形为微侈口，卷沿，圆唇，束颈，溜肩，鼓腹，下腹弧收，近平底。器过烧，灰白胎，胎质稍粗，胎体气泡裂。内壁施青绿釉，外壁施淡青釉，釉层较薄，光亮，釉面有细碎开片，有气泡，外壁施釉不及底，有流釉现象，沿面无釉。轮制，器表可见轮旋痕，底有烧制粘连痕。

这些瓷器同样无法确定窑口，但是相对于以往的出土器物有了一定的变化。谢家寨 M4 出土的酱釉瓷碗，是酱釉瓷在碗类上的唯一实物。而坟坝顶 M582 出土的双系带盖酱釉瓷罐，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带盖瓷器。当然明代还是有一



坟坝顶出土的龙泉窑青瓷高足杯（明中期）

定的外来瓷器存在，出土的青花海水法螺纹瓷碗则为明正德时期的景德镇窑的产品。

还有一类文物要出土于土坑墓中，一般在墓室的头部或者左右两侧挖壁龛一处，文物就出于其中，而且一般是两件，或瓶或碗，且多为青花碗、白瓷瓶，由于这类青花瓷器多为当地生产的“土青花”（当地瓷窑生产），目前考古队员们在马场镇及周边区域未发现相应的瓷窑，故认为其年代应在明代晚期到清代中晚期。土坑墓中出土的典型器物有坟坝顶 M3 出土的青花碗，器形为敞口，圆唇，浅弧腹，内底凸，矮圈足，足墙较直，足内斜削，平底，外底心凸起。釉下青花，青花呈蓝黑色，外口沿下部饰一周弦纹，外壁模印缠枝纹菊花。灰胎，胎质较细腻，有气孔。施灰青釉，光亮，有开片，内壁施半釉，外壁施釉至下腹。下腹有刮削痕迹，器底有轮旋痕。内、外底有叠烧粘连痕。

总之，马场镇这几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瓷器，因为篇幅的原因，只能选择

极少部分在这里介绍。相较于周边省份，四川有邛窑，重庆有涂山窑，云南有玉溪窑、建水窑，湖南更是洪州窑、岳州窑、长沙窑众星璀璨，贵州的瓷业生产一直都不发达，但从马场镇出土的大量瓷器可以看出，依然有可能存在较多、较大的瓷窑，只是因为考古工作做得不足，没有能找到它们。另外在贵州，即使已经是 2024 年了，传承自商代原始的石灰钙釉烧制的青瓷器技术依然还在使用，它的产品，就是考古队员们逢年过节时装小米渣和粉蒸肉、咸烧白的土碗。可见，历史的久远和顽强。

（执笔：胡昌国）



文物话春秋·考古研究

在山丘与平坝之间的文明

越过山丘，依然是山丘。山丘之间，是平坦的坝子。坝子上星罗棋布散落着村寨和形状各异的农田。一年四季，除了农田的色彩在季节间变换外，山丘一直若无其事地绿着。时间如同山丘之间的河流，看起来缓慢而悠长。这是位于中国西南山地腹心地带的贵州省中部的贵安新区。

300 万年以来，人类这一独特的物种，持续改造着景观和自己。如今，这片土地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宽阔的车道纵横交错，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高新科技园区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村寨被搬迁，农田被改造，山丘被开出豁口。在以“弯道取直”的气魄拥抱这个未来新世界的时候，历史仿佛变得没有时间感。

然而，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记住了平坝飞虎山、清镇汉墓。考古队员们相信，这片黔中的平坝中和山丘间，一定有更多的历史印迹。几年前，考古队员们在和贵州考古所的同仁们一起手持地图，走访每一个石灰岩山洞，勘查每一个被挖掘机开出的土层断面时，一连串的考古遗址被发现。在时间感急剧消失的土地上，考古队员们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片土地几万年以来人文脉搏，在考古地图上急促地跳动。它代表的是人类在这一片土地上独特的生存经验，也构成了当今历史的一部分。

喀斯特地貌的名称虽源自南斯拉夫，却在中国西南山地得到了最为淋漓



穿梭于山丘平坝间寻找洞穴

尽致的表现，而贵安新区正处在此种独特地貌的核心区域。看不见的地下河道和地表水流将这一区域的石灰岩蚀刻成峰林、孤峰、残丘，也发育出了大小不一的洞穴。人类在非洲的旷野站直了下肢后，就在持续不断地寻找新的领地。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迁徙历史中，洞穴显然对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在华北，是北京周口店；在华南，是黔西观音洞。而考古学100多年的经验告诉考古队员们，贵安新区的洞穴也一定是人类不会轻易错过的。经过普查，贵安新区的洞穴数量达上百处，而其中60%有史前人类活动遗迹。这些掩藏在山丘坡麓的洞穴，宛若平坝上的村寨，构成了这片土地最早的人类栖居样态。层层叠压的火塘，屈折下肢的墓葬，磨制精细的骨器，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在位于高峰镇岩孔村的招果洞的考古发现，以鲜活的例子告诉考古队员们，他们的活动领地有多大，他们以什么为生，他们何以在上千年的时



间河流中保持着一种看似极为稳定的生活样态。我相信，随着考古学家的持续努力，贵安新区的喀斯特洞穴将成为西南地区最有潜力的考古区域之一，也将为人类史前生存之道贡献独特的经验。

在广泛发育的喀斯特洞穴中的狩猎采集者之后，考古队员们遇到了黔中地区人类活动史上最不明朗的时刻。时间在距今 7000 年至距今 3000 年间似乎停顿了，仿佛有人蓄意将无字史书的最重要的页码撕掉了一样。在同时期，西亚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瞩目的时刻，农业扩张，早期文明崛起，中国北方地区进入了仰韶文化的繁荣期，继之来到龙山时代的文明前夜。这富饶的地域难道是无人之地？考古经验再一次告诉考古队员们，这个尴尬的时段乃是因为调查和发掘的密度不够，在那些山前的坝子中，在被农田、水塘、村寨占据的地方，一定有着与中国北方完全不同的聚落，而黔中山地的文明演进也必然有着自己独特的节奏，在进入帝国历史的道路上，这片乡土自有其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个故事或许过于朴素，却可能是孤本。

历史在汉代设郡的大一统浪潮中似乎又重新鲜活起来。贵安新区境内调查发现魏晋南朝至宋明时期古墓葬 70 余座，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展现出这片土地在帝国的边境中与大历史交会的多彩面相，等级、身份、礼俗、认同通过器物的赏赐、贸易、模仿，以错综复杂的关系讲述着中心与边地互动的历史。在汉文文献中那些语焉不详的政权和人物，通过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日益丰满。

黔中石灰岩山丘围绕的平坝，是现今贵州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地方。在憧憬一个全新的未来的同时，考古队员们或许也应该回头打量，这片土地经历过什么样的历史，挣扎过什么样的生活，考古队员们受制于何种景观，又怎样得益于这景观的滋养。文化从来都不是累赘，考古也从来都不是与现代无关。在四通八达的路网中，或许明白了考古队员们从何处来，才能确定考古队员们要向何处去。这片土地给考古队员们的文化馈赠也必将给予他们精神的启迪。

（执笔：吕红亮）

中华一统

两千年前的一天，西汉武帝下了一道政令——开拓西南夷，于是，贵州逐渐纳入汉王朝版图。自此，贵安新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迈开了本地少数民族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民族既对抗又融合的步伐，并一步步形成了贵安新区今日的风貌。考古工作者通过精心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逐渐揭开了汉代贵安新区神秘的面纱。

一、探索与发现的道路

这一切都要从羊昌河灌溉工程谈起。20世纪50年代，国家刚刚稳定，需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就显得尤为重要，羊昌河灌溉工程应运而生，施工队浩浩荡荡，忽然，一坑文物就暴露在了大家面前。随即，驻守工地的文物工作者开始了清理保护工作，于是贵安新区的汉代遗物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正是基于羊昌河发掘的经验，考古专家们又对这一区域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墓葬，并发掘了平坝的金家大坪及其周围的老鸡场、尹关、夏云、天龙，及与清镇交界的新新桥、琊陇坝、余家桥、放牛坡、花园等处的墓葬，一层层拨开了贵安新区汉代文化的面纱，为考古队员们呈现出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

二、丰富多彩的地下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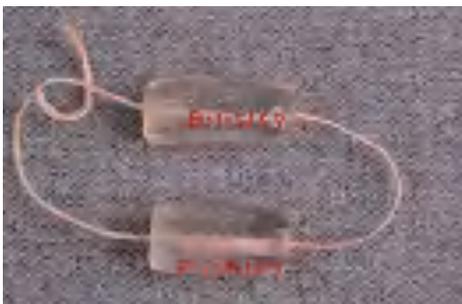
我国古人认为灵魂不灭，有一种视死如生的观念，认为当人死后，灵魂会到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因此每当有人离世，其家人就会将死者生前使用过



的东西一起埋入墓内随葬，不能放入墓葬内的就做成模型，让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丰衣足食。这也逐渐形成了一种随葬风俗，于是在墓葬随葬品中就出现了与现实生活相对应的生产生活用品。因此，墓葬就成了当时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考古专家们迄今为止发掘的汉代墓葬，有的是砖室墓，有的是土坑墓，有的墓葬随葬品摆满了整个墓室，有的墓葬随葬品则寥寥无几。可能是当时有钱有权的人家就有能力享用高端奢侈品，使用带釉罐、带釉壶、青铜釜、青铜灯、青铜水注等，佩戴水晶珠、玻璃羊坠、琉璃耳珰等，修建豪华住所，使用的建筑材料都是带图案的画像砖。砖上画有居住的两面坡式的房子，人拉牛车的画面，看起来都是满满的幸福感啊。而没钱没权的人家就只好住土坯房，使用普通的陶制罐、碗、壶等。不过也不是完全这样，墓葬的修建还受到当时的建筑技术及社会生产力等因素的影响，但还是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阶级差异。



1958年清镇芦荻乡新新桥M56出土的汉代竖耳铜釜



1959年清镇芦狄乡新新桥 M56 出土的长形六方水晶珠



1959年清镇芦狄乡新新桥 M56 出土的玻璃羊坠

三、民族融合与涉外交流

在贵安新区发掘的这些墓葬及其出土的随葬品，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装饰品，或者墓葬的建筑方式，无疑都带有很强的中原地区汉民族特征，这说明了自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开始，对当地的衣食住行用逐渐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并趋向汉化，同时也部分保留了本地风俗的精华，为本地区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明，显著提升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水平。

提起玻璃、水晶等制品，大家第一时间的反应都会认为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其实，这些早在 3000 年前已经被生产出来。而且关于玻璃的产生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有一艘装有许多天然苏打晶体的腓尼基人的大商船来到地中海沿岸的贝鲁斯河河口，不过船员们对于这里海水涨落的规律并不熟悉，当大船走到离河口不远处的一片美丽的沙洲时便搁浅了。被困在船上的腓尼基人，索性跳下大船，奔向这美丽的沙洲，一边尽情嬉戏，一边等候涨潮以便继续行船。中午到了，他们决定在沙洲上埋锅造饭，可是沙洲上到处是软绵绵的细沙，竟找不到可以支锅的石块。有人突然想起船上装的天然苏打晶体可以使用，于是便用这些晶体



充当石块垒砌锅灶，抱来木材生火做饭。当大家吃完饭收拾餐具准备回船时，有人忽然发现锅下沙子上有种东西晶莹发光，大家以为发现了宝贝，就把它收藏了起来。其实是在烧火做饭时，支着锅的苏打块在高温下和地上的石英砂发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了玻璃。聪明的腓尼基人意外地发现这个秘密后，很快就学会了制作方法，然后将玻璃制成大大小小的玻璃珠赚钱，之后埃及等国也逐渐掌握了玻璃的制法，并不断向外传播。

只是到了汉代，像玻璃制品等世界各地的物品才逐渐进入我国人民的生活，虽然只有少数人才有机会拥有。但无论怎样，考古队员们能在贵安新区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有幸发现，并展示于众，得益于千年前的大汉王朝能够一统神州大地，富国强兵，发展外交，开拓丝绸之路，将千万里之外的文明带回这片热土。

（执笔：李二超）

“四海如一家”

——从考古学角度浅析唐代对贵州地区的开发

八月末，冷空气南下，淅淅的雨飘着，南方地区气温骤降，而门前的紫薇团簇，花瓣散了一地，秋就这样毫不客气地推门而入！千余年前的盛世大唐是否也如冷空气般扩张？或许是的。唐盛时，其域东起日本海、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今俄罗斯安加拉河流域）、西抵西海（今咸海，一说里海），疆域或逾千万平方公里。彼时唐朝兴盛，与汉并称“汉唐盛世”。

从考古学角度看，汉代遗存分布范围极广，遗存亦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贵州境内目前已在黔西北的赫章、威宁，黔东北的沿河、务川、道真，黔北的仁怀、习水、赤水，黔中的清镇、平坝、宁谷，黔西南的贞丰、兴仁、兴义等地均发

现了大量的汉代砖室、土坑、石室及崖墓。有趣的是，几类汉式墓葬的形制、特征大多与汉同其他地方墓葬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在赫章可乐、安顺宁谷也发现了大型汉代遗址。同时，贵州相邻省市湖南、重庆、四川、广西等均发现有大量的汉代遗存。云南在西汉元封二年（前 109）纳入汉朝版图后，汉式遗存大量增加。

相较之下，盛唐时期，唐太宗主张“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并以此思想经营边疆，积极向四夷扩展。唐初对贵州之地多有动作，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全国为十五道，贵州地区属黔中道及剑南道，但似乎唐朝的边疆政策收效甚微。目前，贵州地区能确认的唐代遗存似乎仅在贵安新区马场镇有所发现。

1965 年底至 1966 年初，贵州省博物馆于平坝县（今平坝区，后同）马场镇附近发掘了古墓 34 座，墓葬年代上自东汉下迄宋明，延续时间之长乃贵州罕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墓葬中包含了 3 座唐代墓葬。

3 座唐墓，其中 1 座为砖砌，2 座为石筑。砖砌墓整体形如“圭”字形，分墓室及墓道，墓道封门外前端横向砌筑砖墙一道当作翼墙。东西北三壁均单砖相错平砌，至 1 米高处便从每壁中点往两端斜上方铺砌五行，然后又平砌，四隅券进，汇于正中成穹庐顶。底部以二横二纵平铺为主。此砖室墓与他处唐墓相似，如湖北襄樊（今襄阳市襄州区）伙牌镇魏 M1 等。2 座石筑墓葬，形制较小，深挖墓穴，后以石块垒砌成，墓葬内侧平整、外侧粗糙，墓中安葬逝者并附随葬品。两座石筑唐墓与马场所见更早的南北朝墓葬基本一致，或许更多的是承袭当地葬制而来，因此类墓在东汉时期即已开始出现，并在宋明时期继续沿用。1958 年 12 月至 1959 年 4 月，在清镇与平坝交界处发掘的清墓 83 即为此类石室墓，黔中宁谷、黔西甘棠等处在东汉中晚期亦发现有刀形券顶、长方形竖穴土坑类石室墓葬。2 座石筑墓葬中虽见唐文化遗物，但或许更多的是唐文化与当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墓葬之内出土有典型唐代遗物，如带系双口罐、花瓣形铜镜、海兽葡萄镜等。



马场唐墓出土的六系罐



马场唐墓出土的四系双口罐

带系双口罐自南北朝时期开始流行，并延伸至唐墓中，在广西巴东一座南北朝时期墓葬内曾发现有形制相近者。花瓣形铜镜在唐代铜镜类型中属大宗，在唐墓中有大量发现，在河南偃师杏园宋祜墓及李嗣本墓、河南焦作聂村 M6 中亦有发现。而海兽葡萄镜亦为唐代铜镜的一种典型，大量收录于《中国古代铜镜》“唐镜”一章中。

由此可见，唐文化虽对贵州地区有所渗透，但其深度及广度等方面远未达到汉文化那般剧烈，这或许也与唐朝初年所定的边疆治理思想有关。李唐“视四海如一家”，重扩张、轻管理，故而早期强枝弱干，安史之乱后强干弱枝，直接导致边疆管理的松散、边患频仍，或许这也是在唐末播州为南诏所陷的间

接原因。

无论如何，目前贵安新区马场镇所见唐代墓葬仍是贵州地区仅见的唐代遗存，其意义不言而喻。但是一类文化不会凭空出现，成为一座文化孤岛，贵州唐代遗存也一样，其出现于黔中地区就一定会有其传播的路线，正如汉文化整体上沿江自北而南分布于贵州境内大江两岸一样，唐文化的传入也一定存在其特定路线。仅就目前而言，至少能看到唐文化在贵州传播带上的个别点，考古队员们需要做的，或者说更切合实际的或许是从贵安新区马场镇这个点出发，寻找到唐文化在贵州地区的传播线路。

秋日渐深，身体虽感清冷，但对文化探索的热情却丝毫不减。

（执笔：韦松恒）

贵州处处有宋意

山外青山，楼外楼，黔山秀水，尽风流；

黔地风物，皆古意，千年遗韵，竞灵秀。

贵州地处西南，东枕湖湘，西襟滇诏，南邻粤桂，北屏巴蜀，自古远离中原，文明割裂久远，但是历史不离华夏。殷伐鬼方，秦通楚道，蒙昧初开，戏称夜郎。汉置牂牁，唐靖矩州，宋祖赐名，洪武建省，王化始开，一体多元。

贵州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旧石器人类化石和远古文化遗存发现颇多。据现有考古资料，在贵州境内发现有大量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堪称中国旧石器的胜地。这说明贵州各族人民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并在劳动生活中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化。贵州建省虽然只有 600 多年，但据历



史文献记载，贵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得更远。

唐代，在今贵州地区推行经制州与羁縻州并行的制度，置播州、思州、矩州、蛮州等州，乌江以北多系经制州，乌江以南多系羁縻州。

宋代，贵州地域主要属夔州路，“贵州”名称也始于宋朝。据史料载，公元974年，土著首领普贵以控制的矩州归顺，宋朝在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要在荒”一语，这是以贵州之名称此地区的最早记载。

元代遍行土司制度，在今贵州境内的建置主要有：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播州宣慰司、思州宣慰司、新添葛蛮安抚司、乌撒乌蒙宣慰司、普定路、普安路等，分别隶属于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

而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永乐十一年（1413）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司，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并以贵州为省名。废思州宣慰司与思南宣慰司，保留水东土司与水西土司，同属贵州布政司管辖。明末，贵州布政司领贵州宣慰司及贵阳、安顺、平越三军民府并都匀、黎平、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七府。

清代前期，贵州的行政建置有较大的变化。雍正五年（1727），将四川所属遵义府及其所属各县改隶贵州，将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之地置永丰州，与广西的荔波、湖广的平溪、天柱一并划归贵州管辖。至此，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

宋明时期，中央朝廷在贵州遍行羁縻土司之制，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但今贵安新区由于过去考古工作开展较少，发现的考古材料也十分有限，周边地区文化面貌也不明确。目前在平坝、清镇发现的宋明时期遗存主要为墓葬，以竖穴土坑墓、石室墓、岩洞葬为主。

竖穴土坑墓，顾名思义，是先在土里挖一个长方形墓圪，再将墓棺放入内的一种葬制。目前贵安地区发现的竖穴土坑墓均为长方形，多为长3米、宽1米、深0.3米左右的小型墓，墓上有封土。墓内葬具不存，骨骸多已朽坏，但仍可辨明为仰身直肢葬，头均朝向墓口。墓葬中随葬品较少，每墓仅一两件，

多者也不过十余件。女性墓葬以装饰品为主，有发箍、项饰手镯、料珠等，男性墓则以刀、矛等武器随葬。这类墓主要在清镇芦荻乡发现，如 M26、M28、M62 等。

石室墓是贵州普遍实行的一种葬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带雕刻的石室墓，用石条砌筑，常使用券顶，多为双室墓，左右并列，墓内多做出石棺台、排水沟和壁龛。这些石室墓都有精美的雕刻，宋代通常有仿木构建筑构件，武士、墓主人像、四神、宴饮图、妇人启门等生活场景，各种花卉、吉祥图案、伎乐、侍女等人物图案及各种活动。雕刻均较精美，内容丰富，多用浮雕、透雕、圆雕等工艺。如位于遵义红花岗皇坟嘴的播州杨氏第十三世土司杨粲墓，被誉为“西南石刻艺术宝库”。明代墓葬内装饰普遍衰落，仅残存有少量的装饰，多为花卉、云鹤等装饰图案和吉祥图案，且有向墓外发展的趋势，即墓室内少装饰，向墓外装饰和墓前建筑发展。这类墓葬主要分布于黔北地区，经过考古发掘的墓葬也较多，资料较为丰富，以遵义播州土司墓葬为代表，等级较高，墓葬规模也较大，随葬品精美、奢华。另一种石室墓主要分布于乌江以南的贵州中部，贵安地区



马场出土的宋料珠串



分布的石室墓也就是这一类型，通常当地人称为“苗罐坟”，为一种小型石室墓，随葬品也较少，为较低等级的墓葬。

石室墓在贵州分布范围较大，在贵安地区经发掘的石室墓主要分布于平坝马场坟坝脚和清镇干河坝。这类墓用规则不一的石块或石板构筑而成，规模较小，墓葬均系长方形石室墓，有的墓上保存有少量封土。墓葬内发现随葬品较少，主要有釉陶罐、陶釜、铜器、铁器、锡器、骨器、铜钱等，女性墓葬以装饰品为主，有发簪、项饰手镯、料珠等，男性墓则以刀、剑等武器随葬。

岩洞葬，又可分为悬棺葬、岩棺葬和洞棺葬，是一种不入土的葬俗，分别将棺木放置于悬崖峭壁之上，或搁置在岩坎之上，或堆放在洞穴之中。这类墓在贵州的分布范围也较大，在黔东、黔南、铜仁、安顺等地均有分布，目前发现的岩洞葬亦有数千座，并做了一些清理，1987年发掘的平坝“棺材洞”就是其中之一。

平坝“棺材洞”面积约1100平方米，可确认的棺木有567座，这些棺木均放置在临近洞口通风、见光、干燥的地方，洞内通常内高外低。棺木通常层层垒砌，为长时间积聚的结果，叠置形式包括3至10余层不等。木棺形制主要有船棺、圆木棺、方棺、架棺、梯形棺等。随葬器物有瓷罐、碗、衣物、梳子、骨簪、料珠等。

由于历史、地理因素的影响，整个宋明时期的墓葬呈现出明显的南北的差异，贵州地区由于独特的喀斯特地理环境形成了以石室墓和岩洞葬为主的墓葬格局，当然各地区之间也有一些葬制、葬俗上的差异。黔北地区的石室墓多受四川地区的影响，形成以石板砌筑的较为规整的石室墓，墓葬雕刻较为精美、奢华，而黔中地区则形成了以石块或石板构筑而成的石室墓。黔北地区由于与峡江地区相接，沟深谷陡，天然洞穴较少，主要分布有悬棺。而黔中及黔南地区岩溶地貌发达，天然洞穴众多，更利于洞棺葬的发展。一个地区葬俗、葬制的形成是民族、历史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更与人们的丧葬观念、信仰有密切相关。

贵州宋明时期的考古研究还有很多问题，田野工作的薄弱是制约研究深入

发展的关键，经过发掘的考古遗址少，考古队员们需要更进一步发掘和保护好考古资源，文化遗产保护的路还很长。

有人曾这样比较唐代与宋代：唐代犹如大家闺秀，大气瑰丽；宋代则如小家碧玉，婉约清丽。而黔地风物与宋代是如此的契合，黔山之秀，黔水之美，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千峰叠翠，留意处，皆宋意……

（执笔：彭万）



政策与公众·公共考古

要动土先考古

——基本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双赢的“贵州样板”

对文化遗产的珍惜和主动保护，是 20 世纪人类文化觉醒与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华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为考古队员们及子孙后代留下了丰富和极其灿烂的文化遗产。文物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物的保护是文物研究和利用，甚至是重建文化自信的基石，是中华光辉灿烂历史的实物见证。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城市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推进，城市规模快速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也在迅猛扩张。在这个过程中，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活动和文物保护工作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保护文物影响基本建设活动顺利推进，或者在基本建设活动中破坏文物的情况时有发生。既要能顺利推进基本建设活动以保障民生问题，又要保护好文物在基本建设过程中不遭受破坏以留下文化的实证，实现基本建设工程和文物保护的双赢局面，是新时代文物工作者的使命，不再是二选一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这一突出矛盾，贵阳市文博系统深刻认识到保护文物的重大意义，以及文博人应该肩负的历史责任和担当。在贵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积极落实了“要动土、先考古”的政策和措施，主动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积极探索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前的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工作相结合的方式。这种做法不仅能够推动城市发展，也能够保护文物，实现基本建设工程和文物保护双赢的局面。

一、缘起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后简称《文物保护法》）首次颁布，至2017年先后经历了5次修订。该法明文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从《文物保护法》的制定和修订过程来看，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必须进行考古调查或勘探工作这一要求不断被强化。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在山西省、陕西省和河南省等地的大型基本建设工程中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都得到了较好的落地。然而，在贵州省这个被视为“文物弱省”的地方，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大型基本建设项目范围被主要限定在修建大型水库、水电站和高速公路等建设工程方面，其他方面的建设工程进行考古调查或勘探工作的相对较少。而历史的真实是贵州虽然建省较晚，狭义上的历史文物保存情况不甚理想，但是作为各大历史文化交会交流地带，地形地貌相对隔离，民族文化多姿多彩且保存较好，同时凭借是红军长征的重要路径和转折地而保存有丰富的红色文化遗存等，而对这些文物的认识和认定都是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的，这些文物一旦毁损将不复存在，势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自1980年贵阳市成立文物保护机构和1982年《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贵阳市文博系统的前辈们为贵阳市文物的保护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许多不可移动文物得到了摸底认定，并得以妥善保护，大多不可移动文物保存



状况良好。在有限的条件下，积极参与基本建设工程中的考古调查或勘探、发掘工作，主要开展了以下重要的考古发现和调查项目：1996年，在贵阳市云岩区东山晒田坝进行了明代墓葬的发掘；2002年9月至11月，为配合金阳新区（今观山湖区）的建设进行了考古调查，在此期间发现了16处新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2003年，对贵开路沿线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新旧石器时代的打儿窝岩厦遗址，并先后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工作；2004年，在贵阳市开阳县大花水电站施工区及库区进行文物考古调查时，清理了开阳县高寨乡平寨村宋明时期的4处岩洞葬。这些考古调查或发掘工作的开展，为考古队员们深入了解黔中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然而，自2010年以来，全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城市建设规模以空前的速度扩张，在基本建设活动骤然增加的大背景下，基本建设工程和文物保护工作的矛盾空前。2016年8月26日发布的《中共国家文物局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出现“历史文物大规模消失，文物保护被动局面没有根本扭转，革命文物保护现状堪忧”的表述。

时年，湖北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安七里坪革命旧址”中的“国共合作谈判旧址”，被七里坪镇政府组织的施工单位违法拆除，新建3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七里坪镇便民服务中心”。河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南街民居”，包含53处单体文物建筑和4处院落，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工程建设单位和施工方未按文物保护批复方案实施，而是整体拆除了南街民居文物建筑，用现代建筑材料取代原有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构件，建成了钢筋水泥结构的“仿古商业街”。贵州省独山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龙家民居”，被开发建设“中央城”房地产项目的施工方强行拆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东北隅刘亚楼旧居、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部卫生所旧址、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部警卫连旧址等7处不可移动文物遭违法拆除。以上几起违法案件，导致文物损失严重，后果触目惊心，频上当年媒体热搜，成为国家文物局通报的“文物法人违法案件专项整治行动（2016—2018）”第一批督办违法案件。江苏省淮安市为打造“总理童年仿

古街区”的商业项目，拆除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录点“义顺巷 16 号”周恩来故居，淮安市政府被告上法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贵阳市在进行金桥饭店及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时涉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元宫、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录点金桥饭店和贵阳城墙南明段，贵阳市委、市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文物行政和管理部門，秉承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历史使命，将已经提上拆迁日程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叫停以保护文物。2018 年，贵阳市重点工程“花冠路”在建设过程中，发现南明区段涉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高张氏节孝坊”。据初步勘测和道路设计数据显示，该节孝坊高于花冠路的路面高程 6 米左右，距人行道水平垂直距离 3 米左右，如该项目进行实施将对文物造成严重安全隐患。此情况引起贵阳市、区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经过多次协调对接，在原址原状保护、原址降低文物本体高程和易地搬迁保护的三项选择中，首推原址原状保护，并建设了小体量的公园以进行景观处理，第一次达成了工程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有机和谐共存。以上两个项目的开展，对贵阳市基本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文物保护和工程建设是可以双赢的共识。在基本工程建设或城市建设过程中，如果首先能对区域内的文物进行统一规划并加以合理利用，文物保护工作和工程建设是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加分项，这一观点逐渐得到贵阳市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认可。

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考古队员们也发现有些工程项目已经进行土地拍卖了，或者工程已经启动建设了，才发现项目范围内存有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挖出墓葬，甚至也有部分不可移动文物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因工作对接不畅或不及时遭到破坏的情况都时有发生，工程建设与文物保护工作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如何在源头就实现基本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与文物保护工作的双赢，成为贵阳市各级政府部門和文物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推进

为了推进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国务院办公厅于2018年5月印发了《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作为全国16个试点地区之一，贵阳市成立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贵阳市文物局作为成员单位，将文物保护工作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加以考虑和纳入。

时任贵阳市文物局卢民建局长，考虑我是考古专业出身，且长期在文物保护处工作，对考古工作、法律法规和贵阳市的文物保护工作情况都比较熟悉，就安排我负责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中涉及的文物保护工作。

在工作开展时，我想到河南、四川等外省进行工程建设时都要进行考古调查的先例，在省内，修建水库、电站和公路等大型基础建设工程时，也有考古调查和勘探发掘的工作实践。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将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工程用地规划综合评估或建设许可审批系统进行统一管理和运行尚未有先例。因此，如果想要该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我必须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审核监督阶段，由哪个部门进行审核、审核哪些内容，并确保合法合规且有利于监管。

《文物保护法》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然而，对什么样的工程算大型工程、何时算是事先报请、什么情况下才有可能埋藏文物等却没有明确的界定。简单来说，《文物保护法》对于大型基本建设工程规模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标准，每个地区可能对于工程规模的判断标准都有所不同。同时，在何时算作事先报请也缺乏明确的时间要求，这可能导致一些工程在展开之前没有及时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另外，对是否有可能埋藏文物的标准也没有明确的界定，同时对

于文物的认识和界定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即有些原来不是文物，但经过一定时间认识加深后被认定为文物，而有些文物则因认定时间下限调整后由可以不是文物到必须认定为文物。这意味着在一些工程中，是否存在文物的埋藏可能性仍然存在一定争议。

出于以上这些困惑，我与当时一起参与改革的其他单位一起到工程系统审批试点改革已经完成的厦门进行考察。在考察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的审批系统里面没有涉及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等的相关内容，那么这些困惑就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学习、依据法律法规和工作经验进行摸索。

在厘清思路和关键问题所在后，我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国家文物局对文物保护行政审批流程及内容的要求，将“考古调查”列入所有工程建设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的区域综合评估内容，与环境、地震、压覆矿产等评估放在同一阶段，完成工程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是否存有不可移动文物的第一道筛选，为下一步工程建设的统一规划和文物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将是否完成“考古调查”，或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建设活动，“不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实施原址保护、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行政许可工作纳入所有工程项目建设许可阶段的文物保护审核内容，成为文物保护的第一道关口，严防前期考古工作中出现漏项。同时按照文物属地管理原则，这些审核工作由各区（市、县）纳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进行审核，充分发挥本地文物行政部门的职能所在和对其区域情况比较熟悉的优势，强化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监管工作，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以确保在基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实现文物能被及时发现、项目不会漏项、工作随时监管的有效推进。

同时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贵阳市文物局会同自然资源、住建部门一同划定了全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制定了相应的管控要求，将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相关工作同步推进。这些信息也被纳入“多规合一空间数据信息平台”和“工程建设项目综合审批图”中，从规划层面确保了贵阳市基本建设工程进行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联合审核，



以确保其可操作性和实施性。通过这些举措，贵阳市在规划层面上确保了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前置和文物保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至2021年，贵阳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从改革前的118项缩减至74项，而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审核属于新增审核事项。

系统运行以来，由于工程建设项目多，贵州省具有考古资质的单位只有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家，为切实加强地下文物安全，避免因开发建设导致文物破坏或毁损，缓解工程建设工期和文物保护工作的矛盾，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编制了《贵阳市、贵安新区考古调查专项评估指导意见（试行）》，指导意见中明确贵阳贵安县级政府土地出让10000平方米以上开发建设区之前，须开展文物考古调查专项区域评估工作。

三、成效

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审核工作纳入工程建设区域评估或审核后，文物保护工作力度得到极大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与工程建设的矛盾得以缓解。工程项目建设前，多数项目的建设单位都能在项目实施前积极主动与文物部门进行对接，了解拟用地块范围内的文物分布情况，有效避免由于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沟通不及时或不畅导致土地出让后，在用地建设红线内发现有不可移动文物而无法顺利进行工程建设的情况发生。同时，工程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得到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切实提高了政府各部门和项目建设单位的文物保护意识，从源头上减少因区（市、县）文物保护管理部门人手少、专业弱、部门沟通不畅等原因导致工程建设过程中毁坏文物的情况。

自2018年10月贵阳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运行以来，贵阳市各区（市、县）办理考古调查或文物保护审核项目200多项，其中包括了2019年8至9月，为配合“山湖海·上城”项目施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八角岩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2022年，为配合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科技新城新校区建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

项目建设范围内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共发现南朝至隋唐墓葬 43 座，明清时期灰坑 12 个、沟 1 条，其墓葬形制和部分随葬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这可能与当地的民族构成有关，对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当地的民族及其文化状况具有重要价值。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1 月，为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项目建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大松山墓群开展了全面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13500 平方米，共清理墓葬 2192 座，出土各类文物 4000 余件（套），墓葬分期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前后延续了 1400 余年，发展脉络清晰，表现出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墓地的巨大转变，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进程。鉴于大松山墓群的重大历史、科学、艺术、社会和文化价值，2023 年 3 月 28 日，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被评为 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通过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贵阳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等一系列有力举措，实现了基本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双赢，打造了基建考古的“贵州样板”，贵阳市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前置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在这段时间里，“要动土先考古”已经成为贵阳市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并深入人心，这代表着一个重要的转变，工程建设必须从考古调查开始，工程建设中必须做好文物保护。鉴于贵阳市基本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付出的积极努力并取得的一定成绩，2021 年 12 月 16 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将贵阳市“考古调查”等纳入工程建设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的区域综合评估作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利用先进典型进行全省通报表扬。

（执笔：周儒凤）



与古人同行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考古之旅

总有朋友问我：“考古是做什么的？”“贵州有什么可考的？”“你倒斗不怕粽子吗？”起初我还能充满热情地给他们介绍和解释我认知中的贵州考古，可是次数多了，我也只能对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我想这也是公共考古的意义所在，满足大众形形色色的好奇心，同时传播正确的考古知识，也顺便晒一下考古人辛勤劳动获得的小小成果。因而，考古队员们开始从孩子们着手，趁他们还没被不实信息彻底误导之前，给他们提供最真实可靠的信息和知识。于是，便有了一场说走就走的考古之旅。

风和日丽，水清草绿，莲蓬在荷塘里摇摆着脑袋，一群充满朝气的“零零后”走进了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他们来自贵阳市两所著名的高中，其中有的是被铺天盖地的盗墓小说吸引，有的是从有考古遗址的家乡而来，他们都对考古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和喜欢。从贵阳市区到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有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上小伙伴们热情高涨，让我仿佛也回到了学生时代外出郊游的场景中，空气中都充满了喜悦。

招果洞位于半山腰上，遗址发掘开工前，考古队在住所后的陡坡上披荆斩棘，开辟了一条小道，走的人多了，路上连一棵杂草都没有。学生们到达洞口也是费了些力气的，但洞口的两个探方马上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大家立马自觉地围在探方外。听考古领队张老师简单地介绍了遗址情况和注意事项后，大家都兴奋地拿起了考古工具准备进入探方内，近距离体验考古工作。

紧握手铲，身体低蹲，有时甚至需要双膝跪地，考古队员就用这样最贴近

黄土的姿势清理遗迹，也许一蹲就是好几个小时，一边用手铲轻轻地刮去浮土，一边还要注意观察土质土色的变化，从一片黄土中及时发现遗迹的蛛丝马迹。学生们三五成群，在一个探方内，用刚学的动作慢慢清理，有的发现了一块骨头，有的发现了几千年前的螺蛳壳，有的用刷子轻轻拂去八千年人类遗骸上的泥土，大家都因这从未有过的体验欣喜不已。还有的学生围在旁边，用准备好的黑曜石，学着用古人的方法打制石器，体会了原始人简单的生活智慧。

考古的体验还不止这些，一个多小时的发掘体验和古人生活体验过后，同学们来到了库房参观。两间不大的民房内，几个简单的货架上面放着招果洞发掘出土的几万件文物标本。其中有骨制的鱼钩、几千年前的动物骨头、经久不朽的骨器、打磨精美的石器等，大家大开眼界，赞叹不已。接着，同学们简单体验了其他考古方法，低空航拍和植物浮选，最后还见识到了传说中的洛阳铲（探铲）。用探铲进行钻探，是考古调查的一种方法，用于寻找和探明地下古代文化遗存。每个同学都体验了一遍探铲的使用，将探铲打入地下再提上来并不容易，要几人合作才能完成。时间慢慢流逝，最后一个体验活动也结束了，大家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次意趣横生的考古之旅。

年轻的声音带着兴奋飘远了，考古队员还在探方里埋头苦干，未来又是无数个枯燥而充满热情的日日夜夜，泥土做伴，书为友，纯粹惬意，生活如水般源远流长。

对于同学们来说，通过与真实文物的零距离接触，体验了一次考古队员的真实生活，枯燥乏味，却意义非凡。透过一件件古人遗留的器物，想象着古人类远古生活的艰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看似原始的技术，拙朴的工艺，却是今日先进科技的肇始。本次活动时间虽短，但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参加活动的同学们即便不会成为考古工作者，至少也会是文物保护的自觉践行者，这也是考古队员们举办这次活动活动的初衷。

（执笔：杨偲）



出圈，融圈！看贵州公众考古的贵安新区实践

贵安，是新区，也是贵州考古福地。

一铲下去，便挖出贵州考古“王者”地位。

从史前到明清，这是一颗纵横万年不间断的“时间胶囊”，也是一部埋藏在地下的黔中通史。

这颗浓缩人类活动信息，集众多文化遗产于一身，纵横万年不间断的“时间胶囊”，在考古人的手铲下，在碎片复原中，不断释放出既有趣又意义深远的考古证据。

考古和大众有什么关系？如果用考古的方式走进贵阳，“打开”中国第八个国家级新区贵安，考古队员们会看到什么？

一、出圈，让考古遗址“出道”

长期以来，考古在大众眼里有一层神秘面纱。探险感、推理感和悬疑感使考古自带吸引力。

从全国范围来看，从“良渚遗址热”到“三星堆上新”，大众对考古、对文物、对文化遗产的热情连年走高。

再看贵阳贵安新区，短短6年，贵安新区拿下3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让这座“新城”向世界展示了早在万年前这里的人间烟火就很旺盛的一面。

实际上，在丰富的遗迹给新区的魅力、活力、竞争力再添重要砝码前，“边挖边展示”的公共考古活动，让考古成果和价值走进大众日常生活，打破了“考

古工作枯燥严肃”的刻板印象。

梳理贵州公众考古发展时间线不难发现，早从2012年5月起，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持续开展公共考古活动，将土司城堡海龙囤遗址、杨氏土司墓地考古现场变成公众考古的“引流渠道”。在这期间，同时开展讲堂、展览、绘画、现场体验等系列公共考古活动，实现公众与考古学家的互动。

2016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专门的公共考古中心，有组织、有条理地规划贵州公共考古工作。并在贵阳孔学堂举办12场“考古系列文化讲座”，推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主题讲座，邀请国内知名考古学家讲课，引领观众认识考古。

如果说“聆听”只是引子，那“触摸”则是公众考古的重点。

2017年7月30日，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考古工地迎来了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观者。跟着考古队长下工地的目的，就是为了体验“挖土”，打一铲“洛



学生在剥取石片和修理石器



阳铲”，学原始人打制石器，再亲眼看“宝贝”——出土的各类精美骨器、石器。

这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设的“工地开放日”和“亲子考古夏令营”活动。通过现场观摩、专业讲解、模拟考古、发掘直播等多种形式主动向公众展现考古工作过程和成果，依靠考古本身的文化气质，再加上新颖形式的辅助，让不同年龄的参与者体验考古发掘、考古测绘、模拟打制石器、植物浮选、考古钻探等不同考古工作内容，既让考古走向大众，也成为学生课外拓展的一部分。

在过去 10 多年里，依托自然资源和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史前、夜郎、土司、民族、流域、冶金等特色考古专题，贵州公众考古的舞台越来越宽广，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且深入。

自 2020 年初贵州土司考古成果“靛”相央视的标志事件以来，“贵州考古”已成为公众考古的“现象级”事件。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 2021 年以来，有关“贵州考古”的新闻稿件，全网发布超 1860 万条。通过一篇篇新闻报道，使贵州变成考古文化“观光打卡地”。

2021 年 6 月 12 日，在“纪念‘中国考古百年’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上，以招果洞遗址为主题的线下活动《“寻找石器时代高手玩家”》沉浸式考古体验活动，吸引了 50 位参与者参与。与此同时，线上得到新浪微博、腾讯视频、抖音等新媒体社交平台转载，直播当天全网观看量达 16.4 万次，讨论达有 4.87 万条，成为让公众享有文物保护成果，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和阐释工作的优秀案例。

考古队员们看到，考古“出圈”，文化“入圈”。这个被网友称为“生理性感动”的文化认知背后，是展现“实锤”下的贵州故事，通过公众考古，扎扎实实为文化品牌建设和传播“引流量”。

二、融圈，考古发现融入时代发展

考古挖得好，也要讲得好，更要展示好。

如果说前 10 年，遵义海龙屯遗址、播州杨氏土司墓群、贵安新区牛坡洞、

招果洞遗址的发掘，是贵州公共考古的一次探索，2020年贵州考古上央视，引来公众考古“现象级”传播事件，那么2022年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获得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则再次将贵州公众考古推上了新的高峰。

“贵安是全国新区建设中考古成效最好的。”说这话的底气，是贵州考古6年拿下牛坡洞遗址、招果洞遗址、大松山墓群3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给的。

作为贵州考古史上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群，在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成为贵州考古“霸屏”社交媒体的热门词汇。

如何把考古的“爆红”变“常红”？延续近1400年的古墓群“新”在哪里？获得“考古年度彩蛋”，“彩”在哪里？抛开学术性，作为考古“小白”，大众能从这一墓群获得哪些知识点？

2023年4月27日，在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荣获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第31天，由中国文物报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学习强国”贵州学习平台、多彩贵州网协办，《强国讲堂“十大考古六进”》系列活动正式开启。

在3个月的时间里，考古人以“进高校、进企业、进公园、进乡村、进景区、进机关”这几场公众考古活动，将公众对考古的认识从“开盲盒”转变为“架桥梁”。

这样的力度，前所未有——

考古进高校——一场看似“按头强学”的考古讲座，从学术性到趣味性，数十个“硬核”知识点让同学们听了提气又提神。

在贵州师范大学，中国考古学会理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发掘领队周必素用近百张PPT“抖干货、抛亮点、炫宝贝”。

有趣的是，考古讲座开设线上选座时，开放不到10分钟，就出现一座难求的现象。

“大家对考古‘路转粉’的这一小细节，不仅是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影响力的体现，更反映出大家对贵州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的增强。”贵州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院长刘瑾说。

“一场考古讲座，解锁了我跨越近 1400 年的知识盲区！”近十年来，随着贵州考古成果越来越丰富，从出土文物看民族融合，对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的师生来说，考古学研究不仅在补史、证史，这种“升级打怪”、无限接近历史真相的趣味，更是考古学的迷人之处。

“考古队员们认识到，新时代考古既在探源，也在育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院长黄诚告诉记者，以学术性、趣味性与育人性为一体的“教”，才能引导学生更好地“学”。

考古进公园——50 米长廊满是“宝藏”，数十张高清知识脉络图解锁“知识盲区”，这是贵州考古首次以“移动考古课堂”形式走进公园，向市民游客持续输出贵州考古新成果。

现场，来自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 80 后、90 后青年考古人当起讲解员，为来往市民、游客讲解发掘始末和收获，将“大松山墓群在哪里”“考古人挖到了啥”“这些宝贝佐证什么”“考古人日常工作照是啥样”“发掘研究团队实力有多强”等热点问题逐一解锁，推动考古成果全民共享，用青年考古人的严谨与专业，展示着考古事业中青春而充满年轻的力量。

系统性、权威性、深入浅出、寓教于乐，是“十大考古进公园”的亮点。而将文物保护和研究成果向公众展示和传播，也能成为具有吸引力和审美情趣的文化体验。

“大松山墓群发掘以来，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话题更是几次冲上热搜，这样的传播效果也让考古队员们意识到，要把发掘成果转化成为通俗的语言，让大家认识到真正的考古。”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一室主任、大松山墓群现场负责人之一的彭万告诉记者，公众对考古的新需求、新期待是一种必要的互动，“考古的魅力与公众的热情将相互滋养，这将成为不断坚定文化自信的一支重要力量。”

考古进乡村——历时半年多的考古发掘，村里到底挖到了啥宝贝？为回答



考古进乡村展示现场

这一问题，贵州考古人用一场坝坝会告诉村民，“这群‘挖土人’每天都在鼓捣什么”。

7月6日，在大松山墓群所在的马场镇平寨村村委会门口，由数十张展板组成的知识点，将大松山墓群的发掘与收获完整清晰地展现出来，让村民足不出村就了解脚下这片土地近1400年来都有着怎样的遗存。

“村民是考古工地上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室主任、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现场负责人之一的胡昌国告诉记者，自大松山墓群考古钻探开始，当地共有304位村民参与了考古发掘，“随着考古进程的深入，村民给予的支持，是考古发掘工作顺利推进的强大动力。”



历时半年多的考古发掘，让村民知道村里“到底挖出了啥，东西有多重要，考古发现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让当地村民和学生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是推动考古走向大众的关键一环。

而随着村民对脚下的土地、考古工作有更多了解，对今后提供考古线索、帮助考古发掘、保护文物等方面，也有着积极意义。而比起学术价值，让村民感受更强烈的是对自己家乡和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发现在逐渐融入村民的生活的同时，也将改变着他们的生活。

“这些丰富的考古成果，让大松山墓群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村里的知名度越来越大，也让村民有了更多发展的希望。”贵安新区马场镇栗木村党支部书记曹政涛说，考古促振兴最直观的表现，是一些在外打工的村民看到大松山墓群的热度后，产生了回家乡发展农文旅的念头，“未来，大松山墓群原址将修建遗址博物馆、考古标本库房，将成为乡村最重要的文化符号。”

挖掘文化基因、梳理文化脉络、提炼文化符号，贵州考古也用多种方式助力贵安新区文化多样化的发展。

考古进机关——谁能想到，一个正铆足了劲建设的新区，召集全区 545 位部门和街道乡镇负责人，听了场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考古讲座。

7月15日，“十大考古进机关”。一场看似四平八稳的汇报，随着逐一亮出的“宝贝”、未来文旅融合的构想，正面回答新区建设和文保的“冲突点”——考古会影响城市建设吗？

随着各时期遗存的陆续亮相，讲座既是一次“亮家底”的分享，更是一次“看谋划”的鼓劲。周必素在分享中说，考古实证，贵州自古以来就不是蛮荒之地，“从大松山墓群所在的马场镇就可看出，黔中地区是贵州文化荟萃地，并具有兼容开放的人文品质”。

“考古遗存怎么融入时代发展，研究成果怎么转化为建设资源，贵安如何打造、利用考古遗址公园，考古队员们相信，这将成为贵州之最。”讲座上，



“十大考古进机关”——以考古话贵安讲座现场

首次公开的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方案，让大家眼前一亮。

“在贵安考古资源构想上，考古队员们将依托招果洞、大松山遗址公园，建设考古遗址标本库房和考古博物馆，汇集全省考古资源。将古遗址保护利用，融入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兼顾文物安全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周必素说。

“丰富的遗迹将给新区的魅力、活力、竞争力，再添重要砝码。”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熊列认为，在推动“强省会”建设中，贵安新区将考古前置落实到位，是把考古这块城市建设“绊脚石”，变为城市发展“垫脚石”的最佳案例，“一座城要立得住，关键是传承好自己的文脉，而考古赓续了贵安新区的历史文脉。”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部署的十项重点任务中，提到要“大力推进让文物活起来，推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这一目标，要求考古必须达成重建历史记忆、深化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对公众考古的广度、力度和深度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百年考古学的价值，不只是学术意义，还体现在满足公众好奇心、坚定文化自信，进而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关于公众考古的必要性，周必素表示，从“进校园、进企业、进景区、进公园”，再到“进乡村、进机关”，贵州将不断创新公众考古活动形式，为做好考古研究成果的活化利用，推动考古成果全民共享做出有益探索，也促进考古成果的发展和保护。

而这也生动诠释着，“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

（执笔：应腾）

后 记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挖掘整理宝贵的贵阳历史文化资源，2023年7月，中共贵阳市委决定启动《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工程。

为保障丛书编纂工作的顺利推进，中共贵阳市委成立丛书编纂工作协调机制，从多方面做好工作保障，办公室设在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由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负责统筹推进，相关单位承担具体编纂工作；组建丛书学术委员会，对丛书编纂质量进行评审及学术指导；引入总审订团队，从整体性和规范性上进一步提升了丛书编纂质量。

编纂这套丛书，凝聚了各方智慧，汇聚了多方力量，得到了省内外多位专家的精心指导，得到了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时任贵阳市委副书记滕伟华同志的悉心指导。省内相关行业的专家及专业人士参与撰稿，以融政治性、历史性、文化性、地域性与普及性于一体为目标，力争将丛书打造为促进贵阳历史文化繁荣发展、提升贵阳人民文化自信自强的历史文化读本，让贵阳这片土地更加厚重，让贵阳这座城市更加灵动，让贵阳市民更加自信，让外来游客更加向往，让贵阳未来更加美好。

《考古黔中》依据资料充分考虑考古资料的研究权属，编写人员全都是在贵阳贵安长期工作且年富力强的考古一线科研人员，将打儿窝遗址、八角岩遗址、招果洞遗址、牛坡洞遗址、大松山墓地、轻工学院墓地的发掘领队全部纳入编写团队，所用材料基本为一手的考古资料。部分早年发掘的遗址和墓地，采用已发表的考古成果作为资料来源和编写依据。



本书前言由周必素撰写，第一章第一节和后记部分由张兴龙撰写，第二节、第五节由胡昌国撰写，第三节由付永旭撰写，第四节由闵凯撰写；第二章由彭万撰写；第三章第一节、第三节由彭万撰写，第二节由胡昌国撰写；第四章第一节至第六节由胡昌国撰写，第七节由闵凯撰写；附记作者见文末。在本书编纂期间，周儒凤同志承担了大量的编审、校对工作，蒋矜梅同志为本书做了大量的协调对接工作。

在《考古黔中》编纂过程中，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贵和贵阳市文物保护中心的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表达最诚挚的感谢！因书中所使用的考古材料多还在研究之中，后续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和考古研究的持续深入，本书中的部分认识可能会略显不足，敬请谅解和指正！

